

第一章 《易经》的特色与丰富内容

（一）从占卜发展成易学

占卜是世界性的，世界各地各民族在原始社会阶段都出现不同的占卜；方式是多样的，我国夏、商、周朝代用龟卜就不一样，而邻近各民族占卜用的东西也不同。我国在原始社会时期预测吉凶、祸福的占卜，传统上说，源于伏牺画卦，以卦来占卜。《易·系辞》：“昔者庖（伏）牺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 于是始作八卦。”司马迁将伏牺画八卦事，写在《史记》占卜者传记，《日者列传》中，并且还说占卜从原始社会时起到春秋战国时期内，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我国远古时以八卦为占卜，是比全世界前后时期中各民族及各地区的各样的占卜要先进的多，其内涵的哲理价值详见后文。这种先进的占卜具体情况，见于儒家经典之一《周礼·春官·宗伯下》，现在把它简单介绍在下面：

大卜或太卜（古代占卜的官）掌三种卜问兆象的方法，一是像玉破裂的兆像，如石头的破裂的兆像，或如田间土地上的破裂兆像，根据这些兆像，就有了占卦兆的说明。在通行中最主要的是龟卜，国家大事都要卜龟，用火灼龟壳高起的地方，灼出裂纹就叫兆，占卜官根据裂纹来解答卜问征伐的吉凶，卜可以参与不，卜天下雨不，卜疾病能不能痊愈。还提到用八卦的爻来占卜。那是用蓍草来占卦的。又称为卜筮。

占卜是原始社会人们在自然界的力量面前软弱无力，也不理解各种自然现象的客观规律及其因果关系，幻想出自然界对于人存在着不可见的影响，希望能预先知道吉凶和可作或不可以作。占卜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就积累了丰富经历与资料文献。古代传到现在的《易经》：“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周礼·春官·大司马》）在《玉海》中引用了《山海经》说的略详些：“伏羲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黄帝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列山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这三部书，只有《周易》留传下来，《归藏》只残存一部份，分散在古籍里，清朝人马国翰，他作了一番辑佚工作，《归藏》虽然有了辑佚本，还是残而不全，但比较可信。《周易》因属于卜筮书，免遭了秦始皇焚书的灾难，得以保存到现在。

我国的占卜往前发展到《周易》成书以前就从迷信巫术的占卜，上升到先秦哲学的高峰，这是目前学术界都承认的。《易经》（或《周易》）中有“经”和“传”两部分。“经”是西周继承夏、商两朝的文化结晶，其中包含着许多哲学思想。“传”中也包含着春秋战国时代高度发展的哲学思想。

中国占卜的特点，是用八卦作为符号，卦字从文字结构上来说，卦字从“卜”，这就是说先有“卜”而后有卦。从古文獻上的记载来看，也是先有卜才有卦的。卦是怎么来的呢？《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古史传说：伏羲之时，有龙马从黄河中出现，背上负有“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上负有“洛书”。古史传说的圣人——伏羲，根据“图”与“书”画成八卦，八卦就是这样产生的。但有人对“河图”“洛书”不肯相信，认为是神话难考，首先提出疑问的是宋欧阳修，现代疑古派更大加否定之辞，可是考古

出土的“太乙九宫占盘”（一九七七年安徽阜阳县双古堆西汉汝阳侯墓）此事在此先不多谈。按先秦古籍中，有不少记河洛的，如：

《礼记礼运》：“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

《大戴礼记·诰志》：“雒（洛）出服，河出图。”

《大戴礼记》相传为戴德，实际上为曹褒编，东汉，公元80年至105之间。

《论语·子罕》：“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墨子·非攻》：“天命周文王代殷有国……河出绿图，地出乘黄。”

《管子·小匡》：“昔人之受命者，龙鱼假至，河出图，雒（洛）出书。”

从上面所引的书来看，虽然全都含有祥瑞的味道，但还不是完全无稽之谈。及至汉朝时谶纬之学兴盛以后，此事就被渲染上神秘化色彩。但是我们还可以从其字里行间选出符合实际的线索。如下引的文章与书史：

《覈灵赋》扬雄作：“大易之始，河序龙马，洛贡龟书。”（李善注）

《东京赋》张衡作：“龙图授牺，龟书畀姒。（姒为伯鯀之姓，其子是禹，是建立夏朝的帝王）

《春秋纬》：“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通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出感。”（郑玄·《周易注》引）

《孝经纬·援神契》：“德至深泉，则黄龙见，醴泉出，河出龙图，洛出龟书。”（孔颖达《礼记》疏引）

《宋书·瑞符志》沈约：“龙图出河，龟书出洛，以授轩

轲(黄帝)。”

从上引文献来看，“河图、洛书”有异名，河图又叫马图，又叫龙图，洛书又叫龟书。虽有祥瑞色彩，还是近于事实。因为“河图、洛书”并不是神奇之物不可理解的，它不过是出土的古代民族文化遗产罢了。是刻着有龙或马的图形石刻或石画；洛书，或龟书，也就是刻有古代文字（甲骨文）的龟甲片。

不只在古史传说时代有河图洛书，到了东汉末三国时代也出现类似情况。《三国志·魏书·管宁传》明帝青龙四年“张掖郡，玄川溢涌，激波奋荡，宝石负图，状类灵龟……文字告命，粲然著明。”从上引史书来看，原始社会有，封建社会也有类似出土的文物。不过河图洛书的出现是出自黄河与洛水，水流从地下层冲刷出来的原始社会人们刻的龙马与圆点等，这种石刻与石画是记录了远古时代文化发展的痕迹，可以说明我国太古时期有一个部落是崇拜“龙”的，奉龙为图腾的。《易·乾卦》是上经的首卦，乾为龙。乾卦位居八卦的首位。伏羲画八卦，古又称先天卦。伏羲不只根据“河图”、“洛书”来画出八卦，还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并取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详见前引文）从多方面认识了大自然宇宙，和社会人生，综合达到了一个高精度，发展了占卜，给后世易学，汉朝象数，晋朝义理，展开了演进之路，占卜自此退到次要地位，古人说：“善易者不占”，就是证明。今先将先天卦列在下面：



伏牺先天卦从汉朝以来研究《易经》的各家注疏是不同的，辩驳纷纭，所言复杂而又带有神秘色彩，现在简而扼要言之。

先天卦所代表的是《易经》基本观点，即对立的二元论。远古社会的人们在生产上的体验与生活上的需求，就要观察自然变化，由此积累了对宇宙的认识，并想由此企图了解宇宙结构，来揭开它的奥秘。先天卦是用符号来表达远古社会人们的认识与观点。从先天卦可以看出天与地是对立的，水与火是对立的，山与泽是对立的，风与雷是对立的。这种二元论的哲理，在《易经》中又用阴阳二个符号来表示，即阴爻——和阳爻——。在八卦和六十四卦全存在着对立面又要求其合谐的情况。所以《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是说一阴一阳对立转化而达到合谐，事物才能趋于完善。

古史传说上所说的伏牺画八卦，给后来易学发展打下基础，到了夏朝时代，传统的《易经》已经成书，书名叫《连山》，古人解题说“郑玄周礼大卜注：‘似山出内，云气连天地也，名曰连山。’”商朝时书名叫《归藏》，题解说：“归藏者，万事无不归藏于其中。”周朝则叫《周易》，其解题是，周是普遍的意思，易是变化的意思。后来《周易》列居群经之首，所以又称《易经》。

古来传说《易经》是经四圣之手，那四位圣人呢？就是伏牺、周文王、周公和孔子。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十翼即：《彖传》上、《彖传》下、《象传》上、《象传》下、《系辞·上》、《系辞·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易经》的成书是不是经四圣之手，古今是有争议的，在此不能详述，有人说《十翼》不是孔子作的，出于孔子门徒之手，本书不讨论它。可以肯定《易经》是一部多层次文化形态的古籍，这是为人们所公认，多层次起源于伏牺，又经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积累，虽然有人对夏朝文化持否定怀疑态度，但禹治水使部落融合，即古所谓合诸侯，画九州，任土作贡，这都是可信的，幸夏朝遗迹考古发掘已有眉目，夏朝文化日渐明朗，商文化是继承夏文化发展起来的，而导致有周朝高水平文化，才能产生春秋战国的灿烂的百家争鸣局面。

我国古代时期，占卜是国家大事，《左传·昭公五年》：“国之守龟，其何事不卜。”因为国家大事都要占卜，占卜盛行，才有可能发展到易学哲理化，易学哲理初为夏、商、周的官府的学者及私人之学学者，于卜筮解卦和传抄时，经多人积累，使易学上升到哲理境地。以上是秦以前易学的演变进化。到了汉朝易学以象数为主，到三国、魏王弼，他注解

《周易》尽扫象数，主义理，自此以后我国出现易学主要的两大派，即象数与义理，衍化的多层次还很多，不是本书的范围，不多述，附后天八卦图，又称文王八卦。



（二）由符号到《河图》《洛书》 演进成九宫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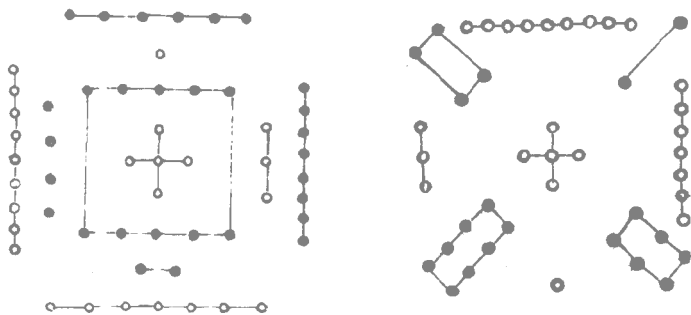
《易经》的特征主要是用点圈线符号来认识与改造世界，把自然与社会人事符号化，这是人类特有的智能现象，也是世界唯一完整的符号经。符号代表象，也代表数，象如天、地、水、火，九与六，代表奇偶之数。《易经》是从象与数（指爻）之变化，来推演宇宙与人事的哲理。

前面讲的——阴爻，——阳爻，是《易经》中特征的基本符号，是人类祖先最早使用的信息存储手段的一种，它出现在结绳记事之前，比语言交换信息前进了一大步，因为声波交换信息在远古时代无法保存。一长横的阳爻和二短横的

阴爻乃属于实用范畴内的信息工具。

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规律来说，原始社会的人们大都是用点或圈刻画在石板上作为记事的符号，后来发展到用直线作为记事符号。法国考古学家马沙克在其所著的《旧石器时代符号痕记与语言起源某些关系》分析了法国布朗聂尔石栅中发现的冰河时期的刻板符号，他认为两万五千年前，人类似乎就发展了书写或计数的符号，（上刻有二十九套记号符号）遗憾的是这些符号成了永恒的谜了。马沙克氏又说：这也是原始人对自己创造的符号有神秘的崇拜感。在人类历史中，漫长的二、三百万年前，漫长的史前文化符号信息绝大部份都已消亡。我国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陶器上刻有五十多个文字似的符号，距今约有六千年历史，至今尚不认识、无法解开这五十多个符号。

《易经》中的基本符号——、一阴阳爻，正是从刻在板上的点或圈而演变来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系辞·上》）按《易经》中长横的直线、即阳爻，和二短横的直线、即阴爻，就是由点、圈伸展到线的。现将河图洛书从古经籍中录于下，然后再简明扼要的加又说明。



上二图据朱熹《周易本义》

从上面二图：河图、洛书，是用点和圈的符号组成的来看，这可能是原始社会时，当文字符号未发明前，人的智力，只达到用结绳来记事，以筹记数，在此以前，人以石为工具和武器，夜间看到天上星星，布列在天空中，用较硬石具在较软的石板上，钻着点，画着圈，后来因为知识的增长和对数目上记数能力的提高，这些点圈符号就代表了事物和数目的某种意义。后来有了结绳记事，和执筹算数，较钻石成点或圈省时省力多了，前所刻画的有点圈的石板弃置于近水处，因为远古人们多傍水而居，容易淹没在河水中。当遇到天旱水枯，有点圈的石板露出，可能就是众多古籍中所载的河图洛书。汉孔安国以为河图即八卦。《汉书·五行志》：“刘歆以为伏牺继天而王，受河图而画之，八卦是也”。前面引《易·系辞》下二章之言，八卦是由点圈取象于宇宙万物，比类万物发展起来的。组成八卦的爻，一长横直线是阳爻，二短横直线是阴爻，这两个直线就是由点圈延长成线的。用两个爻排列，有四种排列：如太阳 = ，太阴 ==，少阳 ==，少阴 ==，每次取三个爻来排列，就有八种不同排列方法，就成了八卦，八卦每个卦各有专名，如乾 ☰、兑 ☱、离 ☲、震 ☳、巽 ☴、坎 ☵、艮 ☶、坤 ☷，由三个爻排成八卦，只有八种排法，再多没有，少则有余，这种排列，见于《易·系辞》：“……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这两句话正是世界数学史上的等比数列最早文字记载。 2.4.8，这是从数学上来推论《易经》中所含数理的玄妙性。因此《易经》是世界公认第一部讨论排列的古书。

河图由伏牺引伸画成八卦，古史有说明：“刘歆以为（同伏）牺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河图即是八卦，同意与反对的人，各持个人意见，互相辩驳，

千年来众议难于统一起来，本书是入门之作，所以不将读者引入五里雾中。

前引洛书，是以点圈排列成图的，后演变成九宫图，古人说：“九宫者，即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唐·王希明《太乙金镜式经》也说：“九宫之义……以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此不易之道也。”^①九宫图如下：

2	9	4
7	5	3
6	1	8

九宫图又称纵横图，又名幻方，另方为魔方 Magic Square，图中数字，直着加，斜着加，横着加，得数全是十五。九宫图渊源于洛书，是世界最早贡献于数学史上古代成就，值得我们炎黄子孙自豪。汉代也有三行纵横图，宋朝杨辉之《续古摘奇算法》有更细的记述。我国古代除数学家外对九宫图兴趣不大。在西方则对其有浓厚兴趣，有多种复杂幻方。欧美风行一时的魔方就是从九宫图演化而来的，美国人对幻方（九宫图）兴趣至浓，由九宫谜发展到《易经》迷。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说：“河图洛书……实际上它们是一个简单的幻方，和一个用从一至十个数字组成的十字阵。偶（阴）用黑点表示，奇（阳）用白点表示。”又说：“洛书是一个简单的幻方，在这个幻方中，数字按对开线、横线、或竖线相加，结果都等于十五。这个图形可以发展成一个卍字形的图形。河图则是这样排列的，在抛开中间的五和十时，奇

数和偶数各相加都等于二十。

《易经》虽起源于卜筮书，由记录整理、解释而成书，内容就不断的丰富起来。《易经》在夏朝名叫《连山》，商朝名《归藏》，只《周易》传下来了，它继承并保存了夏商二书一些内容，因《连山》《归藏》二书皆亡佚不存，《周易》又逃避了秦焚书的灾难，其珍贵性就不必多言了。

《易经》分“经”与“传”二部分，“经”是六十四卦，也就是由八卦相重而成六十四卦。“传”的部分有：彖、象、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彖、象、系辞，都分上下两部分，所以又称《十翼》或名《大传》。经部六十四卦中，每卦六爻，乾坤两卦各有七爻，共三百八十四爻。每卦有卦辞和爻辞，共四百五十条，共四千九百字，先秦时叫作繇，后世称为筮辞。

“经”部大约成书于西周时期；“传”的作成大概是出于战国时代儒家门徒的手笔。秦统一后，在其强暴的文化思想严密控制下，《易》属于卜筮，未遭焚书之难，儒家门徒又将若干儒家思想写进易“传”里，进一步丰富了其内容。

《易经》从内容深入研究可以看出是非常丰富的，虽源于卜筮，卜筮所问多与经济活动有关。^②古书上说易成书是经四圣之手，四圣是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又经夏、商、周三个朝代补充，“易道广大”包含有天、地、人三个方面就是古代的三才之学。《易·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坤》：“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天是父，地是万物之母。“易”说乾刚坤柔，不外阴阳二性，互相

①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数学》第127页至128页。

② 拙文《易经之主流始自经济》载《经济学学刊》（3）。

转依，故“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系辞·上》）“生生之谓易。”（《系辞·上》）“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这两句，前是记录思想意识，后是记录万物情况。从上引《易经》的几句话，可以说它符合人类生存方式最基本的三个前提：物质生产活动，精神生产活动，新生命生产活动。它是历史发展的前提，对社会发展也起巨大作用，这四句是把天、地、人总合于一起。《易》明确的指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系辞·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它是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宝库。“易”之内容包括有从自然法则探索开始，进而到人事法则，几乎无所不包，是最珍贵的文化遗产，此点西方人与我们有同感。由先知哲人凭其高超智慧，实际观察所得的丰富经验而形成的虽然在先后天八卦，河图，洛书，有些神秘色彩，实是智慧之光芒，其中确蕴藏着无限的宝藏，尚有待于易学研究者去探索，使祖国文化发扬光大起来。

第二章 《易经》与儒家和道家的关系

（一）《易经》与儒家

《易经》的内容与古今普通书不同，特点奇致，它分符号和文字两部分：八卦和六十四卦由符号组成；文字又可分为“经”与“传”，“经”的部分有：一是《卦辞》，一是“爻辞”。如上经第一卦乾卦来说，“乾：元、亨、利、贞”为卦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元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以上是爻辞。以文句定全卦的意义，叫《卦辞》，以文句解释每一爻的意义，叫《爻辞》，至于卦辞与爻辞是谁作的？这个问题，古今说法不一，争论不休，在此不必列举，我认为成于夏、商、周三代掌卜筮之官众人之手。“传”的部分有七，共十篇，传称为《十翼》。计：一·彖辞上；二·彖辞下；三·象辞上；四·象辞下；五·系辞上；六·系辞下；七·文言；八·说卦；九·序卦；十·杂卦。《彖辞》是解释卦辞，彖是断的意思，是断定一卦之义。如乾卦：“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象辞》解释各爻辞的叫小象。大象是解释全卦所从的象，如：“象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小象：“潜龙勿用。阳在下也……”以上举例皆从乾卦引来的。《系辞》主要是说理，并追述“易”的起源和“易”的作用，还有解释卦义来补充彖辞象辞的，不是逐句解释经义的。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

《周易》中有的系辞为今本所无。^①《文言》是专释乾坤二卦的。因为乾坤为‘易之蕴’‘易之门’，其他各卦皆从乾坤而出，所以解释的很详尽。历来大多数人认为它是经师讲乾坤两卦的记录，其中“子曰”，是假托孔子之言。《说卦》将说卦象及卦义，讲八卦形成与性质，又以八卦象征八种自然现象，又以八卦配东西南北方位。《序卦》说明六十四卦排列顺序，作了理论上的解释。《杂卦》取卦名相反来归类，说明六十四卦乃三十二个对立面。如：乾天坤地坎水离火水火相对，等。以说明宇宙万象皆属相对，所以有大即有小，有刚就有柔。《十翼》相传是孔子所作，后来欧阳修否认是孔子作的，也就是孔没有赞易。此事引起了历代多年的争论，直到现在著名学者熊十力认为孔子是赞易的，立论颇有影响力，仍有人认为十翼不是孔子作的。但《易经》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是孔子和他的门徒在其成书及传播上起了作用，《易经》列为五经之首其原因即在于此。

为了研讨《易经》与儒家，必须先将孔子生平和言行和儒家经典的《论语》《中庸》《大学》来探讨 这是必要的 可是详细研究《论语》《中庸》《大学》等 那是考证学范围的事 本书不便在考证繁琐上罗列许多论据，那与主题就远了。

孔子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卒于公元前四七九年。名丘，字仲尼。孔子诞生不久他父亲就死了。家境贫穷，孔子虽然处在贫苦环境，从小就有志气。十五岁时对学问就发生兴趣，当时邻舍的乡人也称赞他博学，（《论语·子罕》）到三十岁时，学问已达到成熟的境地（《论语·为政》）孔子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在外十四年（《史记·孔子世家》）他东奔

① 《马王堆帛书 六十四卦 释文》，《文物》 1984.3。

西跑很想实现他的社会、政治的理想，可是到处不得意，在政治上不能实现个人抱负，而却成了古代伟大思想家。他一生进行学术传播活动，收徒讲学，删诗书，作春秋，定礼乐，今姑且假定十翼是他作的，最可能是他和他的门徒参与写定，由此形成了一套哲学和伦理思想。这些智识，经过传递与流通，使中国悠久文化波及亚洲各国。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是受了中国以儒家为主传统文化的影响，孔子日常生活是孔子人格自然的表现。从这方面可以窥见儒家与《易经》的脉络。他平日态度温和严正，威不刚暴，谦恭，（《论语·述而》）他对事物态度，根源于自律道德原则：不悬空揣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唯我独是，不说怪异神鬼（《述而》）孔子说：让他活到五十岁时去学习《易经》便可以没大过错了（《述而》），可见他对《易》有浓厚兴趣，在发愤学习上也有的一件事可以说明。楚国的叶公曾问孔子的弟子子路，孔子是个怎样的人。当时子路没有回答，事后孔子知道了就对子路说：你为什么这样说：他的为人，发愤好学而忘了吃饭，乐道安贫而忘了忧愁，也不晓得老就要临到了（《论语·述而》）在自述好学方面，孔子自己也曾经说：自己不是生而晓得学问的，他是爱好古代道理，敏捷以求得学问的人。（同上引）又说：十家的小地方里也必定有像他是的一样忠实的人，但不如他好学。（《论语·公冶长》）他的好学是突出的表现，在修身自治方面，前面引他说学习《易经》可以减少错误，因此他平素以为可忧的事，不是贫富贵贱的荣辱与物质享受的高低，而是学问道德等精神文明的问题，他曾经说：不修明道德，不讲求学问。听到正义的道理不能去实行，做了不善的事而不能改正，这都是他所忧虑的（《论语·述而》）。他在严格要求自

己的好学精神，所以讲学授徒的时候，还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老了还在学《易》，至于赞易与否，先不去肯定，但从他的言行和同时期弟子对他称赞上看，对赞易可以提供些线索，如子贡说：孔子的德行不可及，好像你上天不能用梯子去登（《论语·子张》）这可以说他与《易》有微妙密切关系。

从孔子哲学思想中关于‘天’，在《论语》一书记载中，可以缕析其中与易理相同或接近之点。

《论语》中有多处谈到‘天’的如：

孔子周游到卫国的时候，卫国的执政王孙贾希冀孔子依附他，引用俗语劝孔子。孔子回答说：得罪于天是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祈祷的了！（《论语·八佾》）

有一次孔子生病很厉害，子路因为孔子曾作过鲁国的大夫，派了弟子作孔子的家臣，孔子的病渐渐痊愈时，知道了此事，责备子路说：我现在不是大夫而充作大夫，我欺骗谁呢？欺骗天吗？（《论语·子罕》）

孔子也曾经说：不怨天也不尤人，下学人事，上知天命，晓得我只有天吧（《论语·宪问》）

孔子曾经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

孔子又说过：君子有三种敬畏。一畏服天命，二畏服圣人，三畏服圣人的话（《论语·季氏》）

孔子答复子路说：天说了什么呢？四季照样运行，百物照样生长。所说的是自然规律。

孔子所说君子敬畏的三件事，第一是畏天命。这句的天是指对大自然中古人所认为的最高原理，即指天为最高主宰。所说的命是主宰‘天’的作用或者是发动之意。说的简

单一些 通俗一些，‘天’即是环境，‘命’即是因果。

孔子对于‘天’与‘命’。这两个概念是与《易经》中之‘天’与‘命’之概念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按《易经》中是以阴阳两爻为基本，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阴是地，阳是天，是人类生存的客观环境 而且“天地养万物 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卦·彖传》）又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序卦》）而孔子的思想较上引《易经》之天地概念 有进一步的说明：“下学人事，上知天命。”（前引见）正将《易经》一书的主要核心，即知天命，尽人力。表达出来了。

孔子从《易经》中的天命观念，给了他以道德的勇气与内心安慰，使他能从生与死的重大问题得以超脱和在生活苦难遭遇中不被吓倒，留给世人得见一种伟大崇高的精神。从他在周游列国时不幸遭遇，也体现出他对《易经·困卦》的认识所起的作用，如孔子在宋国被宋司马桓魋包围的时候，他非常镇定的说：“上天将道德托生给我 桓魋对我有什么办法呢！”还有一次孔子经过匡 因他的容貌与阳虎相似 被仇恨阳虎的匡人包围，但他还是异常的镇定说：“文王虽说已死，但他的文化不是遗留在我的身上吗？如果上天将要消灭这文化的话，那么，我这位『后死者』是不应该掌握这种文化吗？现在我已经保留掌握这文化，那上天不是要消灭文化的 如此匡人对我有什么办法。”（《论语·子罕》）又见庄子《秋水篇》 孔子被匡人拘留了 处境很危险。幸亏匡人没有错到底，把孔子放了。匡地在今河南长垣西南十五里，有地名匡城。

从《论语·子罕》：“子畏于匡，”……到“匡人其如予何？”这件历史上的小事情，可以说明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孔子的天道观念，正如《易·系辞》上讲圣人作用所说：“与天地相

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不违背天命，天有四季变化，春生秋杀，顺之则利。“乐天知命”，这就发挥了道德的作用，“敦乎仁”对于天地之化加以范围，即加以制约；对于万物则委曲成就，即“曲成万物”。孔子在生活上的遭遇，如困厄于匡，就表现了乐天知命，委曲的对待突如其来的打击，这种崇高的道德行经，是受《易经》哲理影响的。

第二件事，是我的创见，可以补证文王与孔子是参与《易经》成书的。周文王是古传世文献所说的《易》之作者之一。如《史记·周本纪》：“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又《史记·日者列传》：“自伏羲画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后来唐·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序》上说：“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案《系辞》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殷、周之古叫中古）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也，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周易乾凿度》说：“垂皇策（指八卦）者牺，卦道演德者文（王），成命者孔。”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文王囚而演易。”以上所引古史文献全是以说明文王乃《易经》成书之一，虽有人举卦爻辞中有些是文王以后之事，这可能历代传抄写时后人加入的，并且是孤证。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三处提到文王是《易经》成书三圣之一。所以孔子继承并掌握文王以后的文化遗产——

《易经》加以发展扩充，是可信之事。“子畏于匡”此事几千年来从未有人提出异议，这是信史的确证，文王扩展了《易经》文化宝库，孔子在困厄中有坚强的信心，天不消灭这文化宝藏，这是孔子赞易的根源。以下再从《论语》与

《易经》中相近之论来作佐证。

从孔子言论与《易经》中文句在论“中”方面来说，中是无过与不及，即恰到好处的最高准则。在《易经》中之“泰、益、复、夬”四卦之爻辞，五次说了中行，按中行即处中而行之意。彖传言中的三十三，象传言中者三十。凡提到中的，有：“正中”、“时中”、“大中”和“中道”、“中行”、“刚中”、“柔中”^①

“时中”是以时间说的，“正中”是以位置说的，因为人有所遇到的时间，即生命的过程，所处之位，即在社会上的地位。事合乎时的，所行又当其位，时与位凑拍，恰到好处，叫做“时中”、“正中”。过了时位之所宜和不及时位所应宜，全不是中。“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其意是说：子贡问子张和子夏两个人谁好一些，孔子回答说：子张过分，子夏有点不够。那么子张好些吗？孔子又回答子贡说：过和不够都不好。是说子张与子夏全违背“中”之意。《论语》中《雍也》《子路》全提到“中”。不够要进，过要退，以达到《易经》中多次见到的“中”，这是孔子把《易经》“中”字思想来教导弟子们。

前文将孔子言行及生平择述其与易学之关系，从而阐发了个人的见解与个人创获。为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易经》与儒家之关系，今将儒家经典中之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中之政治教育思想，同《易经》之哲理基本相近的钩索出来加以排比，只举其主要的，未能求其全，全面核比则琐碎支离，会使读者感到厌倦，但儒家与《易

《经》关系密切之梗概，从“下列两者之比较中”就足以说明了。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象曰：“云上于天，雷，君子以饮食宴乐。”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乡益寡，称物平施。”

“至诚无息”《中庸》

“博原所以载物也。”（同上）

“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同上）

“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
《论语》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同上）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同上）

“道得众则得国。”《大学》

“怀诸侯，则天下畏之。”《中庸》

“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

“所恶于上，毋以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大学》

“财散则民聚。”《大学》

“节用而爱人。”《论语》

“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中庸》

“隐恶而扬善。”《中庸》

“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

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响晦入宴息。”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勅法。”

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象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

“食不语，寝不言。”（同上）

“不赏而民勤，不怒而民威于铁钺。”《中庸》

“君子不出家而教于国。”《大学》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同上）

“谨权量，审法度。”《论语》

“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大学》

“宽则得众。”《论语》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中庸》

“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论语》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同上）

“遁世不见知而不愧。”《中庸》

“为人谋而不忠，与朋友交而不信，传不习乎？”《论语》

“克明峻德，皆自明也。”（同上）

“不耻下问。”（同上）

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象曰：“天下有山。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勿履。”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象曰：“风出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下，居德则忌。”

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中庸》

“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同上）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大学》

“群子之道闾然而日章。”《中庸》

“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语》

“君子群而不党，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同上）

“反求诸其身。”《中庸》

“先有司，赦小过。”《论语》

“枵也欲焉得刚。”“不愤，不启。”（同上）

“过则勿惮改。”（同上）

“在上位不陵下。居上位不骄。”《中庸》

“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论语》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中庸》

“士见危致命。”《论语》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既稟称事，所以劝百工也。”

《中庸》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中庸》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同上）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论语》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

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大学》

象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以永终誉。”《中庸》

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论语》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省刑罚。”《孟子》

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故大德者必受命。”《中庸》

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无友不如己者。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

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先也。”《中庸》

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

象曰：“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同上）

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中庸》

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论语》

（二）《易经》与老子

老子思想为道家学说之祖，《老子》书字句简明，思想精纯，系统谨严。道家各派学说，完全是从老子思想流衍而出。老子及其道家学说对整个民族主要是汉族的社会生活，心理结构，及思想方式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它和儒家学说一起构成了传统文化的主流。

道家老子的思想与儒家孔子思想，既为中国文化之两大主流，从古至今影响是深远的。《老子》与《易经》又有相通之处。古人早有谈到，如宋朝程大昌《易老通言》和明朝洪应昭《道德经测》，前贤之文集中亦有谈到这方面的，深度不够，与现代学术文化有一段距离，所以我又重新探索，一得之愚，试述之如下。

人生活在天之下，地之上，天又是处在人与地关键处，故从天人之理来探讨《老子》与《易经》。天人之理也就是自然与人事的基本原理。这两部古人称为三玄的，同样讲到令人认为玄的问题，首先是宇宙本源。世界各古国各民族都对宇宙的本源有解释，在西方希腊哲学中认为宇宙的本源是由水、气、火三种先于人类而存在的自然界物质。我国《尚书·洪范》是以水、火、木、金、土。五种自然原素。《易经》则以八卦为符号代表八种自然物质。而老子则不采取具体而落实某一些自然原素实体来解释宇宙本源，他用一个抽象的‘道’来解答。《老子》书中平空假定一个抽象的概念。

说这就是宇宙的本源。在《老子》二十五章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道究竟是什么？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章）又说：“道无常名”（《老子》三十二章）道是恒久不变的，常字意也是恒久不变，所以无法用言辞来表达。这个道理可引用明·瞿汝稷《指月录》来说明，言辞比作手指，道比作月，言语的功能，只能指人以道的方向，而不能将“道”的本身给人。所以人们不能在“道”词义上去求其解，那将永远不能了解，因为“道是万物之奥”（《老子》六十二章）不能解说，而且道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老子》十四章），也就是用一切人的感官技能都不能觉察出来。这是因为“道”是超物质、超时空的东西，万物都从它而来，在时空中生活的人，虽是万物之灵，但不能测出超时空的“道”来。只能用推理的方式，或设想的方式，相信“道”是必然存在的。“道”是宇宙之先，并且至大。老子说：“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二十五章）所以才能成为“天地之始……万物之母”（一章）。

从《老子》书中各章可以得知宇宙本体运行之法。也就是自然法则。如老子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五十二章）这几句话大意是，天地万物都有本始，作为天地万物之根源，如果得识其根源，就能认识万物。如果认识万物，又持守着万物的根源，一生都不能有危险。这就是说人能认识把握根本之道，作人处世，就能应付得当，办起事来，纲举目张，条理分明，是以“万物莫不遵道”（五十一章）道是自然无为的，“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生而不

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五十一章）这几句。说道生存万物，德畜养万物，万物呈现各种形态，环境使万物成长，所以万物莫有不尊崇道的，……生长万物不据为已有，兴作万物却不自恃已能，长养成物却不为主宰。这是提示人们在行政管理人际关系上采取不干涉主义而任其自然。

《易经》中是怎样说“道”呢？是这样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系辞》）易的核心肇始于阴阳二基本概念，地球的公转与自转就产生昼夜，寒暑的分别，就叫做阴阳，白天是阳，夜间是阴，热是阳，寒是阴，广泛的推到自然界与生活界，全以阴阳之理来分辨理解。《易经·系辞下》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始作八卦。”就是仰观俯察，鸟兽与地理环境结合阴阳变化而产生八卦。这一思维方式由八卦发展到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中也包含了天人之道。在《易经》的《序卦》把天人之际的关系说的比较具体而条理化。它用六十四卦排列次序对天地万物化生的道理加以论述。今先列《序卦》原文，然后附以简单的译释。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这是说：有了天地，然后万物才能生长。（按《易经》始于《乾》《坤》两卦，乾就是天，坤就是地）遍布于天地之间的是万物，所以接着是《屯》卦，屯的意义是充盈之意。“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这是说《屯》卦之屯，它的含义是说各种事物初生时挣扎在困难的状态，可是各种事物又都必须经过萌芽的阶段，所以接着就是《蒙》卦。蒙就是指各种事物在萌芽时的状态。“物穉不可不着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这就是：凡物之幼小者，不能不加

保养与扶持。所以接着是《需》卦，需就是指饮食之道。“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按此讼字有争夺之意。）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这是说。在饮食方面必有所争夺，所以接着是《讼卦》，因为争讼起来以后，必引来众人参加，所以接着是《师》卦，师的含义是兴师动众，由于人数众多，所以要讲求排列队伍的办法，排成队伍，故接着是《比》卦，比的意思是紧挨着如鱼身上的鳞。“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按畜是蓄字之意，古代蓄通常用畜，是储蓄意）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者，礼也。”这是说。物品多了之后必然要想到存储，所以接着是《小畜》卦。履字的含义是实行礼治。“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按《序卦》泰字之义为天地相交，指人际关系、上下级之间和顺为泰，所以有国泰民安这句成语）泰者通也。物不可终通，故受之以《否》。（按这是从易之阴阳对立衍化而来的，否与泰是相对的，因此成语有“否极泰来”）。这是说，用礼来管理或统治，并且上下关系能够融洽，社会才能安定，所以接着是《泰卦》，泰的意义为上下融洽和顺。但事物的发展不会永远顺利无瑕的，所以接着是“否”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这是说事物的发展也不会，总是处于上下之间不融洽，障阻而不通顺的状态。所以接着是《同人》卦。能同别人同心同德的人，财物则多归属于他。因之接着是《大有》卦。以下将《序卦》中一部分略去。下文接着是：“物不可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这段意思是。物不可以简单的满足需求就算完事，所以接着是《贲》卦，贲义为文饰，但文饰过分

了，那就会使物件为人所享用的价值丢去掉，所以接着是《剥卦》。剥是去掉剥去之意。“物不可以终尽剥 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物然后可畜 故受之以《大畜》。”这是说 物不能长久剥去其文饰的外表与内在，当它被剥去到了一定程度时，就会向相反方向转化。所以接着是复卦。由于物能转化，不会灭亡，所以接着是《无妄》卦。物不会灭亡，就可以蓄积，所以接着是《大畜》卦。也就是说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要向相反方向转化。

以上是摘引《易经·序卦》所说的天人之际的演化过程，从其中可以认识到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

以下再从《易经》中列举有关天人之际的几条，作进一步论证。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易·系辞下》）这几句话是说，《易经》这部书，凡天道、人道、地道，无所不包，可以说广大而完备。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况，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易·系辞上》）

这段大意是说。易道是和天地相配合的，所以能够把天地的道理都包括在其内。作为的圣人，抬头观察了天文，低头观察了地理，所以知道无形不可见，有形可见的一切事物和有形无形互相转变的原因。追究事物的起源。寻求事物的

终结，所以知道死生的道理，看到精气凝聚起来成为有形体的实物，精气从形体游离了成为看不见的游魂而发生变化，所以知道鬼神的情状。因为他和天地相象，所以不会违背自然的规律。他的智慧能够周知万物的情理，他的道德能够普济天下的人民，所以不会有错误。他的思想开展，通达四方，不会放纵荡然，永远是乐天知命的，所以忧虑不会来在他身上。他安于所处的环境，团结周围的人们，因为有博爱的情感。他专心致志效法天地的主，决不会出差错；普遍助成万物的发展，决不会遗漏；明晓一昼一夜一明一暗的道理，知道了一切转变的原则，所以能够像神似的变化不测，没有局限性，任何方面都能想得到，如同易道的变易推移，没有固定性，什么事情都做得来。

前文引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在此加以译释 即是说一阴一阳的矛盾和统一，就是道。宇宙天地间和从古到今的社会变化全是存在着矛盾和对立统一。当然《易经》的宇宙观是形而上学，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不是唯物辩证法宇宙观。这是属于哲学的问题，又因本章是讲《易经》与道家关系。所以不进一步去论述。

前文将《易经》与《老子》原文引了一些，虽然又以白话文加以疏解，但《易经》与《老子》文皆奥涩，所以再试从天人之际这方面将其扼要简明为两点，加以论述。

1. 自然法则，从《易经》与《老子》即可见出是自然无为，“易与天地准”，即是指天地间变易，如一年四季的变化，春、夏、秋、冬的不同，以及阴阳、风雨、乾燥、潮湿等自然力，自然力表现在人身上生、幼、壮、老、死，动植物的荣枯代谢，都由自然力来支配着。人逐渐知道有许多自然力可以化育万物，使之茂硕繁滋，又可以从多方面杀戮万

物，使万物可以枯萎老死。

在老子说来，自然界中的万物，不只是为道所生，并且在生成以后，还受道的支配，也就是说道是天地间万物运行的法则。“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三十四章》又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易经》与《老子》的道——自然法则，是宇宙万物形成的原因，也是它变化的主宰。所以同《易经》的“与天相似故不违。”两者主要涵义上是相同的。

天地间的变易，春夏秋冬四季，人们是熟习的，现在以一个季节说明自然法则。给“易与天地准”和“万物恃之以生”这两句易老之言，试为深入浅出之析解。以秋季来说，九月一到，秋意就在天黎时在人不知的时候溜到了，常常是九月里有几天是令人感觉凉爽舒适，又使人精神振奋的日子，花卉虽不如四五月份那么多，但花儿都非常茂盛，菊花到了十月，盛开了色彩缤纷的花朵。草原仍有干草的气息，刈割的草散发着芳香。春季是万物生长的季节，秋季古人说是有杀意的，但却是显示生命奇迹的季节，因为一年生长过程似已走到终结，但却给下一年生长作好准备工作，如植物把它将来的希望寄于种籽和根茎。动物中的昆虫把未来收藏在卵里和蛹里。大地上的生命冲动即将结束，从九月下旬起生意的步调开始放慢，不久树叶即将脱落，青草也将要黄萎，可是生命的奇迹依然存在，未来生命的胚胎已经藏在种籽里。大自然开始要为度过严冬作准备。林地及田野的绚彩色调消逝，落叶与农作物枝叶变成土地上的覆盖物，然后成为滋养树根和种籽的腐殖土。天地就是这样准确的循环，万物也恃天地运转，而生存，这是自然力给人们显示的自然法

则。《易经·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老子》：“道生之，……长之，育之，……养之，……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五十一章）效法天地的变化，把它应用于人事上，易、老是相同的。而且同具仰观俯察实际经验和历史传统与智慧，而且同既不迷信，也合乎科学。

2. 社会中相对和往复法则

《易经》是由阴阳两爻而成为道，组成道的阴阳对立变化之理是易之哲学。老子哲学根本观念的道中也有相对之论理，其认为相对或对立是由比较而来的。易老都认为宇宙万象皆属相对的。《易经》之爻分阴一、阳 —，两者是相对的，由三个爻组列，可组成八种排法，即是八卦：乾☰坤☷震☳坎☵艮☶巽☴离☲兑☱。八卦代表八种自然原素。乾☰表示是天，坤☷表示为地，乾坤是相对的；震☳表示为雷，巽☴表示为风，震巽、风雷相对；坎☵表示为水，离☲表示火，坎离、水火相对；艮☶表示为山，兑☱表示泽，艮兑、山泽相对。将八卦相重，得六十四，六十四卦代表自然与人事六十四种现象，也是两两相对，原是取天地之象来察人事，由此即形成社会法则，

宇宙万象，全属相对的，所以有大即有小，有高就有低，有远就有近，有生就有死，有显就有隐，再如：阴阳、刚柔、强弱、雌雄，有无，上下，水火，山泽、是非，黑白，东西，南北，前后，左右，方圆，长短，高矮，胖瘦，大小，多少，快慢，曲直，实虚，祸福，等等，再举还有的是。在相对这方面无论自然界，人事中，社会，经济，政治，全都有相对之现象。

《易经》是发现并应用相对现象与相对原理在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部书。《易·系辞》：“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 仰

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草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几句话中就有相对的：仰俯，天地，远近。再将上引易之原文，译成语体文：古代包牺氏，他治理天下时，上则观察天上日月星辰的现象，下则观察大地高低卑显种种法则，又观察鸟兽羽毛的文彩，和山川水土的地利。近的就要取象于人的一身，远的取象于宇宙的万物，于是创造出八卦，以八卦贯通宇宙间各种事物变化莫测的奥妙，并比较和区分万物的性质和形状。

在《易经》中，一切可以命名的事物全是相对的，也可以用阴一阳——两个符号来代表，如：天地，刚柔，动静，男女等，全是两两相对，二者虽有盈虚消长的变化，终是属于相依才能存在。老子在这方面是经过比较后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高下相倾。”（二章）这三句话中的‘有’与‘无’，‘难’与‘易’，‘高’与‘下’是相对的。“知其荣，守其辱”（二十八章）荣辱是相对的。在宇宙万象中，有其一，就有其二，如一方面失去存在，则相对的一面，也难单独生存。古人说：独阴不生，独阳不长，必一阴一阳相生相长，才有化育万物之功，才有生命可言。宇宙中万象的相对是社会法则重要之一环。在《易·系辞·上》：“易有太极”宋朱熹解释太极说：“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①那就是说易理揭示了宇宙间事物发展最高深、最广泛、最普遍的规律。在《易经·系辞》接下句是“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上引文的三句是说由此生出天地变化法则和四季交替的现象，根据这些现象，制定了八卦。系辞又说：“圣人以有见

① 《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这是说：圣人还根据所发现的天下万物变化的特点，又观察和研究其会合贯通的规律，将其推行到社会典章制度和伦理规范上去，写在文字上，用以判断吉凶。吉凶是相对的，要取吉去凶，是企图消灭自然界的杀机。要人们知所趋避。老子在相对论理上对吉凶的判断和趋避，是取柔，取弱，取下，为对策，认为这是趋吉避凶。《庄子·天下篇》对这方面有扼要的说明：“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馀……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这几句是说：人们都争着走向前面，而自己却唯独留在后面，并愿承担天下的屈辱，人们都去争取那实在的东西而自己却唯独守着那空虚，没有积蓄，可常常有余，仿佛积累了象高山一样多的东西，而感到有余似的……人们去追求福利而自己却委曲求全，这是只求苟活而免于祸咎。

《老子》中 also 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二十八章）这几话中的‘知雄’与‘守雌’其含意是持静处后，守柔，而不是退缩，或回避。老子此节大意是：深知雄强，却安于雌柔，作为天下的溪谷的流水，作为天下的溪谷的流水，常德就不会离失，而回复到婴儿的状态。老子在相对的处境中，采取柔、弱、下为对策。可是老子的话是与常情相违背的，在社会的普通情形中，强者，有力者，才能居上位，能够获得权势，财富，而人生中最基本的食色全由权势财富而获得，正如达尔文天演论中所说的；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但老子则认为那是片面肤浅的见解。他采取柔、弱、下，是根据深一层的观察。他认为物之反应，常由吾人之作

用来定，即常语说大叩则大鸣，划船也如此，越用力去划，则反作用也越大，人事中，也是如此，以柔弱待人，人亦以柔弱对待，如以柔弱对人或物，不单反应回来的是柔，而且自身精力还可以常保。再比方说柳枝柔弱对强劲之风以柔弱应之，自身反不受摧折而能自全。柔弱者本身之力内敛而不外发，所以表面上虽属软弱，而内在保存了精力，所以能蕴含有一种坚韧之力量，以保存持久力。这是老子在相对的宇宙万象中所采取的高度智慧。

老子进一步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七十八章）这是以水为例，如山间微弱的滴水，经过几十年，终造成点水穿石，大到洪水泛滥，虽是强固堤坝也不能挡住。所以老子指的柔弱，不是软弱无力之意，其内含是坚韧不拔的意思，以水为喻还含有另一层含意，即水性是趋下居卑，含有不争之意。老子畅达自然界生机，把守弱，守柔，居下，推论到社会法则上。虽然这其中有其消极因素，今天我们不能对古人的局限性过分苛求。

关于宇宙万象全属相对的，在《易经》与《老子》中上文已论及，不再详举，免生枝节。往复与相对是有关系的，易老二者之哲理全从历史总结和社会经验而来，全深知道之理是往复的，物极必反之原理，凡论到自然与人事，全着重于避免过盈。所以老子说：“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十五章）凡人都要不自满过盈，才能免去物极必反之害，上引《老子》十五章几句话，是说：谁能在动荡中安静下来自行缓慢的澄清？谁能在安定中变动起来，而慢慢的前进，保持这些道理的人，不肯自满超过了盈，天因地不自满，所

以能去故更新。《易经》之《序卦》是这样说：“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按有大指财物多的，或骄傲自满的，财多位高的是不可以盈（自满）的，所以应当如《谦卦》所指示那样。《易经·谦卦》：“象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高盈而益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终也。”这几句话大意是说：谦卦是亨通的道理，因为它象征天道的德性。光明普照下方，毫无私欲而周济万物，而且还运行不息。并且天道的规律，是必定要亏损过于盈满的，而增益谦虚，地道的规律，必然促动满盈的而流入谦下的一方，鬼神的道理，是损伤满盈的，而福祐谦让的，人的常情是厌恶满盈的，而喜好谦逊的。所以谦的德性，尊贵而有光辉。虽然是卑退，但不可超越规矩，这便是君子的学问、德业、修养善始善终的结果。这就是讲“复”的道理。

人总是一往直前的追求名利财富，执意的去追逐名利之场，在财富之途中而缺乏危机感。那就不会有《易经》谦道的意识，也不合《老子》取柔、取弱、取下的谦之意。所以在前进中得意之时，一遇波折，“复”之灾咎即会临到。正如《易经·乾卦》：“亢龙有悔”。关于《易·谦卦》的解释，也有称为是《易经》之十翼中的，还有两本古籍：《说苑·敬慎篇》：“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又说：“易曰：不损而益之，故损自损而终，故益。”（按损即谦也）《盐铁论·遵道篇》：“文学引易曰：小人处盛位，虽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终其身，未之有也。”上引《说苑》《盐铁论》称“易曰”的，却不见于今本《易经》，这可能是汉朝有不同解释《易经》的本子在流行。足见不同读本《易经》，对讲

“复”道的《谦卦》都特别注意，记载了文句不同的论述。

《易经》又在《乾卦》里也论及“复”的道理，“亢龙有悔”，这句话大意是说：象征着高亢极点的龙，必有烦悔之时，在《易经》卦中为什么用龙作比喻呢？这是中国文化的渊源是以龙为标志的原故，龙是我国古代汉民族一个主要部落的图腾。闻一多氏认为龙是原始社会末期夏人的图腾。龙是古代人类最崇敬的生物，并且相信它是具有神灵的作用，是介于天、地、人之间的动物。古人因借用龙的功能，说明卜筮的《易经》在卦爻变化上不可捉摸而可以想像状态。也就是八卦与八八成了六十四卦，乃至三百八十四爻的变化，都是代表宇宙与人事变化不定的道理。亢龙指位高到极点，既无再上进之位置，又不能下降，犹如一条乘云高升的龙，想止不能，前进又危，降下山又难安，所以就产生烦悔。这就是物极必反的“复”之义。也就是乐极生悲。

《易经·乾卦》以龙为比喻来说明，在乾卦中见龙字的有五处，未见龙字而说的是龙的还有一处，实际共六处，坤卦一处。《易经》是群经之首，说明龙族的诸夏文化是我们真正的本位文化，也是我们立国的象征。

① 《闻一多全集·神话与诗》、《龙凤》。

第三章 古代高度智慧《易经》 中的辩证法

（一）阴 阳 与 辩 证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系辞》）太极观念只见于《系辞》。《易经》是以天地未分的统一体为世界本源，以宇宙演变和结构为太极。从自然界寻找宇宙根源，属于朴素唯物主义宇宙观，可以说《易经》用八卦回答了宇宙的本源。唐·李鼎祚在《周易集解》中引虞翻解释太极一词较为妥当：“太极太一也，分为天地，故生两仪也。”天是阳，地是阴。按阴阳观念产生在远古社会，商朝时甲骨文中已有阴阳二字，从夏朝到商朝生产力不断发展，因生产发展，有了天文历法气象等科学，将阴阳看成是物质自身的属性，并把它看成是引起事物发展的动力，而这个动力又是互相对立，互相依存的。消长变化即是朴素唯物辩证法在我国最早的出现。

易之阴阳观念到周朝的时候，从史书和诗歌中都有反映。周幽王的太史伯阳父（或作甫）的宇宙哲学。说宇宙为阴阳二气之运行，有其自存之秩序，如这个秩序紊乱了，则宇宙必有怪异之事发生。“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

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国语·周语》）上引史文大意是说：周幽王二年，西周泾水，渭水，洛水三川流域都发生地震。伯阳父说：周朝将要亡了。天气在上，地气在下，本来各有一定的位置，不能错乱，如果错乱了位置，那是被人扰乱了。阳气伏在下面不能透露，被阴气压迫得不能蒸发，这就要发生地震。现在三川流域发生了地震，就是阳气错乱了位置，被阴气压住了的原故。阳气不在上面，却处在阴气的下面，水源一定会被阻塞。水流阻塞，国家一定会灭亡。水本来可以浸润着土，好使人民来生产，土得不到水的浸润，则不能生产，人民所需要的物资就会缺乏，国家怎么不灭亡呢？从前伊水，洛水枯了，夏朝就灭亡了；黄河的水干枯了，商朝就灭亡了。如今周朝的政治也正和夏，商两朝的末年差不多了，又因地震阻塞了水源，水源一阻塞，河流就要枯竭。国家是一定要依靠山岳河流供给物资，现在山岳崩倒，河流因此枯竭，正是亡国的预兆。

这段古史记载，是伯阳父的阴阳观念。宇宙之中阴阳二气，其运行如果是循着大自然的秩序，则阴阳得其合谐，如果运行悖乱，则必有一气窒塞而不通，另一气必盛行而无制了。

阴阳观念不仅反映在因自然界剧变，而引起的国家社会衰败，同样，营建新居，开发国土的事情，也同样以阴阳观念作为理论。根据如《诗经·大雅·公刘》中的几句诗：

“（指周族先祖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这几句诗译其大意：他的土地已广已长，已用日圭测影定位而登上高冈，勘察了那里的日照南北阴阳，观察了那里的流泉

灌溉的方向。以此测量了那低低高高的地方，治理了田地是为了收成食粮，并测量了那山西面的夕阳暂息的地方，这个鹵邑的所在真是个广大可居的地方。诗中所述在山冈上观测日景来确立向阳与背阴的方位，又观察了流水的走向，对自然的观察，阴阳观念处于突出的位置。正如《尚书·周官》：“论道经邦 燮理阴阳。”蔡沈在《尚书》注上说：“阴阳以气言，道者阴阳之理，恒而不变者也，……一 阴一阳之谓道。”天地的运行 古人比作气 而道是阴阳的最高原理的结晶体。“易”之“一 阴一阳之谓道”，这句话引伸到《尚书》中，其阴阳二字的含义已经扩大，成为调治理整国家政务中的上下关系，推动国家机器运转的理论依据。《尚书·周官》中的‘理’和蔡沈之注中的‘气’是理气一元论在我国古代的出现。

阴阳观念也反映在军事理论上，首先将阴阳观念引伸到军事理论上的是范蠡，他的生卒年不可考了。从古史上只知道他是越王勾践的上将军，由于他的能力，越灭吴，越国成就霸业。后辞离越王，带珠宝珍玉，由门徒陪同乘舟而去。

《史记》说他变姓改名，叫鸱夷子皮，到了齐国，经营商业获利千万，移居到陶，陶是春秋时的中心地带，自称陶朱公，成为当时的大富翁，被后世尊为商业界的祖师。他也是有数的政治战略家。

范蠡将阴阳用在兵法上，以隐蔽和退守为阴，进攻和显露为阳 他曾经说：“臣闻古之善用兵者 赢缩以为常 四时以为纪，……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早晏无失 必顺天道。”（《国语·越语下》）

范蠡将阴阳观念中的对立因素，发挥在军事理论上，他说：“阳至而阴”。其意是说敌方声势浩大的来攻，我方要取守势，或退一步，然后伺机看情况再战。“阴至而阳”呢，即是说当敌方隐蔽的布阵，诱我来攻，我方的对策是故意显露来试探敌情，探测出真情时再行动。“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这两句话是说我方在战途中后到，对敌情不了解或了解的不多，就必须将己方情况隐蔽起来。如果先抵达战场，可以乘敌方长途行军，未得喘息的时候，而立刻发动进攻。“近则用柔，远则用刚”，这是说敌我双方距离过近时，必需采取隐蔽来防守，这样有回旋的余地，当与敌方距离远时，可以显露雄厚兵势，正可威慑敌方。“早晏无失”这句话是指阴阳处理的得当，就无失误，所以要“必顺天道”。天道即指的是阴阳之理。这是将阴阳观念引用到军事理论上。

道家思想的主流代表是老庄学派，也以阴阳观念来解释天地间万物的性质。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老子》书中的道是宇宙之至先，至大，至久，它是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的道，包含着阴阳两气，二三是指道创造万物的活动过程。万物都在这阴阳两气中产生。万物背着阴而向着阳，此阴阳两气互相激荡而成新的调和体。《老子》这章颇与《易经》的阴阳辩证观念的精神相吻合。“一生二……”也就申述了《易经》三爻成卦之旨，因为有了一，便有了二，这二便与一相反，同时又有了三，此三是根据于一，而与二反，却能转化变二，以归于和，即《易经》中所称之保和，太和。惟有两个相反能成乎和，所以完成了全体。这就是由变化，而产生矛盾，由矛盾而转化为和谐。《老子》此章，用有韵的文体，将《易经》之经卦三

爻，别卦六爻所表示的变化法则，说的精辟而简单。

道家第二号人物是庄子，同样也将阴阳观念来说明万物的性质和变化过程。庄周说：“父母于子 东西南北 唯命是从 阴阳于人 不翅于父母。”《大宗师》古代子女对父母唯命是从，阴阳于人，人也要像服从父母一样。其意是人的生命是由阴阳二气构成的，所以生死也出于阴阳之演化。又认为事物的对立面的阴阳，不可只执其一面。如“盖师是而无非，师治而无乱乎？是未明天地之理，万物之情也，是犹师天而无地 师阴而无阳 其不可行明矣。”（《庄子·秋水》）这段大意是，为什么不取法正确的而抛弃错误的，取法治理优越的而抛弃紊乱的，这是不明白天地的道理和万物实情的原故，就如同只取法于天，而不取法于地，取法于阴而不取法于阳。很显然是行不通的。这是将阴阳之理的辩证观念贯串到天地万物之中了。

《易经》中阴阳矛盾对立的辩证观，也反应到战国中后期产生的阴阳五行学家的论著中。阴阳家代表人物驺衍，是战国末期齐国哲学家。司马迁评论他：“深观阴阳消息”。他深刻的了解阴阳二气矛盾的一消一息的变化。驺衍的著作《汉书·艺文志》中虽有记载，但没有传到后世。我们只从《管子》《吕氏春秋》二书中得知其简单情况。

《管子》和《吕氏春秋》也将易之阴阳辩证发挥在两书中。《管子·四时》：“是故阴阳者 天下之大理也 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又在其《五行》中说：“故通乎阳气 所以事天也，……通乎阴气 所以事地也。”这两篇都将阴阳二气与一年四季变化以辩证的方法论述出来。《吕氏春秋》的《同》《召类》两篇全是倡导阴阳五行家学说的。

阴阳又与数目字联系在一起，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的指示，使我们得知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事物都在互相联系着，一切事物也都在运动变化中。凡阴爻称六，阳爻称九。一卦的阳爻自下而上，就是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及上九；另一卦的阴爻也自下而上，成为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及上六。还有别卦（重卦）的乾坤两卦，则有用九与用六，是表示以乾坤两卦为重要。在《易经·文言》中“六位时成”即是指初、二、三、四、五、上。这样爻的阴阳及位与数目学就互相联系起来了。

我们知道八卦是由阴阳两爻排列重叠而成，如用三个爻排列成，有八种不同的排法，如：乾 ☰ 坎 ☵ 艮 ☶ 震 ☳ 巽 ☴ 离 ☲ 坤 ☷ 兑 ☱。这即是所谓经卦。六十四卦叫别卦，是由两个经卦重叠而成的。六十四卦共有三百八十四爻。由三百八十四爻组成卦中的爻变换，从易学传统来说，每一爻有八种不同的变法，在此我们没有必要来论述它。简单来说，一个卦的某爻由阴变阳，或由阳变阴，就变了另一卦。如比卦的某爻由阴变阳，或由阳变阴，就变了另一卦。如比卦 ☶ 坤下坎上。将其初爻变了，即阴爻变成阳爻，就成了屯卦 ☳ 震下坎上。爻的变换，则卦所示的具体事物也就变了。比卦变为屯卦，是由初六变为初九。

比卦的比 其义是亲附之意。《周礼·职方》：“使小国事大国，大国比小国。”郑注 比犹亲也。”又引本卦象辞：“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为证。此卦是坎上，坎有险义。本卦有“后夫凶”句。想亲附而去的迟，动作迟缓，失了机会，如《后汉书·冯衍传》：“永衍审知更始已歿，乃其罢兵，幅巾降于河内，帝怨衍等不时至……而衍独见黜。”这便是历史的事例，可以说明“后夫凶”。

屯卦之屯，本卦屯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

中。”《周易正义》：“屯，难也。”孔疏：屯卦是震下坎上，坎有险意，是叫人防患备险，必须突破艰险才能达到元、亨、利、贞的“亨”。秦末农民起义浪潮中往上爬的刘邦，受困于荥阳，仗着纪信冒名替死，才免险逃出，项羽又穷追不舍，他几次将亲生子女推下车，好自行逃命。还有最危险之事，为匈奴围困于平城四十天，后以陈平秘计，才脱险出来，所以在困难中一定要慎重备险，从死棋中达到“亨”境。

比卦的阴爻变成阳爻，爻一变，卦也变了成为屯卦，以卦辞中，也见到事物发展的变化，两卦都是坎上，以水为比喻，所以处险要有备，才可以达到“亨”。这就是朴素的辩证法。

以上所举的是一个卦中的一个爻变了就变为另一卦了。还有两个爻变的。古人以爻变卦亦变，来象征事物运动变化，反映了认识变化运动的规律。卦象有变化，事物之有变化，这是相类似的。此与《吕氏春秋·应用召类》所述阴阳之理是一致的。当然《吕氏春秋》乃汲取“易”理。卦变是由于爻变，事物之变化由于条件的变化，也是相类的。但是八卦和六十四卦所反映朴素辩证法还是比较幼稚的。

（二）八卦与辩证

宇宙间的自然现象和社会事物是相互联系，互相制约的，从现象本身，因有内部矛盾引起了变化。《易经》是三爻成卦，八卦本身也是互相连系又互相制约。八个经卦，两两之间有四个对立的，如乾与坤相对，巽与震相对，坎与离相对，艮与兑相对。现进一步来说明其相对联系、制约，天（乾）与地（坤）相对，雷（震）与风（巽）相对，水（坎）与火（离）相对，山（艮）与泽（兑）相对，这八种

自然现象的重要原素，不只是两两相对而且有联系，互相制约，体现其矛盾，举一个最浅近的来说明，坎与离即水与火是对立矛盾，而又互相制约水能灭火，火之热能将水煮成气体，使流质的水变成气体，在天成云或雾，这就是两者的对立矛盾而发生的变化。《易经·既济》卦，是水在火上，才能有水火相济之功。在人类生活史上，水火相济之功，最重要表现在烹饪饮食方面。人类掌握了水火相济，就从茹毛饮血的生吃食物，进步到熟食，成为人类重大的进化，是水火相济产生的成果之一。

将八个经卦相重，即是六爻合在一起，得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也是两两相对的，如乾坤、泰否、既济、未济等，宇宙万象都属于相对的，《易经》以六十四卦，用卦象符号附加文字来说明其辩证关系是世界上最早的。

《易经》以阴--，阳—两个符号包括了宇宙间一切凡可以命名之事物，它们两两相对，而且又是在发展变化之中，既是统一物分为两个部分，又由两个部分合二为一。“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系辞·上》）太极生两仪是辩证法的一分为二，而两仪合而成太极是合二为一，也是辩证法。《易经》的经卦是八卦，别卦是六十四卦，经卦每一个卦，是由三个爻组成，别卦是重两卦为一，全明确的包含着—分为二，及合二为一的辩证法。这种—分为二，与合二为一，变化也在其中，就以乾与坎二个经卦来说，合二为一就可变为需讼两个别卦。需卦䷄ 乾下坎上。坎是水又是云乾为天，天上有云，云要成为雨降下成甘霖滋润生物，需要等待云降为雨的条件齐备了才行。按需字与须两字音义相通，即要等待耐心。上述需卦的是乾坎合为一，把其上下位置一变，就成了讼卦䷅ 坎下乾上，乾是阳，

乾阳上升。坎是水，水性是下注的，一往上，一朝下，两者是对立的。《序卦》云：“饮食必有讼。”人类是赖饮食而生活的。动植物的生长离不开水，水的来源古代主要之一是雨水，雨水降落的地区受自然界各种因素的制约不会均匀的，粮食的丰收与歉收也由之而有不同，饮食如果成了问题，即是《易·序卦》所说：“饮食必有讼”。

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有是有非，有曲就有直。争辩是非曲直，就要引起“讼”。在人与人之间的讼是口角争吵。个人之间的口角争吵，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常常就动武打起来，这只限于人与人之间。集体之间发生“讼”，也就是国际纠纷，当国际纠纷由国际组织或第三国调解失败的时候，经常是诉诸军事行动，战争由之发生。国家的军事行动是众多人的事。“师兴由争，故次于讼。”（《周易来注·卷三》）“师者，众也，其卦坎下坤上。以卦象论，地中有水，为众聚之象。”（同上引书）聚众是兴师动众，其中就会有不安定的因素。

师卦是坎下坤上。“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师众是指军队。贞是公正之义，自身公正的仪态是个好的身教，能使三军都能公正起来，这不只堪称为良好的统帅，还可以为天下之王。坎的意为险，坤的德主顺，就是顺理而行险，所以能取得好的结果，即“以众正，可以王矣。”以上是坎下坤上的师卦。一倒个上下，成为坤下坎上，就是比卦了。比是相亲之意。一变在讼卦之后的师卦，“师兴由争”，争就是不亲了。国与国不亲，人与人不亲，那就发生斗争。比卦即转到好的方面。《周礼·职方氏》：“使小国事大国，大国比小国。”（郑注：比，犹亲也。）比卦卦辞：“比，吉”。彼此相亲是人类生活中及国与国之

间，最可喜庆的事，和平景气是人民所祈盼的事。坤坎两个经卦在上下位置不同，颠倒互换而成了两个不同的别卦，而这两卦是相对的。比卦更给我们指出一个大同世界。古人说：“以建万国亲诸侯。”（《比卦·象曰》）师卦与比卦两卦上下卦一倒换，即是“错卦以兴理”，按错卦即倒卦，这种上下一倒换，是表现为即巧妙又灵活的辩证法。唐朝王勃说：“……八八相生则错卦以兴理，……是故圣人之道可纵焉，可横焉，可合焉，可离焉，”^①王勃说可纵可横指的是《河图洛书》，河洛与易之密切关系，前面已经说过了。《易》之经传中有先秦哲学中最高精的辩证法，现代学者有明确之认识，惜至今没有人深入全面的发掘探索，实在美玉尚在土中，人们还看不到优良美质。

第四章 以易演兵——《易经》 中的军事思想

《易·系辞》：“易之为书也 广大悉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炉火，导引，乐律，星历，以及六壬……皆可援易以为说。这是说《易经》所涉及的学术领域，包括面范围广大，等待着人们从中去发掘探索。《易经》中有关军事的卦辞和爻辞，导致了历代许多军事家以易演兵的传统。这些散见于历代各类书中，又多零星片段。本人在这方面曾有探索，简略的将个人见解和前贤研究陈述如下：

诸子百家中的兵家是传统文化的支流，主流是儒道两家。《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兵家盖出于古司马之职。…易曰：古者弦木为弧（木弓） 剡木为矢（箭）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这就点出“易”与兵家关系。《艺文志》计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共五十三家。兵家理论，最早根据“易”谦卦 谦卦取象于艮下坤上。山是高大的形状，地则处于低下，卦象是表示高大的山反处于低下地之下，这就有谦的含义，谦有谦虚与谦卑二义。本卦“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是叫人谦之又谦，则什么困难与阻力都有解决的可能，所以“用涉大川，吉。”如秦末农民战争中一段脍炙人口的鸿门宴（今陕西临潼县东），就是以谦得吉的。当时双方兵力是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刘邦）兵十万在霸上。项羽准备好次日攻击刘邦军。项伯因与张良友善想救张良，而张良与刘邦商量好，叫张良以兄事项伯，

还结为亲戚。又让项伯转告项羽，“吾入关秋毫无所敢取，籍吏民，封府库以待将军，所以守关者，备他盗也。”这样的谦卑，所以使刘邦免军败之祸和鸿门宴的暗算，使刘邦保存了实力。

“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用于军事等方面就是柔弱胜刚强。道家的老子，其战略思想基本上是以柔克刚。按《老子》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历代有不同的说法，首先是唐朝的王真，他认为“五千之言”的《老子》一书中“未尝有一章不属于兵也。”（《道德经论兵要义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他说《老子》一书“言兵者师之”（《宋论》）现代训诂学大师章太炎也认为《老子》概括了古代兵书的要旨。可以说是哲学家论兵的军事哲学著作。其源出于《易经》谦卦。并有发展。

《老子》中的“柔弱胜刚强”（三十六章）这句话是从易谦卦彖辞汲取其精髓的^①，而又有所发挥。说：“弱之胜强，柔之胜刚”。老子书中引伸比喻到水的柔弱。水虽是柔软的，但“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四章）。这两句话可以举个例子，如从山崖上流下的水滴，经过一段长久的岁月，就能滴穿坚硬的石头，这就是谦柔自卑的优越效果。“柔弱胜刚强”老子称之为“微明”。兵家就从《老子》的军事哲学思想借来，如《孙子·军争篇》：“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这是孙子（武）把道家军事哲学思想实践在军事斗争上。

古代兵家多将水比喻在军事行动上，孙武说：“兵形象水”战争和水的流动一样，要依水流的道理而不可逆。这是

《汉书·艺文志》：“道家者流，……易之谦谦……一谦而四益。”

水性避高而趋下，遇到阻力则转变方向，寻向无阻碍处流，水流因地之高低而流向有变，用兵也要因形势不同来定取胜之道。

《易经》的精华，就是阴阳对立变化之理。春秋时期政治家范蠡，楚国宛人，后为越国大夫，助句践灭吴复国，官拜上将军，他是首先将阴阳用于军事行动，以隐蔽和退守为阴，进攻和显露为阳，他曾经说：“臣闻古之善用兵者，赢缩以为常，四时以为纪……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阳至而阴，阴至而阳，……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蚤晏无失，必顺天道。”（《国语·越语下》）今将以上引文，其主要部分，加以译释如下：

“阳至而阴”是指敌方声势浩大的来进攻，我方要采取守势或退一步。“阴至而阳”是说敌方隐蔽的布阵，而我方就故意显露军容来试探敌方动的迹象。“后则用阴，先则用阳。”是说我方在战斗途中后到，对敌情不了解或了解不多，自己这方面就先隐蔽起来。如我方先到阵地，可以乘敌方长途行军没得到喘息时间，立即进攻。“近则用柔，远则用刚”是说敌我双方距离太近，要以隐蔽来防守，如此则有回旋之余地，敌我双方，距离较远时，我方军容兵势，正可显露出来威慢敌方。“蚤晏无失”这是指阴阳处理的得当，就会没有失误。“必顺天道”是指阴阳对立变化之理，要合乎自然规律的来顺应和运用。

《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对立变化之理，可以称之为道。经过历代兵家的研究探索，发展成为兵法中的刚柔，奇正，攻防，彼己，虚实，进退，胜败等对立矛盾，使之互相转化，这种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从《易

经》中的阴阳，和谦卦等卦推演而来的。当今企业竞争激烈，商场如同战场，所以有的国家，如日本，即将《孙子兵法》移植转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

《易经》中的六十四卦，明显表现在军事思想上不多，从易理上来探索出来的，约有十多卦，为后世兵法家发挥衍进成为军事理论，首先从阴阳谈起。

《易经·说卦》：“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在伏羲八卦的四象之太阳、太阴等，即推衍成为军事理论。如《秘本兵法三十六计》第一计 瞒天过海：“备用则意怠 常见则不疑 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时，太阳，太阴”，后二句共四字，颇为费解。有不少研究者常略而不谈，或简略的说是阴阳并举。按这里的太阳是离卦☲，在离卦中有“日月丽乎天”，虞翻注：离为日。（《李氏易传》）太阴是坎卦☵。干宝注坎卦说：“阴气之始”（《李氏传》），坎下离上就成了未济卦☲☵。从未济卦一倒个上下，即是既济卦☵☲卦。黄巾军农民起义时，北海太守为黄巾军所围困，求救于太史慈，请太史慈转求刘备来解北海之围，而太史慈却在家中日日舞剑，无外出为北海太守求援意。黄巾军认为太史慈在战争紧急之时尚舞剑自娱。这表现为未济。一天太史慈突然出去请来刘备救援之兵，这就衍进为既济。使黄巾军意怠疑而不疑。前四句的大意是：自以为防备得十分周密，可是容易产生麻痹思想而轻敌人。平常看惯了的，往往不会生疑，秘计隐藏在阳谋中间，凭借阳谋，来求得胜利。因为人总大都是注意阴谋，要是用太阳“日月丽乎天”的明显表面化，使之“常见而不疑”以达到瞒天过海之计，也同范蠡所说的“阴至而阳，阳至而阴”异曲同工。

还有一计也是从阴阳推演为军事理论的，就是前引书第

二计；围魏救赵：攻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围魏救赵是战国时期一次重大战役，在公之前 353 年魏国军队攻入赵国，将赵国首都邯郸包围，赵急求救于齐。齐国王命田忌、孙臧率军往救，孙臧以魏国的精锐部队大部在赵国境内，要把齐国援军开进赵国境内，与赵军并肩以击魏，那就是“攻敌”，胜负不易判断，不如乘魏国内部空虚，兵力少，正是“分敌”之势，也即是“不如敌阴。”魏国的阴虚之处是容易取胜的，及引齐兵攻魏，齐兵进入魏境，魏军回救本国，长途奔走，齐军乘其疲惫，在途中邀击，乃将魏军战败，邯郸的围也就解了。史实的记载见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本计即是说，进攻集中的强敌，精锐部队，不如把它调动分散，或乘其战线拉开，兵力分散之时，再行进攻。敌人精锐部队气势正盛是“敌阳”，所以“不如敌阴”孙臧引军攻进魏境，以围魏而救赵。

战场形态万千，复杂多变，要能以《易经》阴阳理论，使之古为今用，不只是军事上的事，也可作开拓事业的指南。

再举从阴阳推演为军事理论的，即《秘本兵法三十六计》第十一计：“李代桃僵。势必有损，损阴以益阳。”军事行动容易遇到险难，险难是前进道路的阻塞，如《汉书·高帝纪》下：“五年冬十月，汉王追项羽至阳夏南，止军，与齐王信，魏相国越期会击楚（项羽）至因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守，谓张良曰：诸侯不从，奈何？良对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天下，可立致也。”汉王刘邦，被楚军击得大破，这是个损失，还势必再损，则必须损势力范围，也就是“共天下”。张良接着说：“今能取睢阳以北至谷城皆以王彭越，从陈以东傅

海，与齐王信……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至皆引兵来，……围项羽垓下。”这就是损阴以益阳，当战局发展到不利情况时，必然会遭到损失，就要舍得牺牲局部，来换回全局的胜利，阳在这里即是表示的全局。

损卦是由泰卦的爻位上下移易而来的，泰卦䷊是乾下坤上，今将泰卦的九三与上六互换，即原来的九三变成了六三、原来的上六变成了上九，用九三交换上六是损阳刚之实，益阴柔之虚，所以名损下益上之卦叫损卦。善于运用损卦易理的《秘本兵法三十六计》推演出两计。首先是第三计，借刀杀人：敌已明，友未定，引友杀敌，不自出力，以损卦推演而来，如战国时，秦赵之间的战争，赵军失败，首都邯郸被围，赵因邯郸被围而赵使平原君向楚求救，平原君率领二十人去楚国，与楚谈判了许多次楚也不肯出兵，平原君的门客毛遂上阶发言受到楚王的斥叱，在其盛气凌人之下，不畏瑟示弱，并且毫不避讳将秦将白起，一战攻下楚之郢、郢，再战而烧夷陵（楚先王之墓）辱王之祖先，这是最大耻辱，您不知这是羞耻吗？楚发兵不只是为赵，而是为楚。这一席话，说得楚王欲违不能，欲怒无从，只好低首下心，连说：“唯！唯！诚若先生所言，谨奉社稷而以从。”（《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这就是引友杀敌。楚虽出兵而损失了国力，但得到报仇之目的，赵国邯郸之围，不用自出死力，而得以解围。

其次第四计也源于《易经》损卦。在《秘本兵法三十六计》中这四计是，以逸待劳。困敌之势，不以战，损刚益柔。古兵书《握奇经》旧题风后作的，其中说：“上兵伐谋，其下用师，弃本逐末，圣人不为。”这同是推演《易经》损卦的刚柔相互转化的原理，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

出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是首先战略防御，其次战略相持，最后战略反攻。就是逐渐消耗削弱敌人的力量，使之由强转弱，而我方则由劣势转为优势，即达到“损刚益柔”的目的。

《易经》的夬卦 其中‘象曰：刚决柔也。’其理推演到军事上是说强者就势取利，征服处境危急的对方，如战国时期，在公元前 257 年秦围赵国首都邯郸，因魏楚等援军，解了邯郸之围，不久秦休整又攻韩赵，这时西周的赧王，在政治上只有空名，经济又负债累累，周天子穷到逃债的地步，竟然违背了以前“愿为秦听东方之变”的约言，加入了合纵。秦昭王大怒，令秦军进兵西周，而周王自知不敌，被迫把三十个邑和三万人口全部献给了秦国。不久周赧王病死。时在公元前 256 年。秦得到了周的九鼎宝器，这就是《秘本兵法·三十六计》的第五计，趁火打劫。趁周赧王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危机，借口周赧王参加合纵，发军恫吓，就将挂名的周天子，从历史上给抹掉了。

《易经》萃卦‘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此卦也为《秘本兵法三十六计》所发挥其哲理应用在军事上，即第六计：“声东击西。敌志乱萃，不虞，坤下兑上之象，利其不自主而取之。”如公元 260 年曹操以一比十的劣势，在官渡大败地广兵强的袁绍，以后连年进击，到了公元 205 年袁绍军全部被消灭。原因首先是袁绍庸懦无能，判断能力太差，用人不当，先是不信许攸献计袭许昌，后是根据许攸侄子贪污钱粮而责骂许攸，促使许攸投曹，而许攸又给曹献声东击西之策，扬言一路取酸枣，一路取邺郡，一路取黎阳，袁绍果然中计，袁绍父子只带着八百多骑渡河北去。这就是袁绍没有取得自方的主动权，被曹操“利其不自主而取之。”

《易经》益卦‘象曰：益动而巽。’这四个字其大意是增益

而动，又能卑顺。引用于军事行动上，是《秘本兵法三十六计》的第八计。暗渡陈仓。示之以动，利其静而有主，益动而巽。在秦末农民战争演进为楚汉战争时，暗渡陈仓是指刘邦用韩信计，偷渡陈仓，打败秦朝三个降将，而得到其封地。三十六计所说“示之以动”，正如辕生向刘邦献计所说：汉与楚在襄阳相持不下有好几年，您引兵出武关，项羽军队必南下，这是利其静，静指相持，而汉取得主动。又令韩信军在赵地活动，如此楚军被多处吸引而兵力分散，战局的结果不出辕生所说：“汉得休息复与之战，破之必矣。”（《汉书·高帝纪》）

《易经》豫卦：“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冥义是昏乱。此卦为上引书第九计。隔岸观火。阳乖序乱，阴以待逆。暴戾恣睢，其势自毙。顺以动豫，豫顺以动。”

按此卦的“上六 冥豫成”一句，这是说被逸豫冲昏了头脑，逸乐到了昏迷的程度，乐极生悲，其势必自毙，我方可顺应敌方变化的情况，相机行事，从中取利。五代时后唐李存勖就是很好例子，在庄宗纪有评论：“庄宗以雄图而起河汾，以力战而平汴洛，家仇既雪，国祚中兴……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栢沐之艰难，徇色情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有不亡。”（《旧五代史·庄宗纪》）当敌人阵营分崩离析，自相火并之时，势必自趋灭亡，我方即可兵不血刃，取得不战之果。

《易经》需卦：“象曰：‘需须也，须义为待，’待机而动，是成功的秘诀。前引书第十六计。欲擒故纵。逼则反兵，走则减势。紧随勿迫，累其气力，消其斗志，散而后擒，兵不血刃。需有孚，光亨。”

刘邦对项羽采取的策略就是欲擒故纵。他首先对项羽低首下心。鸿门（陕西临潼县东）宴就是个例子。刘邦“见羽于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不自意先入关，而且事先对项伯说，叫他转告项羽：‘吾人关秋毫无所敢取，籍吏民，封府库待将军，所以守关者，备他盗也，日夜望将军到，岂敢反邪。’”（以上两处引文俱见《汉书·高帝纪》）这就是老子所说：“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三十六章）最后终于灭了项羽。

以上是十六计标题所举的历史实例。至于其内容所述，可以举东周战国时乐毅伐齐事，燕联合秦、赵、韩、魏四国之兵，把齐国打得大败，六个月之间，攻下齐地七十余城。只剩下即墨与莒城。乐毅认为齐只存此二城，二城的命运完全在他掌握之中，想以恩取下这两个城市，下令军中：城中居民有出采樵者，听之，其有困乏饥饿，给以食物，诱其自降，也就是紧随勿迫，消其斗志，以兵不血刃，取得胜利，后来乐毅因功高受人忌妒，军权被夺，本人因之离开燕国去赵，这段历史发生于公元前 284 年至前 279 年。此计未成，不是兵法之误，而是受阻于燕国内讧。因为需卦卦辞上说：“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用现代话来说，即是：需卦的现象是有孚信可征的，并具有光明又亨通的现象，但是须要坚持正道，才有吉利，利于涉水通过大的河川。

《易经》蛊卦：“彖曰：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巽为阴柔之卦。西汉景帝出兵讨伐七国之乱。这是刚上，而统兵之将帅周亚夫所采取的战略是柔下。首先周亚夫说楚兵势强，不能与它争锋，放弃梁地给它，然后断它粮道。文帝同意亚夫的策略，当梁地告急，亚夫也不派兵救援。又不接受吴军的挑战，坚守不出，只派轻骑绝吴楚兵后，断绝其粮

道。时间一长，吴楚兵饥死叛散，周亚夫纵军出战，大破七国之兵。平定了七国之乱。

周亚夫的战略，也同引书二十一计金蝉脱壳所言相近似。其计为：“存其形、完其势、友不疑、敌不动、巽而止，蛊。”周亚夫为保持全国协调一致，避开走函谷关至洛阳的山路，绕道从长安向东南行，到了洛阳军械库，都以为周将军从天而降，使友（诸侯）不疑，七国之兵也不能任意而动，候其粮绝卒饥，也就是巽之柔而止蛊。按蛊即惑乱也。吴王鼓惑其他国以反景帝削藩之乱。

《易经》睽卦“象曰：上火下泽君子以同而异。”睽卦是离上兑下，是上火下泽之象。火焰是向上升的，水是往低下处流动，两者不能接触，《序卦》上说：“睽者乖也。”乖是彼此分离开的意思。军事家从睽卦悟出，当军事活动受到地理条件限制时，是攻近处的敌人呢？还是进攻隔有别国的敌人呢？这在战国时范雎入秦，能拜为客卿，参谋军事，就是他反对越人之国而攻敌。他说：“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而王之寸，得尺而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不亦谬乎？”（《战国策·秦策》三）《秘本兵法三十六计》的二十三计其题目是“远交近攻”。其计是“形禁势格，利从近取，害以远隔。上火下泽。”范雎的远交近攻，其施行上具体方案是：必须先与韩亲近，以威楚国与赵国而使齐国惧怕，等到齐国服从秦国后，是远交之局已成然后转向近邻的韩魏进攻。后来伐魏破韩，大破赵国于长平，就是远交近攻取得的成果。这就是兵家从“君子以同而异”的道理伸衍到政治军事行动上。

《易经》困卦：“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大意为作事奉公守法居中履正的领导者，虽处于困境，而能获吉，并且还能免去过咎。但是光说空话是不能取信的。春

秋时郑国外受楚晋两强夹剪，是处在困境，一时举动失正就会引来外患。公元前 565 年郑国为向齐讨好，出兵打败了蔡，蔡国是亲楚国的。全国上下都在庆祝胜利。郑国的著名政治家子产当时才十五岁，却把即要到来的困境判断出来。子产说：小国没有把内政管好，却先立了战功，那是祸种，楚人来讨怎么办？依了楚，晋人来讨怎么办？从今以后至少有四五年郑国不安宁。果然不到一年，晋楚的兵接连来到郑国。

困境能处理的好，就能免去兵临国门的战祸。如公元前 541 年楚公子围（即后来的灵王）领着一大班人马来郑聘问及娶亲，要进入城内的客馆，子产派行人去劝阻，才答应驻在城外。到了吉期，公子围又要率众人城迎亲。郑国越发疑惧，子产又派人去谈说鄙邑太窄小，容纳不了贵公子的跟从众人。请在城外作行礼的场所，公子围的代表则以事关体面，坚决不同意，郑国人便直率的说：小国没有什么罪，惟依靠外人才真是罪，本来要依靠大国保障的，但恐怕有人不怀好意，要计算人。万一小国失了依靠，诸侯不答应，要和贵国捣乱，那时小国也过意不去。公子知道郑国有准备，只得命从人倒挂弓袋入城。这就是“困、亨、贞……吉，无咎”把困卦引伸到军事上，可以前引书第二十四计。假道伐虢。这个历史成语见于《左传·僖公二年》和《孟子·万章》。此计是：“两大之间 敌胁以从 我假以势 困 有言不信。”春秋的时候，宋在晋楚两大之间，宋背楚投晋，公元前 631 年楚伐宋，楚王亲征，带了郑、陈、蔡、许几个小国的兵，围了宋，宋一再向晋告急求援，晋先用计拉拢齐秦，叫宋国贿赂齐秦两国，替宋国向楚求和，然后拘留了曹国的君送给宋国，曹原是宋的属国，现在降楚与宋为敌，楚因曹的

遇，必不与宋和，这样晋就得到齐秦的合作，然后又激怒楚将子玉，晋兵退避三舍（舍为军队一日之行程，计三十里，三舍共九十里）避开楚军进攻。在公元前 632 年三月，晋楚在城濮（今山东范县西南）正式开战，晋以少数兵力，击败力量较弱的陈、蔡军和楚右军，同时将主力伪装退却，伪装的巧妙，一是将两面大旗向后退去，大旗就是大将所在，显现出大将已退，另一是以兵车拖薪柴扬起灰尘，造成全军退走之象，果然把楚军诱得前进，遭到晋军的夹攻，楚军大败。这就是晋“假以势”解救了宋的困境。

西方研究《易经》，用于军事方面，老友丁善懿教授，曾写了一篇：《易经与现代战争》介绍了西方运用《易经》理论，研究现代战争。今将此文简介如下：《易经》的核心思想是和平，天下一家；但为捍卫和平，求得世界大同，必须研究消灭战争的对策，文字是含蓄的。周文王被暴君纣王囚于羑里时，他在狱中潜心研究古易，推演易理而作《系辞》，实际是灭纣兴周的战略指导方针，所以措辞用语十分谨慎，几乎全部用的是含蓄隐喻来表达他的思想。

《易经》的战争思想与现代战争概念相近，《易系辞上传》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如果把太极看作战争，则两仪的阴阳，便是政治战争，与军事战争。古时将帅左右都有所谓“谋士”或称军师以辅佐策划，如今之幕僚、参谋人员。两仪生四象与现代战争的军事和政治组织中的幕僚机构非常吻合，这些机构概分为人事、情报、作战、后勤四部分。

八卦可以认为是士象或幕僚机构所研讨出的

八种作战方案或原则。分述于下：

1 乾为阳刚主健，是刚性的军事作战原则，《说卦传》：“战乎乾……言阴阳相薄”。所谓阴阳相薄，就是阴阳交战，在这里阴代表邪恶，阳代表正义，很明显的说明了乾为军事战争的含义。

2 坤象阴柔主顺，是柔性的政治战争要领。

3. 兑为泽，乃沼泽地作战。

4. 艮为山，是山地作战。

5. 离为火，《孙子兵法》有火攻篇，现代战争中的空军轰炸。

6. 坎为水，古人有所谓水战，即现代战争中的海战与河川战。

7. 震为雷。雷霆之动，势不可当，是正规作战或正面攻击。

8. 巽为风，飘忽不定，无孔不入，即现代之游击战。

在《说卦传》有：“天地定位 山泽通气 雷风相薄 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更可说明各种作战相辅为用的道理以及变化的法则。

自古以来，有战争就有胜负，胜负是相反的两面，这便是“八卦定吉凶”。

我们都知道战争胜负对于国家民族是生死存亡的大事，应该趋吉避凶，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努力于国家社会建设 重视对敌的政工作战与巩固国防 这是“吉凶生大业”的道理。

乾卦的军事作战原则

“乾，元、亨、利、贞。”按“元、亨、利、贞”四字是《易经》一书的精髓，是万事万物的通理，更是决定军事行

动的准则。所谓“元”就是伟大的意思，“亨”是通达，“利”是福国利民，“贞”是正义，是正大光明。从军事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的军事行动，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它关系着国家民族的生存死亡，为求亨通利达，就必须是堂堂正正的仁义之师。这就是说，出兵打仗，必须是为正义和公理而战，不是侵略别人国家，掠夺别人土地，这样才能得人心，才可以平定天下。

“初九，潜龙勿用。”《孙子兵法》说：“兵者，凶器也，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不修，”孙子对这句发挥的最深刻，在《首计篇》就提出警告，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个兵字，即指用兵打仗而言。在《谋攻篇》中接着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打一百次仗，一百次都打了胜仗，实在了不起，为什么孙子说不是最好的事呢？因为战争消耗最大，破坏也最多，战争次数多了，无论怎样富强的国家，也会弄得民穷财尽，且树敌太多，终必败亡，远之拿破仑，近之为希特勒，可为殷鉴。所以最好是不要作战而能使敌人屈服。孙子《火攻篇》说：“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这些都是潜龙勿用的最好注释。世界上只有瑞士这个国家，深得其中三昧，所以历次世界大战，他们都没有受到影响。……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当国与国间因利害冲突，经过若干时日明争暗斗，形势日益恶化，双方不得不以兵戎相见，这就叫做“见龙在田。”这时胜负关键，在于指挥

官的才能，谁的作战指挥官智计高超，指挥卓越，谁就能获得战争的胜利。孙子用“将孰有能”作为判断胜利因素之一，这就是“利见大人。”《象辞》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孙子所谓“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些都是一个作战指挥官所应具备的条件。

“九三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当两国交兵之际，三军统帅与战场指挥官，皆负国家兴亡重任，君子指统兵的将帅，如能这样，虽处最危险境地，最后还是可以获得胜利而无损失。

“九四 或跃在渊，无咎”跃是飞跃，就是空中有我们空军的飞机活跃，也就是保有空中优势；在渊指海洋与河川，就是我们的海军与商船乃至潜艇都能在海上和河川自由航行，也就是保有海上优势。既然保有空中和海上的优势，那么，我们的损失就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而无咎了。

“九五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九五阳则居上卦之中而得正位，是盛极一时之象，故说“飞龙在天”。就军事形势言，既有初九的养精蓄锐与完善的准备，九二的慎选将才，九三的惕励努力，九四的空中优势与海上优势的保持，可以说已形成绝对优势，因此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有如“飞龙在天”无往不利。但是为什么还要说“利见大人”呢？因为军事力量极盛之时，最怕的是将帅产生骄傲的情绪，所谓“骄兵必败”；同时也怕滥杀无辜，如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大屠杀，杀死平民三十多万，使一般人民自动投入抗日行列；德军在乌克兰残杀四十多万战俘，因而激起苏军誓死抵抗，终使德军腹背受敌而败亡。所以乾卦在此极盛之时提出“利见大人”的警告，因为“大人”是有仁德的天子，才不会骄纵，

滥用军队残杀无辜，造成无可补救的损失。

“上九 亢龙有悔。”亢为穷极高远的意思，爻位已进至极峰。如果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已登峰造极，很少不为野心政治家所利用来征伐四方，成为帝国主义危害世界人类的工具。但盛极必衰，暴政必亡，侵略必败，这是自然定律，古今中外史实俱在，远的不说，希特勒，日本帝国主义都是铁证，故说“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这是警告一些有野心的将领，不可恃仗有点战功，或拥有若干军队而争权夺利，结果身败名裂。三国时诸葛武侯致曹真书曰：“夫为将者，能去能就，能刚能柔，能进能退，能弱能强……。”这是范蠡，张良之所以功成身退，而名留千古，文种、韩信恃功亢进而祸及身家。当今世界因功高争权身败名裂的，已经很多了。再就乾卦的卦象说，六爻纯阳已进至最高位，必须要变，每一爻奇变为偶，六爻齐变而成坤，变爻变卦，是演阴阳造化的作用，所以称之为用。阳数由七到九，阳象刚健主进，故不用七而用九，纯阳变为纯阴，阴象柔顺主退，所以以不居首为义，如能以刚健为体，柔顺为用，能刚能柔，能进能退，则无往而不利故“吉”。

坤卦的政治作战要领

现代政治战争，是以武力战争为中心，思想战争为根源，谋略战争作决策，群众战争作基础，组织战争为布局，形成直接的心理战争与秘密情报战争。始终为保护自己，壮大自己，消灭敌人，瓦解敌人而努力。在时间上不分战时与平时；在空间上没有前方与后方，在方式上可并用可分用，可明用可暗用，千变万化，人莫知其道。

《易经·坤卦》说：“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

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文王深知当时的西伯，在国力与武力上都不是殷纣的对手，何况自身还处于纣王囚禁之中，怎样作才能旋乾转坤，转危为安，而获得最后的胜利？经过深思熟虑与易理推算，惟有逆来顺受，处处表现懦弱无能，有如牝马的温良恭顺，来消除纣王的戒心，但是这种温顺是有计划的“柔性攻势”，是为了将来的武力战争作准备，所以象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意思是说，政治作战，是顺军事作战的需要，从万事万物去创造发展。象曰：“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说文王地位在纣王之下，体会坤象艰难险阻，极力培训浑厚的德性与器量，忍辱负重，福国利民，就象大地承载万物一样，凡有所作为，要先使敌人思想发生错误，行为上偏离正道，如纣王宠信妲己、沉迷酒色，任用小人，残害忠良，以致众叛亲离，然后武王才能一举灭纣，这就是“先迷后得主利”的道理。当时西伯就殷商版图言，地属西南在坤方，坤为太阴，相邻的巽、离、兑为少阴，系属同类，易结为盟友，共同对付东北的敌人——纣王，何况文王一直施行仁政，减轻刑罚，减少赋税，且以身作则，教民以孝悌忠信，早为各方响往。而东北方面的纣王，则横征暴敛，荒淫无度，也早已失去民心，陷于孤立。所以说“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但仍安守正道，始终如一的去做，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故说：“安贞吉。”春秋时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灭吴战略，民国时蔡锷化装逃出袁世凯控制的京师用小风仙的迷惑战术，使护法战争成功，袁世凯失败，都是符合坤卦政治作战要领的。

“初六 履霜、坚冰至。”这是讲情报战，从字面上解释是“践踏着地面的霜，便知道坚冰的季节快要到来了。”如深

入分析，可以得出三种含意，第一要实际去践履，第二是先知，第三要谨慎秘密，这些都是情报战的主要原则。孙子《用间篇》：“凡兴师十万，出兵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以争一日之胜，而受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意思是说，战争的耗费非常之大，如果吝惜一点情报费用而不知敌情，是最没有仁义道德了。从来有明德的国家元首与贤能的将帅，不作战则已，一旦作战就必定打胜仗，为什么呢？不过先知敌情罢了。要先知敌情，不是求神问卜，随意揣测可以办到的，必须从所派情报人员去实际搜集得来，这里的“履”指情报人员实际搜集情报工作，“霜”指情报工作的资料，“坚冰至”就是预先了解的敌情。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这是思想战与组织战。“直”指思想，“方”指组织。“大”是广大群众。直是正直，是真理，是主义，思想战的目的是以正确的思想，完善的主义，以自己坚定的信仰动摇敌人信仰，争取广大人民支持，打击敌人民心士气。孔子所谓：“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也是这个道理。方有方法、方面、方圆之义，方面、方圆皆有一定空间，组织战是运用有计划，有系统的方，先在全国范围内，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使敌人无法渗透，再向敌人内部发展组织到哪里，哪里就是政治作战的据点，这种组织不必拘于旧有的习俗可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出现，发挥组织群众，运用群众，瓦解敌人的目的。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知光大也。”这是心理

战的要求，执行心理战的人，要内含章美，外表贞固，没有成见，有始有终的为国家民族奉献牺牲，这是在精神意志上打击敌人，使敌人精神崩溃，意志动摇，因而心理转变，组织瓦解。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这是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群众战，括，是运用各种组织结合群众，进而利用群众去打击敌人，或引诱敌人入我囊中，再扎紧囊口，由我摆布，指挥者在幕后运用群众代为工作，也由敌人难以发现我之存在，所以没有灾难没有毁誉。

“六五，黄裳元吉。”这是谋略战。六五阴爻居上卦之中，有领袖群伦之象，而黄为土的正色，土居五行中心，金、木、水、火，无不附托于土，裳为裹护下体裙裤之属，变坎为比，则有视比之象，足以说明六五虽居高位而与其他各爻同属有不可分之亲密关系。就拿政治作战来说，谋略战居于决策地位，从政策、战略、战术、战斗的每一阶段，皆以高度智慧策定对敌谋略，使思想战，组织战，心理战，情报战，群众战发挥综合力量，达到不需武力就能屈敌之兵的效果。

所以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也正是谋略战的意思。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这是说政治作战没有收到预期效果，最后只有兵戎相见，以武力来决定胜负，但武力战必然都有相当大的伤亡，非万不得已，最好避免发生，所以象辞说：“龙战于野，其道穷也。”就卦象说，上六为坤阴的极位，象征阴盛逼阳，正反两股力量，相持不下，势非决于一战不可，何以不说明交战而称为龙战呢？因为阳代表正义，阴代表邪恶，阴威逼阳，有如邪恶的反动势力嚣张，几

乎把正义蔑视得不存在，因此发生战争，战争是由军队来执行，而龙代表军队，故称龙战，血属阴类，战争双方必然要流血 所以说：“龙战于野 其血玄黄。”用六、利永贞。”阴象柔顺可退，所以阴数由八退六，故称用六而不用八，纯阴变为纯阳，象征柔顺为体，刚健为用，与乾卦用九恰相对，利在永恒贞固。政治作战不分战时与平时，也没有前方与后方，永恒的在战斗中，唯有正义永恒不断战斗，才能保证最后的胜利 故说“利永贞。”

以上引述的丁文，是他就西方运用《易经》理论研究现代战争的成果论述。

第五章 《易经》与中医学

《易经》与中医学的关系有三种说法：医源于易，医易相通，医易同源。三种说法各有理由，以第一种说法的理由较为充分得当。因为《易经》的形成到成书，皆早于我国古老的第一部中医经典《内经》。

《易经》与中医学有密切的关系，虽然早有人论述易医关系，在春秋时期时就有人将易理用于医学上，但是由于《易经》源于卜筮，是以符号图象及寓言表达思想，因此历代被人目为玄学，再加上汉朝时纬之学大行，给易学加上了神话色彩，所以易医关系，一直不为人所重视，而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中医学启蒙书——《医学三字经》中，当论述到臌胀病机时，即以《易经》八卦道理，结合人体脏腑来说明，书中有四句说：“单腹胀，实难除，山风卦，指南车。”作者陈修园所说的“山风卦”，即是《易经》的蛊卦，巽下艮上，陈氏为了顺口合韵，用了山风卦三字，这在六十四卦中是没有此名称的，这就给初学医的人，又想学易增加了阻力。按蛊卦，巽下艮上，巽为风，艮为山，蛊字从文字学讲从虫从皿，也就是虫聚生于器皿中，必然促使物品腐败。陈氏以蛊卦之象比拟单腹胀的病机，以卦象之理来分析本病，定出了治疗方法，如指南车一样指示方向。本卦“彖曰：刚上而柔下”，因为艮为山，山性刚硬而又居在上，巽为风，性质属木，是柔软的又居下，所以说上刚下柔。从人事上说，上情高亢而不下接，下情难于上达，造成闭塞不通，事情就趋向

败坏。单腹胀之病也与此理相同。巽是风又是木，木本可以疏土，现在脾土之气太盛所以反而压侮了木；出现了巽木不能下疏脾土的雍滞现象，脾土反而积在木上，造成土盛木郁的现象，因之上下不能交通形成此症，此卦象是刚柔不济，在医治上应宽柔相济，以药助肝木之气，来疏理脾土之雍，既不可过柔过刚，又不能攻邪以伤正，也不可只扶正以却邪，宜攻补兼施，治疗时还要看病情缓急来处理。

以上举的是从中医书启蒙课本一例说明医易的关系。以下从古史看，《左传·昭·元》：“晋侯（平公）求医于秦，秦（景公）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疾如蛊……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春、夏、秋、冬）序为五节（五行之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因物也。赵孟曰：良医也，厚其礼而归之。”《左传》所载晋侯之病，秦名医医和也以蛊卦之象，比拟色欲过度，造成身体虚弱的不治之症，文中还举出《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易经》的蛊卦之象与腹胀的病机，和性欲放纵造成的病机相似。这全是以八卦之理结合人的身体来阐明的。

明张景岳（1562-1639）在《类经图翼》中说：“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即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左传·昭·元》所引医和的话天有六气四时，会给人造成疾病，天人合一，正如张景岳所说天人一理。

古编年体史书《左传》记载医和已将《易经》太极阴阳八卦之理用于医学之中，但医和未留下著作，所以最早采取《易》理以形成医学理论体系的，还是成书于战国及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

《周易·说卦传》：“昔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①这几句话说的是阴、阳、天、地、人等方面，易传的作者是继承远古社会的人们在劳动与生产的活动中积累了经验，掌握了气象变化的规律，发现宇宙间万物运动的变化，是由一气所产生的，而这种万古运动不息的原动力，是来自太阳，白天有太阳的时候，万物生长活动，晚上没有太阳，天上只有明亮的月光，万物只能伏匿偃息，后来进一步发现，上而日、月、星辰，下而山岳河川，大而天地，小而一草一虫，无不存在着相反相成的情况，古人遂将认识到的客观世界规律，用阴阳两字来概括。《易经》用两条线来表示阴阳爻，阳爻是一条直线，如一，阴爻是一线断开为二，如—“；易经卦是由三爻组成，别卦六爻组成，初、二爻为地道，三和四爻为人道，五和上爻为天道，以代表天地人，古时叫“三才之学。”别卦是六爻，由经卦三爻重加，六画成卦是六十四卦。

三才之道是《易经》标出的思想纲领，中医理论是援“易”之三才，《内经·素问》：“上应天期阴阳往来，寒暑随，……可得闻乎？”岐伯回答：“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阴阳既是客观世界规律的统一体，存在于两种相反相成的局面。中医学在人身来说，内有

阴阳，外也有阴阳，内五脏为阴六腑为阳；外则筋骨为阴，皮肉为阳。古人讲病理，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阳盛则热，阴盛则寒。

《黄帝内经》中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又说：“治病必求于本”，这里说的“本”就是阴阳，也就是说：治病必本于阴阳，将阴阳由生理引伸到病理，则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中之脏腑中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此皆阴阳表里内外，雌雄相输应也，故应天之阴阳也。”^①在病理上说：“阳盛则热，阴盛则寒，阳虚则寒，阴虚则热”同上书《阴阳应象大论》^②后来有了所谓八纲辨证，就是本八卦来的，是将错综复杂之病。归纳为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四个对立病症的辨证关系，用来掌握病症好为治疗定出方向，其中阴阳两纲，是概括其他六纲的，其思维是渊源于“易”理。体会好八纲中阴阳，可用于健康养生，如：“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同上引书）简单说来即保持身体阴阳平衡。

按《易经》《黄帝内经》二书之文深奥抽象，难于译释，今举古代精通医易的名医著作，从这些人的医术与“易”理的成就方面，从侧面来补充译释《易经》《黄帝内经》的深奥晦涩。下举五家。

（一）张介宾，字惠卿，号景岳，著有《类经图翼·医易义》他以卦爻配脏腑，他说：“以肝象言之，则自初六至上六，为阴为脏；初六次命门，六二次肾，六三次肝，六四次

^① 《黄帝内经·素问·金匱真言论》。

古治疗法上说：“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同上书《至真要大论》。

脾，六五次心，上六次肺。初九至上九，为阳为腑，初九当膀胱，九二当大肠，九三当小肠，九四当胆，九五当胃，上九当三焦。”又以人之形体各部配八卦，如说：“乾为首，阳居尊上也；坤为腹，阴户容物也；坎为耳，阳聪于内也；离为目，阴明于外也；兑为口，折开于上也；巽为股，两垂而下也；艮为手，阳居于前也；震为足，刚动于下也。”先天图者，环中也，环中者，天之象也。六十四卦列于外，昭阴阳交变之理也。太极独运乎中，象心为一身之主也。乾南坤北者，象首腹之上下也；离东坎西者，象耳目之左右也。”并以六十四卦的递次变化，表示人之生长衰老过程。如说：“自复至同人，当内卦震离之地，为阴中少阳之十六，在人为二八；自临至乾，当内卦兑乾之地，为阳中太阳之十六，在人为四八；自姤至师，当内卦巽坎之地，为阳中少阳之十六，在人为六八。阳生于子而极于午，故复曰天根，至乾为三十二卦，以应前之一世；阴生于午而极于子，故姤曰月窟，至坤为三十二卦，以应后之半生。前一世始复之一阳，渐至增添，至乾而阳盛已极，乃像人之自少至壮；后半生始于姤之一阴，渐次耗减，至坤而阳尽以终，乃象人之自衰至老。”这一段论述，完全本于《素问·上古天真论》的“七损八益”之理，以六十四卦来表示人的整个生长衰老过程。张景岳结合天人合一之规律，将卦之爻数与人身脏腑经络之数相提并论：“质诸人身，天地形体也，乾坤性情也，阴阳气血也。”“故以爻象言之，则天地之道，以六为节，三才而两，是为六爻，六奇六偶，是为十二，故天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脏；天有十二会，人有十二经；天有十二辰，人有十二节。知乎此，则营卫之周流，经络之表里，象在其中矣。”张氏以人之身配八卦，以爻次配及腑，以六十四的变化次序，来表示人

的生长衰老。比拟虽有些牵强，但基本并不荒谬。

唐宗海以八卦所代表的八种物象，即天地风雷山泽水火，来推衍人的胚胎形成，见于他所著的《医易通说》，他说：“推衍八卦之序而知人之初胎在母腹中，第一月只是一点元阳之气，以应乾一；有气即有液，第二月气又化液，以应兑二主津液；第三月气泽合化为热，以应离三；第四月振振而动，以应震四；既震且动，则有呼吸，象风气，第五月子随母气而有呼吸，以应巽五，第六月胎水始盛，以应坎六；第七月子之肠胃已具，以应艮七，主中土；第八月肌肉皆成，以应坤八，形体俱全。”虽然唐氏在《医易通说》所推衍人之胚胎形成，不合现代科学，缺乏可印证的理论是牵强附会的，限于时代与条件的限制，只备一说可以了。

郑钦安著有《医理真传》，他在其著作中，以坎离二卦象心肾，统一在水与火的关系上来阐明肾的生理病理，在这方面有独创的医疗方法，郑氏就卦象来说，则以坎为水，离为火，六十四卦中有：既济卦和未济卦，坎上离下为水火既济，倒过来，离上坎下是火水未济。以心肾二脏来说，则以肾为水，心为火。若心火下交，肾水上承，则是心肾相交，是人的生理正常状态。如心火上炎，肾水下流，就是心肾不交，是病变之理。郑氏在其所著书中说：“人禀天地之正气而生，此坎离所以为人生立命之根也。固肾中真阳，肇自坤元，乾坤彼此互为其根。心火下交于肾，肾水上济于心，一升一降，往来不穷，性命于是乎立。”他本人自创制有补坎填离丹，用治心阳虚，以大辛大热之桂附为君，补坎中之真阳；用蛤粉补离中之真阴；加姜草调中，而作为交通上下之机枢。再用以交泰丸，取其象天地交泰之义。《易经·泰卦》：“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将乾下坤上

之泰卦，倒过来即成否卦，否卦是坤下乾上，是上下不通之象，即，否。所以痞症病机，是取其天地之气痞塞不通之义。因为心阳中藏有真阴，若不下交，则当责其阳之偏亢，若上焦心阳偏亢，心阴偏虚，阴不济阳则生热，就会导致心火上炎之阳实症，治疗办法，采取实则泻之，用苦寒之黄连把上炎之火摧折往下，引导心火下行。从中医理论上说，肾阴中藏有真阳，若下交肾水不能上承，就应当责其阳偏衰，若下焦肾阴偏衰，肾阳偏虚，阳不化阴则生寒，就会发生阴液凝滞之阳虚症。对于虚就用补法，所以用甘辛大热之肉桂，温补命门之火，鼓舞肾气上升。如此一补一泻，一清一温，调和了坎离水火，心肾阴阳之升降，则水火既济，天地交泰了，也就可以治好痞病，所以取名为交泰丸。

吴鞠通著有《温病条辨》书中在讨论三焦温病的的病理时，多按易学原理进行分析，他以八卦之理结合病机来阐明处方之义。今以其大小定风珠一方为例 吴氏说“名定风珠者，以鸡子黄宛如珠形，得巽木之精，而能息肝风。肝为巽木，巽为风也。龟亦有珠，具真武之德而镇震木。震为雷，在人为胆，雷动未有无风者，雷静而风亦静矣。亢阳真上巅顶，龙上于天也，制龙者，龟也。古者蒙龙御龙之法，失传已久 其大要不外乎此。”这个方治温邪久踞下焦 消灼肝阴而气闭，所以扰动冲脉，造成呃逆、干呕，肝横强则脉细而劲，所以，用鸡子黄实中土而定内风；龟板补任脉而镇冲脉；阿胶益阴降逆而息肝风；淡菜生咸中（海产）而味淡，外偶内奇，有坎卦之象，能补阴中真阳；再配合童子便，因为童便浊液而潜阳上动起促进药性作用。

另有一部是初学中医的简要课本，名《脏腑通》，是清末清初四川名医何仲皋著。书用西江月调写的。为的是便记

诵，现举几首与上文有关系的介绍如下：脏与脏相通

心肝

离火在天为电，震雷引以为鞭；
心怒遽动将军官，气结胁间不散。
厥阴肝气上逆，心痛疼热不堪；
舌卷囊缩病相连，皆是二经之变。

《易经·说卦》：“离为火 震为雷。”离火在天之象即是闪电，闪电先见火亮，然后就闻到震雷之声，古人以震雷挥动闪电像鞭子似的，如《淮南子·原道》卷一：“电以为鞭策”。中国传统医学结合人体脏腑，离火指的是心火，震雷指肝经之气，离震二卦既如天之雷电，心与肝二者之功能也像雷电活动之相连，人的身体如一脏有病，就会引起另一脏发生病变。

心肾

离火原为心脏，坎水则属肾经；
坎中一阳会离阴，心肾相交无病。
既济中藏未济，微理阐自易经；
水气上泛作奔豚，思患预防要紧。

心肾在这首西江月是以易之坎离为代表的符号，也就是坎离水火即指肾心。心与肾之关系有二：一是水火互济；二是精与神的互根。心居上焦，其性主动，故以火为主；肾居下焦，其性主静（藏精而不泄），故以水为主。心阳下降温暖肾阴，肾阴上济滋养心阳，上下相交就无病，因为动静相合，形成一对矛盾的统一体。这种现象在《易经》为既济卦，也就是水火既济，在中医上称心肾相交。怎么叫既济中藏未济呢？那就是阳气不足，肾水不化，水气逆而上犯，会造成“水气凌心”的心悸症。如果肾水“水”指阴精而言不

足，不能上济心火，心火独亢，会出现失眠、健忘、多梦等现象。《易经》中未济卦的水火未济，引伸到中医理论上，就是心肾不交的病症。

第六章 从九宫图到幻方和“易” 与天文历法的关系

《周易乾凿度》：“太乙取其数以行九宫。”这是现存古籍中关于九宫的最早记载。到了《唐会要·九宫坛》中，就把天文与八卦连系在一起了。什么是九宫？《数术记遗》中的甄鸾注曰：“九宫者，即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九宫图后又名纵横图，至于幻方是西方所起名字，这三个名称乃是一事三名，西方有卓识的科学家普遍承认的，我们反把它忘了。《易经》与原始天文历法和九宫图、纵横图、幻方的关系，本章源源本本的简述，因为此事涉及面广，学术性又强，本书不是论著，所以只得从简说明。最古的预测是卜筮，古时候人们认为以占卜可以测到吉凶丰歉，但也认识到天文历法知识的重要性，所以古人在测天方面非常积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食物多少问题。原始社会的人们穴居野处，席地幕天，仰观天空的夜间星象，繁星布满天空，那时尚无文字，又不知以筹记数来使人保留下所观察的知识。天文学肇始于星图，原始社会人们最先在石面上钻以点或圈，这就是最古的星图，可能就是古史传说的“河图”。苏联在考古上发现一个三万五千年前的星图。苏考古学家在东西伯利亚南部塞雅古村落遗址发掘出一幅被认为是三万五千年前制作的星图。据鉴定这个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星图刻在一个石制的龟壳上，星图标明是北半球星座的情况。一些大的星星在这幅星图上以小而深的圆坑标示，最

大的圆坑标志的是北极星。……

苏联出土的星图同《易经》所言的“河出图，洛出书……”(《易系辞·上》)是近似的，其相同之处在于天文历法上，下文就说明之。

古代测天，将星象记于石及其物上，这是天文历法的萌芽。《易经》源于古代天文又可以从几方面来证实天文与易的关系。《晋书·天文志·上》：“古言天者三家：一曰盖天；二曰宣夜；三曰浑天。……周髀者，即盖天之说也，其本庖牺氏，立周天度数，其所传则周公受于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②古代盖天派天文家，怎样对天体进行观测，主要是仰卧或站在地面上，仰观俯察，所以只能半面半面的看，白天看上半面，晚上再看下半面。前引书云：“又周髀家云：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传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同上引书：“葛洪释之曰：浑天仪注云，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故二十宿见半隐半。”

盖天派的天文学说来自伏牺，这是《晋书·天文志》所说，最近西方已承认伏牺为历史上的人物，国内学术界也无人反对此说，在此不讨论，现在将上引书中的要点，简要说明之。盖天派认为天圆地方，古代长期就是这样说的，因为古人尚不知地球是圆的和它公转与自转，并说“日月右行”

见《光明日报》1980年8月28日。据塔斯社1980.8.18电讯

②《周髀算经》本书年代至今难以考定。基本可以作汉代著作。它是盖天说重要著作。此书主要谈原始天文计算。

“而天牵之以西，”这是错觉。至于说“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是根据春秋时期已见记载于《周礼》的用土圭测正午日影之长短方法定的，年的周期以土圭所测日影叫晷景，景本作影，用来测日至，如夏至日中，表影尺五寸，冬至日中，表影一丈三尺。据此就定出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而实际上年为 $365\frac{1}{4}$ 度，应等于 365 天 5 时 48 分 46 秒。这是葛洪所解释合理之处。

伏牺画八卦与天文有没有关系，此事关系到《易经》与天文的关系。西汉经学家刘歆，对律历的考定最有贡献。刘说：“虑牺 庖牺 继天而亡，受河图而画八卦……”（《汉书·五行志·七·上》）此为见于《易系辞》《庄子·大宗师》《淮南子·览冥》三书外，首见于正史。后又见《三国志·魏志·四》：“淳于俊言庖牺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河图与燧皇之图二者不同，但认为是河图的为多。但图丧失于周末，或遭秦火焚了。过了一千五百年，宋·邵雍得图于陈希夷。重新出现的河图，真假问题，争论不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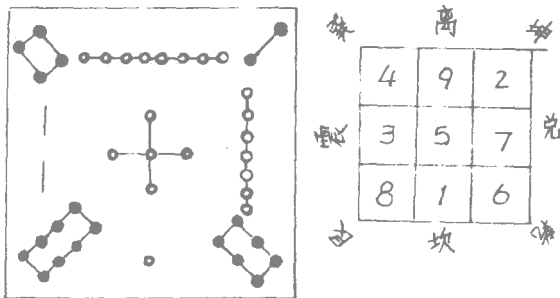
按河图洛书源远流长，确传授于世，秦汉间就有存在是可确信的，现有考古发现为证。1977 年安徽阜阳双古堆，古西汉汝阳侯墓出土了太乙九宫占盘。^①该盘与《灵枢经·九宫八风篇》图一致，也与《周易本义》洛书符合。图的真伪问题解决了。再说伏牺八卦与天文学的关系。从卦字看，从圭从卜。圭是测天的土圭，测日影用的。八卦即四正四隅八个方位来测天体变化的。以八卦符号用作为记录。卜是占卜，就是预测未来发生的事，八卦和六十四卦，卦是由爻组

①1978年《文物》第1期。

成，《易·系辞·下》：“爻也者效此者也。”即是说爻是记述天体变化之用的。最基本的变化符号有二：一是阳爻；一是阴爻。从《易经》上说宇宙间所有一切的变化，皆由“太极”一气运动所产生，“太极生两仪”两仪就是阴阳二气，也就是阴阳二爻。卦是由三爻组成的。八个经卦皆各有三爻，重卦是六爻组成，初爻和二爻为地道，三爻和四爻为人道，五爻和上爻为天道，代表天地人三个方面，古代也称作三才之学，以上见于《易系辞》，现在把系辞原文，录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汉朝孟喜创卦气，是以易卦分配十二月气候，虽然孟喜的书不传，但还见于《汉书·京房传》。按日月星辰交会形成十二气，一年二十四个节气的测定乃由此而来。可以给人示以寒暑的交替，气象物候的变化。天指天文，地指地球上的自然规律的变化，人是应当掌握天文地理，以知人事，三爻即代表天地人三个方面。

下面引一段古史来说明阴阳与四季“以阴阳言之，大阴者北方，北伏也，阳气伏于下，于时为冬，冬终也，物终藏，……太阳者，南方，南，任也，阳气任养物，于时为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少阴者西方，西迁也，阴气迁落物，于时为秋，……少阳者……阳气动物，于时为春，春，蠢也，物蠢生，乃动运，……中央者，阴阳之内，四方之中，经纬通达，乃能端直，于是四季土，稼菑蕃息……”（《汉书·律历志》卷二十一）以上引文，只就天文与易之关系，显示其一小部分，还要以《易经》之《系辞》及《说卦》结合起来，并用图及文字来说明，下面有三个图，是采取易学世家沈延发同志之《中国农历气节探原》。略有订补。

洛书



按坎离震兑是四正，乾坤巽艮是四维。

以上是洛书结合坎离震兑四正及乾坤巽艮四维名之为洛书方位图，排列组合的纵横之数相加的得数都是十五。或命名为洛书顺流图或洛书逆流图和数也都是十五。从《易经》之洛书图结合论述八卦，八卦就是乾、坤、震、艮、离、坎、兑、巽，是中国古代原始社会人民特有的认识世界、管理世界的智能符号，用这种符号，以表示宇宙间发生的事物变化。现在结合《易经·说卦》的内容文字，从科学角度，作出如下的归纳，下面每头一句的引文，全是出自《说卦传》。

一、“帝出乎震”，震属木，（按震宫八卦属木）在东方，洛书部位是三，是春季。

二、“相见乎离”离属火（离为火）在南方，洛书部位是九，是夏季阳气旺。

三“说言乎兑”兑宫八卦属金，兑属金，在西方，洛书部位是七，是秋季，水气润泽于下，故万物愉悦。

四。“劳乎坎”坎属水，在北方，洛书部位是一，是冬季。

按上面春、夏、秋、冬四季是按五行的方位，顺时针方向而定向的，《易经》没有五行一词，或认为用之欠妥，这是不明原委。《易系辞》：“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虞翻曰：五位谓五行之位]这个位正结合洛书之位。上面的数字都是奇数：1、3、7、9 另有四个部位是节气。如：

一。“齐乎巽”巽在东南方向，在洛书部位是四，节气是立夏，卦象阳盛于上，所以万物整齐。

二。“致役乎坤”坤的方向在西南，洛书部位是二。是立秋季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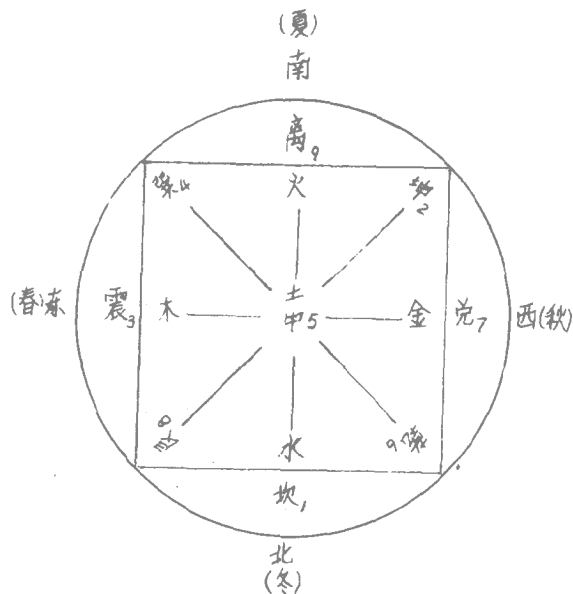
三。“战乎乾”乾的方向西北，在洛书部位数是六，是立冬季节，乾阳居坤阴之位，阴阳之气必然相搏，故曰战于乾。

四。“成言乎艮”，艮在东北方向，在洛书部位是八，节气是立春。卦象阴尽阳生，成始成终，至此是终而复始，故曰成。

现在再把《说卦传》一段文字引出如下：“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者万物之浩，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上引《说卦》这段文字现在简单说明：万物自春天开始活动，生长至秋成熟，到冬季而告终，这是从文王八卦所记的天体八节之符号，二至乃寒暑之极，二分为阴阳之和，四立是生长收藏之始。八节者八极也，是以后天之八个卦象表示之，每卦三爻，三乘八，即成一年二十四个节气。

为了更清楚的说明《易经》与原始天文历法的关系，再举沈延发同志的四季方位方向关系图，以补文字表达未及的地方。



上图的中部土居中 其数是五，《易系辞》天数五 地

数五，自古以来认为是春秋时晋国程本作《子华子》^①：

“夫天降一气，则五气随之，寄备于阴阳，合气而成体。故有太阴，有少阳，有太阳，有少阴。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故阳中之阳者火是也，阴中之阴者水是也，阳中之阴者木是也，阴中之阳者金是也，土居二气之中间以治四维。……故物非土不成，人非土不生。北方阴极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阳极而生热，热生火，东方阳动以散而生风，风生木，西方阴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中央阴阳交而生湿，湿生土，是故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②

《子华子》这段引文，若用语体文说明反而给理解增加了文繁而意不能简，不如用文字结合简表来说明，前面举洛书的四正，加上五行，如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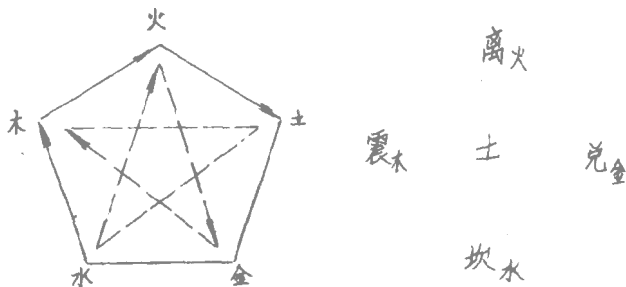
4 巽	9 离	2 坤
3 震	5 土	7 兑
8 艮	1 坎	6 乾

五是土，土居中央洛书，在中央则阴阳交而生湿，湿生土，如果把土放在金与火之间，即可表明五行相生相克的关

《子华子》《汉书艺文志》未录此书。清四库收，但疑宋时伪托。

② 《子华子·北宫意向》、《百子全书》第五册

系，以下用五角形来表示五行相生相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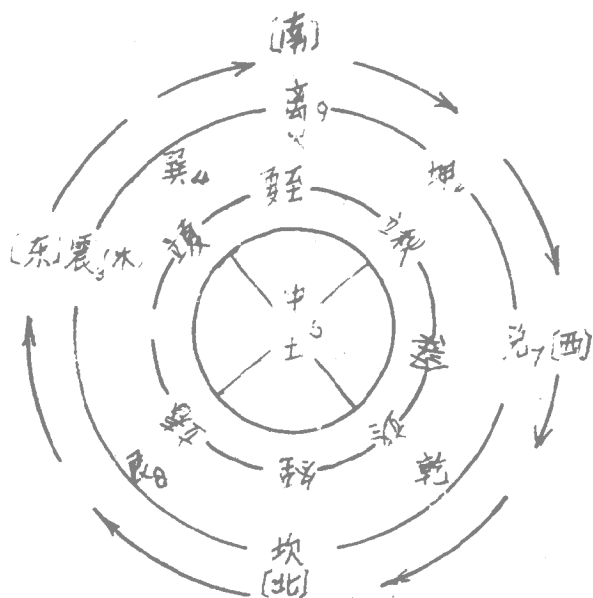


正如《子华子》书中所说：“物非土不成 人非土不生……故天地之间……不离于五（土）”《易经》之洛书的符号，是起源于原始社会的人们以各种不同方式观测归纳出来的规律性东西，是以符号来表示的，其包容广大，这里只从物候方面来谈。

我国古代殷朝周朝的时候，渭水、黄河流域，自然条件良好，给动植物的生长繁殖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动植物种类繁多，农业栽培的植物也多种多样，另外还富有多种野生植物，昆虫种类更为丰富。人类生活在生物圈之中，经过长期观察日、月、星、辰和动植物的物候变化，其记录最古而保留下的，主要是《易经》的洛书符号和《易·说卦》上的文字叙述，及见于《尚书·洪范》之“五行”，古代天文学家，据易理之盖天派将周天分成三百六十度，自春分起算，春分为零度，夏至九十度，秋分一百八十度，冬至二百七十度，更进而至春分合成三百六十度，即复于零度，其间每相距为九十度，各六分之，共得二十四节气。据清朝赵翼的《陔余丛考·二十四节气名》：“二十四节气名其全见于《淮南子·天文篇》和《汉书·律历志》……《汲冢周书·时训解》，始有二十四节气名，其序云：周公办二十四气之应，

以顺天时 作《时训解》 则其名盖定于周公。”

现在以表的形式表示，化繁为简，可一目了然。如下：



殷周两朝的时候，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在每一年，随季

节的变化，各种动植物的动态，如植物的萌芽、开花、花落、结实，候鸟的来去，都与季节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要以二十四节气，作为农业生产的安排和季节来临的早晚的指针，适时安排农业及副业生产。

为了更清楚起见，对上列的表，再加以文字的说明：

春季：

立春。立即见到之意，春是初动，在九宫的艮位。是植物开始有了生气，这一天是作为春天的开始。阴历正月，阳历二月四日至五日。

雨水。作为春雨时节的开始，从此降雨量增加，阴历正月中，阳历二月十九日至二十日。

惊蛰。春天的雷声，惊动起万物。阴历二月节。阳历三月五日至六日。

春分。分为一半之意，就是春季三月中的一半（88天或89天），这一天昼夜平分是由艮位移到震位。震东方也。东方属木，转到白天长夜间短的时节。即水生木，震的开始。阴历二月中，阳历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

清明。意为明洁，从这一时节起，气温上升。草木繁茂，就是进入春暖花开及万物生长时节。阴历三月节。阳历四月五日至六日。

谷雨。雨水促进百谷生长之意，因为此时期的雨水是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阴历三月中，阳历四月二十至二十一日。

夏季：

立夏。是木生火的中间阶段，夏季从此开始。植物随温暖的气候生长。由震位转到巽位。阴历四月节，阳历五月六日至七日。

小满，这个节气是指麦粒开始饱满，但尚未成熟。阴历四月中，阳历五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

芒种。这个节气指小麦、大麦等有芒的农作物收获。及晚谷、黍、稷播种的季节。阴历五月节。阳历六月六日至七日。

夏至。至为极的思，由巽位转到离位。离南方也，离属火，是日影长到极点之意。也即是这天的白昼最长，以后则白昼就一天天的短了。阴历五月中，阳历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

小暑。暑为炎热意，小暑是气候虽然炎热，但还没有热到极点，阴历六月节，阳历七月七日至八日。

大暑。暑热到了极点。阴历六月中，阳历七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

秋季：

立秋。秋是植物即将成熟之意。我国农民习以此日作为秋天的开始，亦即是火克金的中间阶段。由离位转移到坤位。阴历七月节，阳历八月八日至九日。

处暑。处为结束意。表示暑天即将终止。阴历七月中。阳历八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

白露。因为在这个节气，地面水气凝结为露，颜色为白，故名白露，是天气开始日渐凉爽之意。阴历八月节。阳历九月八日至九日。

秋分。是秋季三个月（88 天或 89 天）的一半，这一天昼夜平分。此后由坤位转移至兑位。兑西方也，兑属金。从此即转入白天短，夜间长了。阴历八月中，阳历九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

寒露。是气候将逐渐转冷之意。阴历九月节，阳历十月

八日至九日。

霜降。本节气是见霜的天气。阴历九月中，阳历十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

冬季：

立冬。本节气是农作物等收割后贮藏入库。习俗上农民以这天为冬天的开始。由兑位转到乾位，也就是金生水的中间阶段。阴历十月节。阳历十一月七日至八日。

小雪。这节气出现了降雪，因雪不多故曰小雪。阴历十月中，阳历十一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

大雪。进入这节气，雪即大或多了。阴历十一月，阳历十二月七日至八日。

冬至。日影已短至极点。这一天白昼最短，从此后白昼一天一天的长了。也从此进入严寒气候。由乾位转到坎位，坎北方也。坎属水，水生木也开始了。阴历十一月中，阳历十二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

小寒。冷气积久而成寒，所谓小寒是天气寒冷，但尚未到极点。阴历十二月中，阳历一月六日至七日。

大寒。是一年中最冷时期。这段时间过去，立春就将要到了。阴历十二月中，阳历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

二十四节气，是由《周易》的后天卦推衍而来。经过几千年，成为农业生产者所遵循，足以证明此原始历法对于农业生产及其他副业生产是符合科学性的。重视农时，对现代农业生产也同样重要。马克思说：“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差别，在农业上特别显著。在我们温带气候条件的缩短或延长，还要看年景好坏变化而定，因此不像真正的工业那样，

可以预先地准确地控制”^①又说：“一群羊的羊毛或收割若干摩尔根的谷物，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这种操作是否在一定时间开始并在一定时间结束”^②虽然古代中国是靠天吃饭的，但掌握好农业生产的节气，就是在较坏的年景下，也能争取到较好的收成，从而减轻了大自然的不利因素。从易理推行出的原始历所传下来的物候现象观察仍然是一条极为有用的途径和方法值得我们重视进一步研究。

前面引《陔余丛考》赵翼说：二十四节气，其名定于周公。这就令人查觉到一个蛛丝马迹，古来有称《周易》成于四圣之手，其中一圣是周公，那么周朝以后所佚失的河图洛书，说不定是周公见过的，因此二十四节气与周公有关，当然这桩历史悬案不是本书一章内所能讨论的，提出来希望引起各方面关注。

① (1) 《资本论》第二卷第十三章《生产时间》 268页

② (2) 同上引书第一卷第十一章《协作》第364页

第七章 《易经》与中国古建筑

自古以来中国建筑不受重视，比起欧美相差很多。因为不受重视，也就乏人研究，所以几千年来我国建筑学在学术史上一直无地位，我国传统文化长期囿于学术理论，尤其是自西汉武帝开始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建筑学又未成家，当然被视为百家之外的未技支流。

说起来亚洲建筑，只有三大系统，即中国，印度，和伊斯兰国家，如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印度先是信伊斯兰教，蒙古人侵入所建立，莫卧儿帝国被英国人灭亡，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印度的建筑文明，因之衰落。伊斯兰教建筑，也因欧洲殖民者入侵，也走向衰落。只有我国建筑一支独秀。虽然我国在十九世纪后半期至二十世纪前中期，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势大衰。但因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保存至今的古建筑、古典建筑以其长久的生命力和鲜明的特色大放异彩于世界建筑界，称得起冠绝世界，并为世界所公认。近现代的欧美学者，从考古学、文化史及艺术方面研究我国古建筑，但全未触及中国古建筑核心思想所在。我国古建筑之核心思想，实根源于《易经》。

易理是万物总体的规律，我国古代建筑也是循守这个规律的，以下从三个方面来揭示出易理与中国古建筑的关系。首先从《易系辞》谈到的大壮卦来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之大壮”（《周易·系辞·上》）上面引文是精炼而深奥的房屋演进过程。先把这几句话用语体文写出来：上古的时候，人们冬天

藏身在洞穴，夏天居住在野外，后世圣人为了防备风雨天气和野兽的袭击，教人们建筑宫室，上有栋梁，下有檐宇，以御风雨，这是取象于大壮卦。按大壮卦是上震下乾，震为雷，乾为天，为宇，当天上雷雨交加的时候，形势是恶劣而凶猛的，寻求应付解决之道，想出的办法是发明了房子，有一个藏身而安全的地方，是从大壮卦取象而来的。关于“取象”《易系辞》上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是说：庖牺氏统治天下的时候，所采取的治道是：上则观察天上日月星辰的现象，下则观察大地上高下卑显的各种法则，又观察鸟兽羽毛的文彩，和山川水土的情况。近的就取象于人的—身，远的就取象宇宙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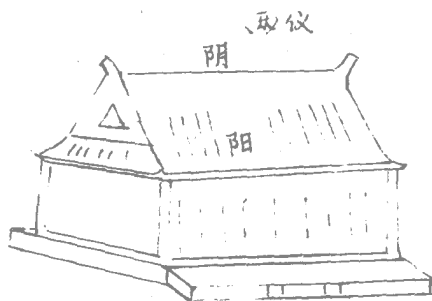
大壮卦是乾下震上，人们从此卦取象，领悟到乾是天和宇，就盖一个像天的屋顶，再配以上面的栋梁，下面檐宇，就支撑起宫室来了。这就是取象于大壮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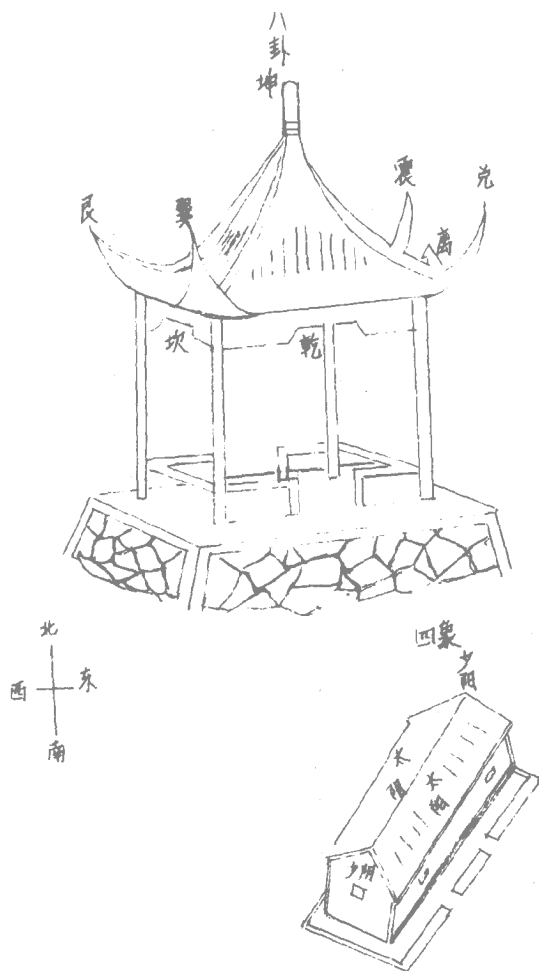
建筑首先是房屋，即古代的宫室，《易系辞》就告诉了我们它的起源，是取象于宇宙万物的。中国自古以来以宫室为主体，没有宗教气氛，古人所崇拜的是万物有灵论。祭天地、日、月、山川和祖先。这也因为中国思想的主流是儒道两家，儒家主导思想是人的社会，不说现实世界以外的神界。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又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道家后来分衍为道教，道教虽说成仙，但是道教的仙不是灵界的仙，而是与现实相当近的仙。

因为以宫室为主体，所以现存中国最伟大、最庄严壮丽的是北京故宫太和殿。它是北京旧皇宫三大殿中最大的一殿，在紫禁城太和门内，规模崇宏，雕缕工致，明清两朝国

家重大典礼举行的地方。由宫殿而发展到祭天、地、日、月、祖先的坛庙，全是以宫室为主流所发展起来的。如北京外城南有天坛，北有地坛，东有日坛，西有月坛，及市中心区的祭祖先的太庙，解放后改为劳动人民文化宫。不是像西方和印度以教堂寺庙为主体的建筑。

前面提过“取象”而取象是从观物来的，即人们日常生活与经常接触的自然现象。在易理中有八种自然物质，作为世界上所有东西的根源，即：天（乾）、地（坤）、雷（震）、火（离）、风（巽）、泽（兑）、水（坎）、山（艮），这八种自然现象，天和地是总根源，或者说是母体，它产生了六个子女，合起来就是八个基本卦，古代称之为经卦，以乾坤八个基本卦两两组成错综配合，则产生六十四卦。由卦引伸到建筑方面，古人曾有论述：“上言户者，屋之户也，此言太极者，即屋在极中，以为喻也，太极生两仪，如屋有相背两面，两仪生四象，如屋之四面也，四象生八卦，如极之四面有四正四偶也。”（包彬《易玩》）这是简单的易之太极叙述到屋的相背面和四正四偶，后来发展到其他方面。下面三图略示其要点。





上图采自《三易新论》沈祖绵著

上列三图的建筑艺术是我国传统思想的文化形象的肖像，可以从传统文化特有的智能符号——八卦，来透视古典建筑艺术的灵魂；也可以用艺术形象的分析来反观传统文化的特性。我国建筑艺术，其本质是综合性的。表现在建筑整体上，是彼此统一和互相连系的。

至于图中三个建筑物所标明的两仪、四象、八卦，沈氏在其书中也没有说明，可能是不可探考，这是因为古代建筑师不受重视，因此未留下记载。

三图屋顶，如表示八卦的亭，和两仪四象的屋顶，其屋顶皆作凹凸曲线，檐不作水平，每端翻而向上，这种现象，即是源于天幕说，是逐水草而居的远古时代的天幕遗意在建筑上的表现。

易之阴阳与五行也引伸到我国建筑学上，关系也至为密切。按五行一词虽不见于《易经》，但在《易系辞》中有两句话：“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在《李氏易传》中引虞翻注：“五位谓五行之位。”这就明确的指出五行在《易经》中是有反映的。中国从原始社会末期以来，就有了阴阳思想，阴阳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大雅·公刘》，五行一词最早见于《尚书·洪范》和《甘誓》。为了证明阴阳五行与建筑的古老关系，这里引一段古史来说明：

“以阴阳言之，大阴者北方，于时为冬……，大阳者南方……于时为夏，少阴者西方，……于时为秋……少阳者，东方……于时为春……中央者阴阳之内，四方之中，……于时为季土，……阴阳之义，四方四时主体，五常五行之象。”^① 结合上面的图与古史，不难看出阴阳五行运用于建

筑的方位上，至于五行与季节、颜色的关系，可用下面的图来说明。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方位	东	南	中	西	北
时节	春	夏	(土用) 大夏	秋	冬
色	青	赤	黄	白	黑

在建筑上的方位和阴阳，从易理上古人是怎样设计的？这里引一段古人的注解，晋朝学者干宝曾著《晋纪》，他好阴阳数术，他在《周礼·天官冢宰》在辨方位这方面曾说：“辨方位谓东、西、南、北之名，以表阴阳也，正位，君南面当阳，臣北面即阴，居后于北，以体天阳。居太子于东宫以位少阳之数。”这就说明二点：方向与阴阳关系；封建皇宫的建筑设计，皇帝坐北朝南是“当阳”，臣上朝时看皇帝面向北是“即阴”皇帝的住所是“居后于北”所以王者所居之宫在北面，太子所住的地方叫东宫，前者位在太阳，后者是少阳之数。

建筑上的颜色，虽配色以五行成为五色，但皇宫之建筑，只取青、黄、赤三色，是出于吉利的考虑的，因为青相当于温和的春天，为草木萌芽的颜色，其方位为东，是日出时候。赤相当于炎热的夏天，是火燃烧的颜色，其方位是南，时间是正午。黄相当于土之色，其方位是中央。白相当于清凉秋天，也属于金属光泽的颜色，方位为西，是日落之象征。黑相当于寒冷的冬天，像深渊的水色，方位在北，是夜半。从古以来，传统上认为五色各有象征，如：青象征着永久、和平，赤象征着幸福、喜悦。黄象征力量和富裕，白

象征着悲哀，黑象征着破坏。中国传统文化认为颜色有象征性，今举与《易经》有关的一项，如《易经·说卦》中说：“乾为天为君，……为大赤。”

我国建筑受《易经》及传统文化的影响，所以对建筑的装饰用色方面亦有选择，如祈求幸福与富贵而设计的宫墙全用赤红色，为祝祈平安则用青色，黄色是皇帝专用的颜色，封建皇帝的宫殿全以黄色釉瓦为屋顶，内部装饰也多以黄色或黄金作的金箔粘贴于宫内各方面，因为黄色是中央之色，所以就成为皇帝所专用的颜色。皇太子的宫殿，叫东宫，用青色釉瓦盖宫顶，因为居处东方，是属于春的，春天是万物的初始，象征着朝气向上之意。

《易经·说卦》有“乾……为龙”一句，古人也将龙应用在古建筑上，以前是以龙的造型来装饰建筑，最近则发现在建筑设计上，建筑艺术上，以雄伟美丽而体现出“龙”的全部形态。1987 年在北京城内发现两条古的龙形建筑，是由地质矿产部遥感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的，北京城两条龙形建筑是由故宫建筑群和中南海等四海组成的，一是古建筑龙，一是古建筑水龙。按北京的明代皇宫建筑于公一四〇七年，用了十五年才建成，总建筑师是蒯祥，他在建筑学上有极高的造诣，皇帝也以蒯鲁班称赞他。他的设计图纸早已佚失，现在所以能发现古建筑龙是因为研究人员以遥感彩图的新手段结合历史文献，及运用古建筑方位学，在古建筑数理方面依据“河图洛书”及“八卦”等古典传统方法才取得了龙形建筑图。这一发现充实了古建筑与《周易》的关系。

在所摄制的彩色遥感图上清晰地显示，两条巨龙轮廓分明，气象非凡。“古建筑龙”，从南边的前门到北端的钟鼓楼，长达四.七五公里，在晴日阳光下光彩夺目。天安门

龙嘴，金水桥是颌虬，东西长安街为长髯，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社稷坛（今中山公园）如龙眼。天安门到午门的甬道，一如龙鼻骨。作为龙身的故宫，其四个角楼恰似伸向八方的龙爪，太和殿是居中宝座，煤山（今景山公园）为龙后身隆起部，一条脊椎骨，直通龙尾的钟鼓楼。登景山之巔南望，故宫的金色琉璃瓦恰似龙鳞闪烁，正阳门的瓮城，正如龙衔的明珠（按正阳门的瓮城已拆去）。

古建筑水龙，则位于古建筑龙西侧，观上去令人情趣盎然，半圆形的南海酷似龙头，圆圆的瀛台岛如晶莹的龙眼，中海与北海连成的龙身，前窄后宽，中海中的一座半岛和北海的琼岛，分布匀当，形似龙的双爪部分，而什刹海作为龙尾，摆向西北方向。水龙也有两条髯，一条是东金水河，另一条是西金水河，现在已经消失了。

围绕着“龙”在建筑艺术上的体现，首先是历代多很重视“画龙点睛”，北京古建筑龙的双睛，点在太庙和社稷坛上，其艺术气氛是浓重的。其次故宫四个角楼，设计十分特殊，以这种壮丽的多角建筑体现龙爪，这是以前皇宫未见过的，最北的钟楼作为龙的尾，与龙之“终”谐音，符合历史上的习俗。再次是，南海、中南海在元代是没有的，明代开挖时作了有意的设计，将挖出的土方堆成了景山。这就形成水陆并行的两龙，如此巨大的规模，在明以前是没有的，其建筑的严谨、庄重、雄伟，把古建筑美升华到一个新境界；而且南北对应、有疏有密的京城建筑的中轴线，在世界都城建筑中更是唯一无二的瑰宝。

以上所述《易经》与古建筑，是从四方面讲的，先从

《易·系辞》引出，然后述及阴阳、八卦、五行与古建筑之密切关系。这是研究中国建筑史所未触及到的，希望引起各方面的兴趣，共同钻研出更大的成果来。

以下再谈谈运用易学九宫原理，用以创造出我国传统色彩的园林。按九宫最早见于《周易乾凿度》：“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与商朝、周朝的《周易》的八卦相为表里，是明确可稽的。到了宋朝重新以《洛书》来称它。运用易学九宫原理，可以得出上山下水，也就是前面有水城，后面有山作借景的古园林建筑理论，古园林的建筑，要从全面着眼，进行多方案的比较，再分区布置各个小区，结合实际情况，达到静动相融的效果。也就是易学中阴阳交融的理论，游有动静，景也有动静，静中见动，动中见静，静动结合，也就是静动融合情景融合，这就把九宫阴阳交融理论表现在园林建设艺术上。要是运用九宫顺行与逆行排列得当，则分中有合，合中有分，以小中见大的园景。布置园林中的厅、堂、阁、台、廊子等丰富多采的建筑，再加上配合好色彩，那么就可使游客真有人在画中游的感觉。国内各地名园胜景其建筑理论之源，可以说是来自易学九宫。

我写到此处，或许使读者感到有些纸上谈兵之感，为了证实《易经》与古建筑的密切关系，今将宋刻碑文录在下面，以增强我的论点。

“清静之教流入中土，自隋开皇始，……相传宋绍兴间，兹喜鲁丁自撒那威来泉所造……文庙青龙之左……有上下层，以西向为尊，临街之门从南入，砌石三圈以象天三左右壁各六合，若九门追琢皆九九数，取苍穹天天之义，内园顶象天为望月，台下两门相峙而中方取地方象，入门转西级而上，曰下楼石壁门，从东入正西

之座曰奉天坛，中圖象太极，左右二门象两仪，西四门象四象，南八门象八卦，北一门以象乾元，天开柱子，故曰天门。柱十有二象十二月，上楼之正东曰视圣亭，亭之南为塔，四圆柱于石城设二十窗，象二十四气，

上录刻文是我在一九八六年十月去福建泉州参加中国国民经济管理研究会学术讨论会，参观清净寺时发现抄下来的，清净寺是我国最古老的一所伊斯兰教寺，它是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伊斯兰教礼拜堂而建，从碑文得知它吸取易理融在建筑之中，表现了中阿两族人民友谊的结晶。它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一〇〇九年）至今已近千年，寺内二块石碑，因年久风化，字迹剥落，我所录写的尚比较清楚。清净寺的宏伟古代建筑，也呈现着《易经》与古建筑的关系。

第八章 《易经》与气功和武术

气功导源于我国古代的吐纳、导引，即古人修炼之术，它与《易经》之先天图、后天图有深远密切的关系。可是易书的先天图与后天图，河图与洛书，从汉朝起就佚失了，以至不见于古籍目录，如《汉书·艺文志》。从《艺文志》所载：“易经十二篇……”因为易有上下经及十翼，所以说十二篇，未见先后天图。现在通行的《易经》是晋王弼所传下来的费氏古文易，唐朝时李鼎祚之《周易集解》也与王弼本同，全不见先后天图，到了宋朝，才由朱熹刊出先天图与后天图。宋朝周敦颐著《太极图说》是从华山隐士陈搏处得来的。朱熹曾说，易图原是方士们据以修炼的秘传典籍。易图自出现于宋朝时就引起人们的非议与认为是方士伪托的种种议论，相信是真的和认为是伪托的争论不休，一直得不到解决，现在有了出土文物，可给此事作了结论。1977年安徽阜阳市双古堆发掘了西汉汝阳侯墓，出土有“太乙九宫占盘”。据发掘简报说：太乙九宫占盘是按八卦五行属性（水、火、木、金、土）排列的，九宫的名称和各宫节气日数与《灵枢经·九宫八风篇》篇首的图完全一致。小园盘刻划则与河图洛书完全符合，与今存《周易本义》的河图洛书也相符。所以说我国气功功法多以易理来指导气功实践，更无致疑的余地了。

我国气功已有五千年的历史，见于文字记载的也在两千年以上。如《黄帝内经·素问》：“黄帝曰余闻上古有真人

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

《文物》《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阳侯墓发掘简报》1978年八期。

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蔽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①按《黄帝内经》是成于战国时期医学家之手，托名黄帝作的，黄帝是我国原始社会时期部落联盟长。文中所说的“上古”，虽所指不明确，但指的是远在黄帝以前的传说时期，可能指伏羲时代，八卦是伏羲画的，八卦与气功的微妙关系是引人深思的。

《内经》所说的真人“寿蔽天地”那是说人与天地同寿，为什么能如此长寿呢？因为“此其道生”修道达到最高程度而获得的。修道是需要有图理为指导的。易图的刊出者，宋朱熹就曾经说：“先天图传自希夷（陈搏字），希夷又自有所传，善方士技术，用以修炼者。”用今天的话来说修炼就是炼气功，陈搏在五代时居华山修道，服气辟谷，宋太宗赐号希夷先生，他是五代宋初的著名气功大师，所以图出自希夷，是同气功有着一定关系的。

易图与气功可以从“大、小周天”练功法说起。按周天是古代天文学的术语，是观测天象者目力所看到的天体大圆周。这个大圆周称为黄道。黄道划为三百六十度，在其两侧八度内即为黄道带，布列着各星宿，并在其上运行。孔颖达《礼记·月令篇疏》：“凡二十八宿及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为周天。”周天“由天文学术语转借为气功术语时，又分为大小周天。原来气功内丹家根据天人相应观点，移植周天术语，用以概括丹道功法。内丹术要求人的精气在身体内按经络线循环运行，因其阶段、工法、目的不同分为大小周天。先说小周天。小周天是在炼精化气的过程中进行的。

^① 《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进行小周天锻炼，开始于活子时，古代丹家认为天、人一体，强调一阳初生之时开始炼功，叫作子时功。活子时是指小周天功法中应该起火的时机，所以叫做活。丹家认为在活子时，下丹田气动药生，即活子时已来。精气神发动，源头清，元精满，此时用小周天火候引元气从下丹田开始，逆督脉而上，沿任脉而下，经历尾闾、脊骨、玉枕三关，上、中下三田和上下鹊桥，完成一个循环，即炼精化气一小周天。至于大周天是在小周天基础上，进行炼气化神阶段。古代丹家认为，通过大周天修炼，运用入定之力，使神和气密切结合，相抱相融，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

以下再将大小周天练功法从另一方面说明。以先后天的八卦图的卦理来指导练功实践，首先将身体各部代入易符中的有关符号里，如将腰比作太极，两肾比作两仪，四肢比作四象。又将乾为头，震为足，巽为肢，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五脏配五行：心属火为离，肝属木为震，脾属土居中，肺属金为兑，肾属水为坎等等。然后根据卦理对各种功法的过程原理进行分析。如小周天功法是一般练功者必走的打基础的阶段，本阶段之时练功者尚处于后天精气亏损的状态，必须经过后天返先天的训练阶段，故用后天八卦方位图进行指导，即将功法重点放在坎、离两卦上，按这里的坎离指的是肾和心，而不是肢体上的耳与目。主要练法是以坎填离，坎离交媾，水火即济，以坎水济心火。肾水上济于心，心火下交于肾。上下交而其志同。在大周天练法中，因练功者在小周天练功有所成，后天精气已经补足，先天元气开始恢复，进入先天元气运行训练阶段，故得用先天八卦方位图进行指导。其功法着重于乾坤两卦上，就是运气于全身循环而使阴阳两气交流。所以大周天又称为乾坤交媾。两

种功法皆与易图原理相合。

上面介绍大小周天练功法是不同的，可是殊途同归。气功有各派，各有家法师传，因此产生岐异，但所取得的功法效果是相同的。

将《易经》爻象之理，运用于气功上，成为典型的气功内丹开山巨著是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是书影响很大，被后世奉为“丹经之祖”，晋朝葛洪的《神仙传》中载有魏伯阳进山修炼，服丹成仙事。当然《神仙传》所记事属夸张迷信。但《周易参同契》确是比较可信可靠的养生修炼专著，所以深受各代学者重视，到了现代此书被译成英文、俄文、日文，在西方科学著作及百科全书中，均给了很高的评价。

《周易参同契》上篇，开章即点明与《易经》的关系。如前几句所说：“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坎离匡郭，运轂正轴，牝牡四卦，以为橐籥”在以下篇章中，以一月为周期，将六十四卦与之相匹配，以一年为周期，将十二消息卦与之相匹配，来说明阴阳消长和事物变化之规律，还以五行生克约制关系和河图洛书中数的关系来阐明修炼原理。但是《周易参同契》一书词义古奥，隐晦难明，非有些古籍基础和气功基本知识才能深入学下去，如“修之不辍休，庶气云雨行，淫淫若春泽，液液象解冰，从头滚至足，究竟复上升，往来洞无极，佛佛被容中。”这一段是叙述练大周天功的切身体会的。接下去再引上文前的一部份，如“望之类白，造之则朱，炼为表卫，状如蓬壶，环匝关闭，四通蹢躅，守御密固……动静休息，常与人俱。”这是叙述气功之外气状况，用几句现代的科学术语说明，就是人体生物场外观的一极形象。人体生物场是现代科学新的一门学科，略具

初型，而《周易参同契》则成书在两千年前，音情辞藻，距离我们是远的，但描叙的精微，给学习气功的人，留下深思玩味的地方。因为气功的气是看不见，摸不着，这一点是同本书所说道之形象真一难图；三五与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诀难以书传。因为气功这一术语要想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是非常难的，只得用抽象的、形象化的数目字或符号来表达，《易经》的河图洛书，正具有这些特点，用它来表达“气”使人理悟起来才比较顺利。举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明，人体内的气可分为阴阳两气，练气功时，用意念促进两气的平衡，使阴阳二气协调，保持身体的健康。从易之太极图中，是由黑白分明的两个部分组成，白色部分称为阳，象征是刚健，如太阳、天空、阳光、男人等，黑色部分称为阴，象征柔顺，如土地、月、女人等。这黑白两部分，即阴阳两仪，这阴阳两仪是互相矛盾的双方，又相互依赖，相生相克，旋转交流，从而使太极图把对立统一这一抽象规律用形象表现了出来。

在练气功时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和掌握火候的问题，所以需要有一定的原理作为指导，又需要有一定的数量控制，《易经》的图和易理正可以用来说明气功的方法和规律，这不是假借也不是援易以为说，《周易参同契》中已将内丹原理和养性原则的阐述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被目为“丹经之祖”。此书美中不足的是讲的理而不是法即气功的基础理论，而缺乏专业知识及操作方法。

《周易参同契》以易图与易阐释气功，其道理是可以肯定的，但距完全揭开其奥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并结合现代仪器来探测人体生物场，以证实气功种种非凡的能力。也许在今后一二十年内会取得这些成就。

《易经》与武术的关系最为明显，从拳术名称上，一眼即可看出，如：太极拳，八卦掌等。太极拳是以太极图为最高法则，如太极图的曲线是英文字母 S 形的，太极拳两手动作也是 S 形的；太极图中有阴阳两仪，太极拳也讲阴阳相济，刚柔结合，太极图有最初和高层次的含义，太极拳也有最容易学的，尤其是简化太极拳；但要往高层次去学，则难度是很大的，不只是武术的功夫，还要有高深的儒家经典基础知识，太极拳是我国武术中高级拳术之一。八卦掌也取法于八卦图，八卦掌一般有先天与后天两种，先天八卦掌较比合乎自然，后天八卦则具人为，但有一个共同处，就是其基本掌法、步法、身法，全以八卦卦理作为其武术理论的根据，另有比八卦掌可能更早些的武术，名为阴阳八盘掌，传说远在元明以前就存在，流传不广，在此不论。

太极拳的起源说法不同，为大多数人所公认的是河南省温县陈姓一族从很早以来就练太极拳，因此拳法变幻无穷，于是就用易之阴阳、太极的哲理来解释拳理，并用太极拳这个名称把武术与易理结合起来，几百年来陈氏太极拳在全国各地广泛流行起来。

陈氏一族原籍不是河南省，原籍是山西省洪同县，在明朝洪武七年（公元一三七四年）由族长陈卜率全族移居河南温县常阳村，就是四处闻名的陈家沟。移居后以陈卜为第一代。据第十六代陈鑫在其所著的《陈氏太极拳图说》的序中说：“始祖陈卜，耕读之余，而以阴阳开合运转周身者教子孙以消化饮食之法，理根太极，故名曰太极拳”，陈卜创太极拳的说法并不为考据者所同意。另有王宗岳传给陈家一说。据说清乾隆年间，山西人王宗岳自少时学经史又兼通黄老与兵书，他深解盈虚之理，熟习整齐步法，自成一家。他所写

的《春秋刀残谱》与陈家沟传下来的《陈沟春秋刀谱》相同。而且王宗岳的《太极拳谱》中的“打手歌”和陈沟传下来的“打手歌”一节也相同，足以证明王宗岳确与陈家沟有过来往。另有陈王庭创始太极拳之说，在此不加详述。这些有关太极拳创始人悬而未决的问题，留待考据家去研究吧。

从太极拳这一名称看，立即知道它与《易经》的关系，现在须要进一步说明。太极二字出于《易·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简单来说：两仪、四象、八卦，全由太极而生。太极是一切原动力，两仪、四象、八卦的动作，全由太极的运动而来。宇宙一太极，人的身体也是一个太极，人身体的腹就是太极，两腰为两仪，两手两足为四象，两手两足各有两节为八卦。宇宙之原动力为太极，人身之原动力，也在于太极——腹，所以太极拳之动作，并不是手足之动作，亦不是腰的动作，而是腹的动作，腹为全身最中处，此处一动，全身没有不动的。

他种运动，或手之运动，或足之运动，或身之运动，必配合身体各部之动，成为全部份之运动，如果支配不匀平，或者学习的不得法，时间长了，不免有畸型发达之弊病。太极拳之运动，不动则已，动则全身皆动，所以一动而不全身皆动者，不是太极。太极拳的动作，只在发动中心一点动作，即腹之动作，不必用激烈的力气，全身之动作便无所不到，外表极其柔和，内里延绵不断之力，息息增长，所以一动作即表现到剑拔弓张的情况，那不是太极，我们可以知道太极拳所以名取太极，即处处是太极的动作，换句话说，处处是腹中心动作。

学太极拳有三字诀，即松固凝。什么叫松固凝，即体松、气固、神凝。这是久观太极图，长期领悟而发挥用于太

极拳术上，要想达到知其所以然之故，那必须是学太极拳学到某种程度后由学者自行体会。

八卦掌在名目种类繁多的我国武术中，被公认为是属于最高级的技艺之列。据说八卦掌是清乾隆年间河北文安县人董海川创始的，他自幼好武，又天生有力，后来寻师访友到江南（即今江苏安徽等省），走在山间迷了路，当找不到归途时，遇一位道士，把他引至山中道观，道士传授他以易学的河图洛书原理，于是他将易理运用在武术中，从而创始了八卦掌。

八卦掌是总名，共分有八：无极混元掌，易宗掌，穿化掌，龙行掌，蛇行掌，转掌，缠掌，云雾掌。命名八卦掌是以《易经》之先、后天图及八卦之变化，以合掌中数理。而八卦掌根据的是阴阳生克之理，并且又据先后天八卦的不同而运用在武术中，由先天卦而生后天卦。先天八卦又生后天六十四卦，后天六十四卦复生三百八十四爻。以此生生克克，由之有延绵不断的道理，衍生了八卦掌的原理与练法。八卦掌中先以八掌为基本，八掌内又分四形四身之练法，以应文王八卦之数，以符合四正四隅的区别（按四正四隅即文王八卦的八方）。先天一卦，又生出后天八掌，所以八八可生六十四掌，符合后天六十四卦的定数。又据阴阳生克之变化，后天一掌能生克有六手，故六十四掌又能生克三百八十四手，以应三百八十四爻之定理。

以上是太极拳与八卦掌和易理关系的简单解释。可见《易经》对我国武术发展的重要性。

第九章 《易经》与文学艺术

《易经》与我国的文学理论传统，有着深厚的联系，我国传统上因尊《易经》为群经之首，所以历代文学理论家多重视它，而现在从文学上来探讨《易经》的反而见少。

这里先从诗歌与《易经》的关系谈起。这个问题古人早有探讨。如唐朝孔颖达《周易正义》中说：“凡《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若诗之比喻也。”宋朝陈骥在其所著《文则·丙一》中说：“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之作也，可无喻乎？”明代张蔚然著《西园诗尘》中有云：“易象幽微，法邻比兴。”清代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内篇·易教下》则认为：“易象通于比兴。”以上四人全认为易与诗相通之处是在象与比兴。清代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本姓张名采，一名人瑞）说：“诗之微言奥义，都入易。”（《唱经堂才子书汇稿·释小雅》），他是反过来说诗与易的关系，与前引四人之论，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论断。现以《易经》之卦爻辞文字部分来证实上引各家之论。《易经》虽肇始于卜筮之书，在文体上，卦辞与爻辞，多为散体，语言极为质朴，但所描述的事物，却是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生动性与形象性，它的作者——卜者解释卦爻的手法，是与诗歌创作的比兴一致的：

《离卦·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这是比的手法，以泪如大雨倾泻来描述悲伤嗟叹的情况，以象征一个人遭遇到不幸，但又得救，反而化祸为福，所以说吉。

《坤卦·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是描述群龙在郊野搏斗，血流很多，把黄土染成了青黄色，以此比喻人在战斗中，交战双方必然有流血牺牲。

《大过卦·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叙述一棵枯杨树长出了嫩芽新叶，一个老头子娶个少女为妻，“无不利”即是吉利之象，这明显是触物起兴，用陪衬的他物来引起所要吟咏之辞。

《大过·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用枯杨树开出了新花，一个老妇人找到个少壮男子为丈夫，也是用兴的表现手法。在卜筮时遇到此爻，告诉占卜人没有好名誉，也没有灾祸。上引的两条爻辞，不但用诗的手法，而且有鲜明的形象，有诗的语言，更有诗的音调节奏，给人以生动优美的艺术感受。使人感到了枯木逢春喜发新枝的盎然生机。

《易经》中还有的爻辞更富有浓重的艺术性，如：

《明夷·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这是说，雉鸡带伤飞行，疲劳得垂下羽翼。君子在途中受到侮辱，忍饥三日不进食。

《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爵，吾与尔靡之。”用现代话说，在树阴下老鹤欢歌，小鹤在应和。我的杯中盛满美酒，愿与你共饮相欢。

上引两卦的爻辞，从《诗经》找出两首相近的作个比较。如：

“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反人，哀此鰥寡。”（《诗经·小雅·鸿雁》）

“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诗经·小雅·南有嘉鱼》）

上引《诗经》两首诗与前述两段爻辞，非常相似，二者不单在手法、语言结构和音调上，而且在体制和意境方面，都是十分类似的。这点早在宋代陈骙就说过了：“《中孚·九

二》之辞，使入诗雅，孰别爻辞？（《文则》）。按《易经》的卦爻辞，早于《诗经》可成定论。如《中孚·九二》之类的爻辞其所以同《诗经》相似，乃由于卜官和诗歌作者，在体裁和表现方法上都采自民歌。

前引孔颖达的话：“以物质而明人事，若诗之比喻也。”下举爻辞用韵文而富有诗意的如下：

《渐·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渐·六二》：“鸿渐于磐，欲食衎衎。”

《渐·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

《渐·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

《渐·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

《渐·上九》：“鸿渐于坡（原作陆，非是），其羽可为仪。”

《渐卦》的六个爻辞，全是用比喻手法。第一爻是鸿雁息于江边，“于干”是在江边之意，这里比喻职位低的小职员，会受到风言风语的袭扰，但是没有灾咎。第二爻是鸿雁渐升进到磐石上歇息，这非常稳固，所以饮食也很和乐。

（衎是和乐意）第三爻“鸿渐于陆”鸿雁当高飞，现在着陆，不是好现象比喻人事就像丈夫出征不归，妇人怀孕而不能生育长。第四爻“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桷是椽）”是鸿雁飞入于木，或止息于木椽，是无咎的。第五爻，是鸿雁飞入山陵，这是先不好，而终得所愿，比喻在人事上，妇人三年不怀孕，但终能得所愿。第六爻“鸿渐于坡”是说鸿雁渐进而着陆，它的羽毛整齐而美丽，可作人们礼仪的装饰。以上《渐卦》六爻，是以鸿雁处在不同地方的情况，比喻人在不同情境下的吉或凶。全部六爻辞都是韵文，这在《易经》中是不多见的。但《易经》的卦爻辞中运用比兴的则不在少

数正如章学诚所说：“易通于比兴。”这说明“易”理与文学的密切关系。在先秦时卦辞爻辞全称为繇，因为这些兆辞，多是简短之韵语，近代学者认为是以繇借为谣，有似歌谣，故谓为谣。商周的掌管卜筮者回答问卜之辞，为了避免用枯燥乏味的抽象语言，而采取近于歌谣比兴等手法，可见易与文学关系的密切。

《易·系辞》：“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南北朝时梁朝的文学评论家刘勰，在其不朽杰作《文心雕龙》的《比兴篇》中说：“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和其《物色篇》：“以少总多，情貌无遗。”这文学理论是溯源于易的。刘勰将《系辞》的话运用到文论专著中，这是他重视文化遗产的一大功劳，不能以宗经来减低其价值。按《易·系辞》这两句话是说《易经》常举述细小的事物，来比喻及象征大的事物。韩伯康注释说：“托物以明义，因小以喻大。”因为以小见大，和以小喻大，正是文学创作的一条规律。现在接着引出《易·系辞》下文：“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唐孔颖达注释说：“其旨远者，近道此事，远明彼事，是其辞义深远，其旨文者，不直言所论之事，乃以义理明之，是辞文饰也。”《周易正义》把前后所引《系辞》合起来用现代文来说：《易经》文辞中所指物名，多似细小，但探取其中旨意，却很广大，它的意旨非常深远，它的文辞又非常文雅，它的言辞又委曲婉转，旁推侧引，无不中理，它所叙述的事物，是非常了当放肆而毫无隐藏，但其道理却又深藏其中。孔颖达的解释既符合原意又浅显得当。文学上的典型性与概括性，正是《系辞》所说的以小见大，以近明远，以此明彼。要概括地表达深远意旨，不用质木无文抽象的枯燥言辞，而用优美的韵文或精美的文辞，以鲜明的事例含蓄而曲

折的表达出来。

《易系辞》这两句“其称名也小 其取类也大”是同在《系辞》的下引文的发展：“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庖牺画八卦的首要目的是以类万物之情，把宇宙万物分别归为八类，制八卦以象之 这就是八卦的概括性。而“以类万物之情”即引伸到卦爻辞中的比兴象征手法，取喻中有暗喻，这就使卦爻辞所含的意义不限制在某人某事物上，而是适用于共同点的人与事物上，因此《易经》的卦爻中多具有大程度的概括性，如《乾卦》

《初九》：“潜龙 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 利见大人。”

《九四》：“或跃在渊 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 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 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 吉。”

六爻都是阳爻，按照各爻在卦形的位置顺序，除去《九三》以外，都是写龙的活动与客观环境变化，如潜在水中，在田野里，跃进深渊，飞上天空，隐现于云端等，这并不是写龙，而是比喻人处在哪种环境有利，哪种环境不利。龙以喻人，但又不限于某某人。水中，田野，深渊，天空云端，是比喻环境的，但也不限于上述自然环境。这就是“立象以尽意”（《系辞》）引伸到文学理论上 即“以物象而明人事，若诗之比喻也。”易爻辞中的比喻，这里可再举《旅·上九》爻辞：“鸟焚其巢 旅人先笑后号咷 丧羊于易。凶。”这是殷朝历史的一件事，寓教训于史实，这段史实是经近代学者

考证出来的。殷朝祖先王亥，曾去易国贩运牛马，因品德败坏，放纵淫乐，结果被易国的统治者杀了，并抢去牛马。卜筮者取这件史料，用于解释爻辞，劝戒人外出必须先注意品德的修养，否则，必然会遇到王亥的结局——杀身亡财之祸。

爻辞中所取的比兴手法的暗喻，如《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祠祭实受其福。”爻辞的东邻实指是商纣王，虽以杀牛的厚祭来祭祀鬼神，反不如西邻，即周朝以一般饭菜祭鬼神所获得的福为多。其中原因，是商纣王不行善政残暴的压迫人民，道德败坏。西邻正相反，阴积福德，大得人心，虽然祭品简薄，却获得鬼神的福祐。这个比喻是通过祭神求福一事，告诫人们，必须积德，也就是提高道德水平，推行善政，光用丰厚祭品来求鬼神降福是求不到的。这就是易的概括性——“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易经》与文学理论中的典型论是一脉相通的。易理的观点后来是有继承和发展的。以这种观点评论文学的是汉代的刘安在《淮南鸿烈集》中评论屈原《离骚》这部作品，后来司马迁把刘安的话引到《史记·屈原传》中：“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迥而见义远。”很显然，这是《易·系辞·下》以小见大的观点，由史迁继承而转用在文学评论中了。

以下从几点来论易之文学思想。首先谈的是象。象是《易传》中十分重要的文学思想观念。象的产生，在《易·系辞上》有两段文字说明：“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用现代话来说，即圣人见天下万事万物的繁杂，因而拟测万事万物的形态，而归纳为八个基本卦，以象征万事万物所适宜的物象，所以叫做象。这

是浅及表的译释，古意还有待于我们去领悟。另一段是前几章引过的：“古者庖牺民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上引两段《易经·系辞》，说明象是来源于客观世界，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天地鸟兽、人物，它不是天帝神灵所创造，或某人头脑中灵感的产物。这就体现了远始社会的人们简单朴素的唯物思想，这样的思想，是我国古代文论中“感物说”和“感事说”的先驱。

象来源于客观事物，又反映客观万物，但又不是完全机械的表面摹拟，因为不管是如何高尚伟大的“圣人”，也不可能把纷纭复杂、千姿百态的客观事物毫无遗漏地描绘出来，因此必须有选择的提炼、概括，在选择、概括、提炼等方面，从上引《系辞》中，已给我们作了提示，如“观法于地”的“法”即是法则。“以通神明之德”的“德”即性质特点。“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的“宜”，即义也，理也，或者说是规律。现代文论常把艺术形象的典型化同本质化联系起来，要求艺术形象须反映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上面说的“法”“宜”“德”的含义，正与文论所谈的相似而近。古之哲学思想和现代文论是有相承之迹的。《易传》中象的观念形成、阐发和提倡，推动了从具体事物出发的思维方式，所以易象便与文学形象具有了某些共同之处。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中说：“易象通于诗之比兴。”为说明这点。他又认为易象包容了“六艺”，“六艺”中一些比喻及象征的描写都属于象。章氏又说：“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营构之象……心之营构，则情之变易为之也；情之变易，感于人世之结构而乘于阴阳伏为之也。是则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他所

说“人心营构之象”，即指通过想象，创造与构成形象，这种形象甚至奇幻到难以思议的程度，然而它毕竟出于天地自然之象，并且具吉凶与是非。又说：“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他用比兴解释易象，又特别强调了创造的形象与自然之象的关系。这就为易传的象，及其对文学的关系作了很好的说明。

宋朝陈搏《文则·丙一》也说道：“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之作也，可无喻乎？”着重指明形象的比喻作用。对易象之传情达意的功能作了肯定。

《易经》中变的观念，也影响到文学发展。《易·系辞》：“生生之谓易”《正义》注释为：“生生不绝之辞 阴阳交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系辞》又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是非常精彩的朴素的辩证观点，它强调了变。又说：“爻者，言乎变者也”，“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在这里，“爻象以情言”须要加注解，爻辞和彖辞是阴阳变化的道理和事物消长的情态。每一爻都反映着客观事物的变化，而卦爻辞则带有主观感情的种种变化，在此前提之下，自然界的变化与爻辞就有了密切关系。《易·系辞》变的观点为文学形象的复杂性提供了解释的基础。《系辞》于变，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时代的发展变化，文学也随之发展变化，从易变观念中取得了哲学依据。唐诗、宋词、元曲随着时代演变，文体也为之一变。这是最简单的例子。

易传中的文之一字，经历代人们的阐发，丰富了易之文的含义。《系辞》说：“物相杂故日文。”易传所说的文 是指文饰，因为色彩交错才能成文，单一的颜色是不能构成文

的。当然易传所谓的文，包括范围广泛，其中有天文、人文之别。《贲卦彖辞》：“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按贲是饰的意思。这几句是说：观察天上的文饰，刚柔交错，从日月星辰运行的情形就能察知四时的变化，观察人类文明的进展，就能化成天下。这里主要是说，日月星辰，山川动植都体现了自然界的文，人文则指一切礼乐制度。如《革卦·九五》：“象曰 大人虎变 其文炳也。”大人如虎变是说大人光照四表的文明是很光耀的。本卦·九五“象曰 君子豹变 其文蔚也。”是说君子如豹之变化文彩灿然。易传是认为人世问一切文饰、文彩都是受到自然界的启示才出现的。因此“物相杂 故曰文”是概括一切的文，是客观的规律。《朱子语录》于此有进一步的说明，他说：“两物相对待故有文，若相离去便不成文矣。为文者，盍思文之所由生乎？”朱熹认为事物有矛盾、对立，交互发生各种关系，这才成为文，他的这种对文非常广泛的解释，对于文学也是适用的，所以凡从事文学写作的人，对此应该深思。

辞字含义很多，主要是解说，《易·系辞》，也有阐述，说：“爻象动乎内 功业见乎变 圣人之情见乎辞。”当然这里的辞，指的是爻辞与卦辞，卦爻辞传达了圣人的思想感情。这种思想感情表达的是“神明之德 万物之情”，文辞的受到重视，反映在春秋时代即是重视行人辞命，如“郑子产献捷于晋……晋人问陈之罪……”回答晋人质问周到漂亮，使得晋国听任郑国伐陈（《春秋左传·襄二十五年》）在述完此事后 左氏又引仲尼的话说：“志有之 言以足志 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 非文辞不为功 慎辞也！”（同上引书）文辞与言辞在国际活动和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性提到了“出言陈辞，身之得

失国之安危也”(《说苑·善说》引子贡曰)的高度。一个人的得或失，国家的安与危，都系在言辞上，它的作用多么重要。言辞的传播，影响也是重大的，如“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易·系辞上》)所以要考虑到传播所产生的好坏两方面的影响，是不能不慎重的。又讲到辞有好的作用，如“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易·系辞》)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易·乾卦·文言》)这是说二人同心，其锋利足以断坚硬的金属。同心的意思，是说二人精诚团结，心意齐同，其气味的相投，犹如兰蕙的芳香。凡是声音相类同的动物，自然会彼此鸣声相应，气机相类同的生物，自然会彼此交感。同心的二人，必然同言，同声同气所发的言辞，会发生更重要的作用。言辞也可有坏的作用。如《易·系辞》：“乱之为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动乱的发生，都是从言语煽动起来的，所以说用言语作为阶梯，正如俗话所说，祸从口出。这是在国家社会中，言辞所起的坏作用。一个人内心的活动，必然在言辞中得到反映。《易·系辞》：“将叛者其辞慙，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这几句话大意：将要阴谋叛变的人，说话时神色定有惭愧的颜色；心中有疑虑的人，因心神不定，故说话毫无系统，分歧而不清楚，像树枝一样的杂乱；有修养的人言辞真善而正直，所以很少说话；浮躁的人，较为轻浮，所以喜欢多说话；诬害善良的人，心中不安，故言不由衷，他的说辞，就浮移不定；亏待职守的人，他的言辞多屈折而不伸。从一个人言辞中可以观察到其内心活动，所以了解言辞，是人际关系中一件重要的技能。孟子就自称知言，他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何谓

知言？曰：谀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所说的大意是，我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辞，同时也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什么是知言？夸张的言辞我知道它的漏洞，不合正道的言辞，则知道它同正道分歧的地方，躲闪的言辞，则知道它辞穷理屈。孟子是善于言辞的，但在讲言辞表现品格这一点上，不如《系辞》明确，而在说明“文如其人”上孟子也差一筹。

言与意的关系是文学史与哲学史上一个问题。《易传》在这方面也提出了论点。《系辞》：“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周易正义》孔颖达注说两个子曰，是夫子自问自释之语，又说：“虽书不尽言，系辞可以尽其言也。”他承认“言不尽意”。但又认为卦爻辞是例外。这是因为从古以来，共认是“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怎可能“言不及意”呢！《易传》认为爻象可以尽意，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易在文字之辞外，辅以符号以期达到尽意。

《易经说卦》：“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这是说神体现于万物之中，体现万物变化的规律。神这一概念是与文学有密切的关系。神是隐晦微妙的，但却是客观事物的规律。论述到神的，《易传》有几处。如《系辞》引子曰：“知几其神乎！”又说：“知以藏往，神以知来。”几是先兆，是事物的萌芽，是变化的端倪。又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极深是能发掘其曲折含蓄之意，研几，是说能预见事物发展的规律。要达到上述两点的要求，是要仔细分析，认真思考，所以古人喜欢细加玩味的是那仿效事物变化的爻辞。下面谈到神，神是隐晦微妙，要使文章显微阐幽，虽简

单数语而所指则极大而又含义深远。这是文章的妙谛。关于这点,《系辞》提出了“旨远辞文”之说:“夫易彰往而察来,微显而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而曲中,其事肆而隐。”《周易正义》对最后两句的解释是:“其言曲而中者,变化无恒不可为体例,其言随物曲伸,随物赋形,文辞斐丽,含义深远”,这所说的如能表现出来,确是文章的妙谛。从《易系辞》上引的几句话,可使人想到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评论屈原的话:“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迥而见义远。”将屈原的作品与两段话来参证,当会进一步理解,易之“旨远辞文”的含义,因为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想像,奇幻的色彩,曲折的变化,见微知几达到出神入化之境了。明朝茅坤曾评论道:“孔子系易曰:其旨远,其辞文,斯固所以教天下后世为文者之至也。”(《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他强调旨远辞文这段话,对后世文学的巨大影响。同时这段话也是《易传》所谓神的很好说明。神在文章中的含义,是中国文论史上一个重要概念。历来对其解释纷歧不一,有多种多样,但全是根据《易传》之源,而加以发挥。

文学各种体裁的内容与形式,两者关系以那个为主,在《易传》中认为内容是主要的。如果文思养育充盈,写出文章表现于外必充实而自然。《坤卦·文言》中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矣。”坤卦六五爻爻辞的意义是以黄色为中央的正色。要将六五爻得中得正的义理通达了。如果修养到坤阴柔顺的德性,充满身心全体,自然就美在其中,由此舒畅到四肢发展到事业上,便自然而然的近于至美。《坤·文言》强调的正是内

在的美，内美而外发，文才见于实际。《易传》对文理与道德有个准则：“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现在择其中几句加以译解，“坤以简能”是说坤为地浑然化成万物，是以简易作为其功能的。“易知则有亲”容易使人了解则有人亲附。“易从则有功”容易遵从，则行之有功。如果从真理的朴素性来看，《易传》的话是有道理的。内在的美，也可以说心灵美，要求简单朴素，这既可作为道德也可作文学写作上的标准。

上面所谈涉及到“易”理与文学几个方面。^①易理也体现在我国古典文学创作上，我国古典诗词，少不过十几字，多也不过百余字，却能达到言简意赅，内容丰富，字有限而意无穷。意与情是繁富的，太繁了会窒息观赏者的想像与回味，所以要删繁就简，以达到笔墨未到而意到，这一文学创作方法正是脱胎于《易经》的。因为“易”以最简单的阴阳爻，即长竖线和由中断开的竖线所代表的爻组成八卦，用八卦总而统之，包举一切，解释一切。“易”以象征方法来阐释宇宙和人生。其原则注入文学可以用小巧律诗、绝句、词，作为中国文学的代表，我们看到五言四句等所包涵的情、景、意，却极为丰富。由此可见，《易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

《易经》对我国艺术的影响是深厚的，美术、舞乐、音乐等无不笼罩在“易”理之内。因为我国艺术的本质，不在于

本章所论“易”与文学，从下列两文，参考之处，不一注明。

《易传文学思想及其影响》《南京大学学报》1982.2。

《立象尽意以小见大》《暨南学报》1982.2

反映,也不再于再现,而在于“写意”。这个“意”正源于“易”之奥理。在《易·系辞》中说:八卦是由伏牺仰观、俯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而创造出来的,所谓“卦者,挂也,挂象物以示于人也。”(《广雅·释言》)这是说,不是挂上的写实具体象以示人。而是从所挂的物象,来认知宇宙变易法则的玄象,它是从抽象而概括成的,并以抽象的线,即阴阳爻一虚一实的线组成八卦和六十四卦去象征宇宙万物和其理,这就是《易·系辞》所说:“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所表示的涵义。“易”的意义有三。据《周易乾凿度》上所载孔子之言:“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第一句话中的第二个易字是简意,即用最简单的线来表示,统宇宙万物的,统摄一切生生变化的,一切皆变,唯有“道”是“不易”的。

在《易·系辞·上》中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在这里先以我国书法艺术来说吧,书法在简的方面是达到最高的程度了。一枝笔,一盂墨,一张纸,只有这三件简单用具,在白纸上写黑字,从秦统一六国以来几千年来是没有变化的。历代这么多的人写了不知多少汉字,而人人写的又全不同,千变万化,唯在少数常用的几百个字中。不只书法尚简,连画也是如此。中国画在审美理论上,以形式简赅与内涵的丰富为特点,这两点是最受重视的,太繁复的画,则会窒息限制观赏者的想像力,因此要删繁就简,来表达用笔简而意繁,作到笔墨未到而意到,历代书画名家高手多能达到在没有笔墨的空白纸上,也能富有情韵。这是从“易”理体悟而来的。天地间万物实在太繁多了,而《易经》所用的符号形式却极简单,这种精神影响到艺术上,就成了以少胜多,以简赅繁,以无胜有的境界。可以说《易经》之理是具普遍的指导意义的原理。我国古代书法家、画家,全是懂得“易”

理的。在我国浩如湮海的书论、画论以及乐论，诗话，词话中，大都有以易之阴阳论艺的议论。

不只易简之理用于艺术理论上，而且绘画写生之法也渊源于“易”。因为以描写物象、发挥感情为目的是图画。伏羲画八卦，仰观俯察，用抽象的阴阳爻来表现宇宙万物，这就已具备了后世绘画写生之方法了。

“易”之变易方面 汉司马迁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 均长于变。”（《史记·太史公自序》）阴阳对立的原则运用在一切艺术上 其来源于“易”是显而易见的 历代确立了这个普遍原则 是“易”之精神所形成的传统。《易·系辞·下》：“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下之撰。”[疏]：“阴阳相合，乃生万物，或刚或柔，各有其体，阳多为刚，阴多为柔。”把“易”之此理注入艺术领域内，就是对立中的统一和对立中的变化。从这个以阴阳变化的根本原则演化出对立统一的概念。古人对此有阐明，刘熙说：“阳，扬也，气在外发扬也。反之，阴，抑也，藏也，气内藏而抑也。”（《释名·释天》）《易经》中说：“乾为天为阳，坤为地为阴。”日为阳，所以称为太阳，月为阴，故曰太阴。男为阳，女为阴，阳主动则刚，外扬、热烈、雄好强；阴主静，则柔内含、委婉，以上种种，便在我国艺术美的观念方面起了作用，在书画上表现有阴阳刚柔和谐的统一，具有刚柔兼济的玄理。古人称阴阳为二气，所以刘熙载说：“书要兼备二气。”书法是这样，其他艺术也无不如此。按不单书画如此，文章也是同样的，姚鼐在《复鲁滌非书》中说：“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友也。……得于阴阳之美者，则其文霆如电，如长风之出，如崇山峻厓，如决大川，如奔骐驎，其光也如日，如火。……得于阴柔之美者，即文如升

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珠玉之辉，如鸣鹄之鸣而入寥廓。”以上是将文之理比以阴阳之理来论述的。还有比清朝人此论更早的，成书远在战国时代的《礼记·乐记》十九：“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物化兴者，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易之哲理——阴阳两个概念，用于对立而统一，就会和谐的产生音乐美的节奏。

古代画家也同样的悟到阴阳之理于绘画上，唐·张彦远在其《历代名画记》中说：“夫阴阳陶蒸，万象错布，玄化亡言，精工独运。”张氏又说：“能悟此理者，便是得意。”这个“意”字是指艺术上的主观精神及天机妙道。因此才称之为“玄化”。关于此“玄化”一词，清人龚贤有文解释道：书画当“与造化同根，阴阳同候”，要“心穷万物之源，同尽山川之势”。^①这几句话把易之阴阳领会到高层次。可以说：作为艺术家，应将客观之“物”与“我”和至高无上范围天地的法则——“道”，结成一个整体，便是最美的境界和艺术上的最高造诣。

中国艺术的形式美，或者如有的人称之为抽象美。今人吴冠中就认为中国书法是形式美的大本营。^②可是在其文章题目上又标明是抽象美，因为中国画最富于形式美，它是极考究笔墨的虚实，布局的疏密，是我国书画在艺术上卓绝之处。我国古代所讨论的书画，极少有干预生活的情事，从画上看常对社会是冷漠的表现，对人是疏远的，可是却对

① 《乙角编》周二学著、乙册第36页

《美术杂志》《美于抽象美》 80.10。

色、墨、意、笔之类讨论的不厌其烦。中国画在形式美的构成因素中，是以阴和阳，刚和柔，虚和实为主，以这种对立而又统一的形式来表现其抽象美，乃是《易经》的核心思想，在中国画上的哲学色彩的体现。

“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系辞·上》)在相传是王右军所撰之《记白云先生书诀》中说：“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大则风生神。”又如汉代文学家蔡邕在论及书法时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①这就是说我国书画家不用科学眼光看世界，而是以“道”之心来观照万物，原因是“道”乃用心视事，对“道”的观点不能局限于感官的肉眼，它是无处不在的，要悟大“道”的玄机于书画艺术上，以求达上乘之境。在我国书画艺术中，其中笔墨未到的空白，充满情韵，墨色的黑与空白，相映成趣，相得益彰，从空白处可触发出无限的感悟。这都是《易经》的阴阳哲理，由书画家的造诣，发挥在书画上的妙用。

古代凡涉及到色、情、音三点上，全由阴阳衍化而出。阴阳又是与五行相连在一起的。如宋朝周敦颐在其所著的《太极图说》中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生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太极也……二（两仪）五（五行）之精，妙合而凝……”按“二五之精”，就是将一切主客观都联合在一起，下面用图来将阴阳五行理论的轮廓表示出来。

见宋·陈思《书苑精华》载蔡邕之《九势》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色	青	赤	黄	白	黑
音	角	征	宫	商	羽
声	呼	笑	歌	哭	呻
情	怒	喜	思	忧	恐

当然上列，其科学性是不好说清楚的，这不必深究，暂且勿论。古人的认识传下来已经几千年了，积而成习。但色、音、声、情等，无不由阴阳衍化而出，这种本源论，久为古人所坚信，但它又是艰深而奥微的重要学问，是古人重视的一项哲学学理。

庄子说：“易以道阴阳。”《天下篇》这句话同《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是相近的，都说明阴阳是“易”的核心。几千年来，在“易道广大”影响下，阴阳与艺术的关系日趋密切。清朝书画家丁皋说：“凡天下之事物物，总不外乎阴阳。以光而论，明曰阳，暗曰阴；以宇舍论，外曰阳，内曰阴；以物而论，高曰阳，低曰阴；以培塿论，凸曰阳，凹曰阴，岂人之面独无然乎？惟其有阴有阳，故笔有虚有实，惟其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故笔有实中之虚，虚中之实，虚者从有到无，渲染是也；实者着迹见痕，实染是也。虚乃阳之表，实即阴之里也，故高低凸凹，全任虚实，”^①丁氏把“易”之阴阳哲理，发挥运用于书画之议论中，不深究“易”理

^①丁皋《写真秘诀》在《墨林今话》中作《传真心诀》。此书为《芥子园画传》四集转录，流行遂广。

是难有这样卓论的。《易经》与我国书画艺术结合在一起，千百年来形成了密切关系，西方画的艺术哲学是比拟不了的。所以清人唐岱说：“欲识天地鬼神之情况，则‘易’不可不读。”（见唐之《绘事发微》）^①前面所讲的是“易”与文学、艺术，而“易”是至大无所不包的。宋代程颢曾说：“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二程集·周易程传序》）“易”之八卦是古人用以认识宇宙的符号，是从体验天的动作，来通达了神明的德性，因此宇宙或天地不仅是一个认识的对象，也同样受到古人的崇拜。“取法乎天”这四个字是古人认识宇宙或天地的客观世界的思维方法，而这个所取法的正是按照阴阳八卦来理解的那个天。而这个天是从认识的对象，到崇拜的对象，也成了欣赏的对象，给人以强烈的美感。

作为绘画的一种理论，是古人所说的“师法造化”，但其含义却不限于丹青笔墨，可作为一种美学观点，在舞蹈上也与师法自然密不可分。如《易》以子曰所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易·系辞·上》）

原始社会的艺术，其表达方式，全是具有明显直接模仿的性质，只求其具像的模写，以求其形似，如我国少数民族的舞蹈：傣族的孔雀舞，壮族的斗牛舞，蒙族的雁舞，以及汉族的狮子舞，舞蹈主要表现方面是：农耕、战斗、狩猎等，舞的最初形态，只是对动物或自然界作简单的模仿和生产动作的过程。至于为什么以这种方式来表现？主要是在人

有关书画方面，参考《八卦对书法的影响》《中国书法》1987.2

《周易对中国画的影响》《中国书法》1987.4

们中交流思想感情和传播劳动生产的知识等外，还有一点，那就是再度体现一种快乐的冲动。

原始艺术向上发展，其促进力，是由于人们认识的水平，知识的结构，随着生产力发展向高层次上升时，那种简单而直观的模拟的舞蹈，就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而要追求神似。同时人对自然的理解达到了抽象的阶段。中国传统文化的八卦是抽象阶段的对大自然认识上的艺术创作，八卦还是具有美感的几何形图画，也成为各种艺术创作中师法自然的规范。因此“易”之八卦这个妙用无穷的我国古代思维哲学成果，广泛应用于许多领域，如舞蹈与音乐等方面，它既是古人对自然现象和人事社会认识的概括，也是获得新知识的手段。古人把高度抽象的观念，表现在符号式图案之中。前面引用的《易·系辞》之“立象尽意”，“设卦尽情伪”和“鼓之舞之”不仅将“象”与“意”说得透彻，也将人类舞蹈的特征结合起来了。

以八卦符号所模拟的自然现象，同舞蹈所要表现的现象是相同的。这方面也如老子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易”之八卦在空间排列上，其位置是：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艮西北，兑东南，巽西南。这种排列，古人也称之曰：四正四隅，八卦的各卦之间为四十五度，合起来成为三百六十度的圆周。这从易理方面讲是循环不息，周而复始。即古人所说的环道，或叫做环周。

我国古今以来的舞蹈动作，向来力求其圆润，从小至手指的动作，大至到迈步，以及全身动作，都是由曲而圆的环行动作，古来就有所谓：以手划圆以象太极，以腰划圆以象两仪，以脚划圆以象八卦。这都是法自然，法天地。所以古

今舞蹈动作在舞台上多作圆圈，因之舞蹈的圆转动作，如跑圆场，空中转，旋子，大翻，小翻，风火轮，以及平转，跪转等，都是圈和圈，大圈套小圈，小圈套大圈。这些环道走向的技巧动作，都是取法于宇宙循环的自然规律，而且将情寓于舞蹈队形图案之中，如我国传统舞蹈中鲤鱼跳龙门，八仙庆寿，二龙戏珠，均表现有浓厚的情感色彩。当然舞蹈艺术形象的创作并不直接表现为是阴阳观念与八卦符号的衍化，这是“神而明之”的结果。舞蹈与其他艺术在审美上的特征，如开合、对比、虚实、动静、轻重缓急、刚柔相济等，都是阴阳观念与八卦符号所表现的变化和多种观念同艺术美学有关系的体现。

八卦图是具有阴阳观念的美学涵义的，汉司马迁曾说：“……动静有常，大小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升，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升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史记·乐书》）这是古代人把音乐作为教育人民的手段。同宇宙、同天地间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其核心思想是阴阳观念。八卦本身就是一幅富美感的图画，但它是一个抽象的、模糊的和不确定性的自然界的模式。因为凡是抽象的符号，越是模糊不确定的符号图案，其外延越广阔，内涵越丰富，其含意也就越深邃。正是《周易·系辞·上》所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所以“易”不只与舞蹈有密切关系，音乐也同样与“易”有密切关系，古人很早就说过了，“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至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萌芽始震，凝寒以形，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

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吕氏春秋·仲华纪·大乐》）。《吕氏春秋》是吕不韦集众人之力写成的，从上引书可知春秋战国时人们所谈的“易”与音乐渊源。今人也有文章讨论到“易”与音乐和乐器的。^①进一步论证“易”与音乐的密切关系。

《乐器》杂志1984年及1985年两文：《周易和音乐若干问题》、《周易古代乐器考》

第十章《易经》与数及数学

易与数的关系是密切的，易中一涉及到数就令人感到哲学意味浓厚，并隐晦不明。《易经》从创现到成书，距今五千多年，时间的久远，就罩上一层神秘云雾，虽然《易经》从古以来，学术界公认具象、数、理、占四个方面，但一涉及到数就与河图、洛书的数目字和大衍之数纠缠在一起，因之对数与易之初始关系，反被忽略过去。举一个易学名著上的话为证：“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虚五而可衍，虚一而可用，一与五皆道之本也，一者大也，五者极也，故谓之太极。”（《易例上》惠栋撰）看了上引的话，使易与数的本来面貌难以看清楚了。

近代研究文字学的学者，大都相信八卦是伏牺所造的文字，也就是记物的符号。认为卦是记物之符号，最早的见于《周易乾凿度》书中举乾的☰为古文天字等。宋朝·杨诚斋也说：“卦者其名，画者非卦，乃伏牺初制之字”（杨万里《易传》），在《易·系辞》上说：“以类万物之情”。这句话是表示八卦具有文字作用，但那是后来的发展，八卦的初始还是数目符号，这方面早就见于《汉书·律历志上》。在一段就说：“自伏牺画八卦，由数起。”接着又说“度量衡制度也全与八卦有直接关系。这是汉代班固之话，应当为后代人所重视，可是自易列经书首位后，历代研究易的人，大多陷入卦爻图画的奥秘上，又因《易经》一书，其特色是幽深玄远，使人畏读，所以连颜师古的《汉书·律历志》注文也说：“万物之数，因八卦而起。”但也引不起人们的注意来。

今人胡怀琛认为八卦为上古数目字，他说没有文字以前，记数之需要与记物相等，因物容易记，数不容易记。虽然胡氏之文，只说其于由，佐证又不足，幸叶国庆为文补了论证。叶说：“八卦为上古数目字，每卦名指一数，”举了几个补证。第一，处在原始社会阶段的落后民族，其计数罕能过三，四、五以上之数则叠三而成。如《说文》：“三，成数也”，成数之意，就是数的顶点；第二，其后民族在数名上，多取于实物，如古印度，以月、地表示一，眼、翼及臂表示二。八卦各短节之横画，似象手指，以指记数为古代各民族的普遍现象，罗马数目字 I、II、III、IV 是从四指来的，至于 V，则是四个指并拢在一起，大拇指伸开而成的画。第三，落后民族与古代，给儿童命名，采用数目为名，如我国命男孩为八八儿，见《聊斋志异·偷桃》。八卦中亦有儿童数目名之遗迹。如《说卦》：“震为长男，坎为中男，艮为少男。”

下面再从结绳方面来讨论易与数的关系。《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今人陈道生在其一篇论文中说：考证分析得出结论。可知结绳记事，实在是先记数，再由数来记事。因为绳上的结，只能表示数，不能表示形——事物的原形。陈氏又说：八卦是八个用来给事物编号的数字。此可作为“伏羲画八卦，由数起”的补充。不只易之初始与数关系密切，而且《易经》是世界公认第一个讨论排列的书。阴阳两爻，合起称两仪，每次取两个爻来排列，就有四种排列，

①《八卦所含之数字性》叶国庆《厦门大学学报》第六期。1936.2.引文的罗马数字是本书著者加进去的。

《重论八卦的起源》陈道生。载《孔孟学报》十二期。1966.9.台湾。

如太阴☷，少阳☳少阴☶，太阳☰。每次取三个爻排列，就有八种不同的排列法，再多没有了，少则有余，只到八。文字上也是这样说明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系辞上》）这就是数学上的等比数列，即：2、4、8。

再进一步来说易与数的关系。前引《系辞·上》之“易有太极……”，太极一词，据唐朝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注说：“太极即是太一”也就是一。我们先不用管有争论的仪、象、卦的解释。从数学上来看，太一、两仪、四象、八卦，正是一（ 2^0 ）、二（ 2^1 ）、四（ 2^2 ）、八（ 2^3 ），这正是二进位系统。美国的国际电报电话公司 IBM 的记录带 Tape 就采取一二四八符号（1、2、4、8Code）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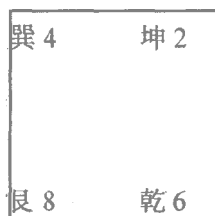
二进制溯源出于八卦。可是由于《说卦传》中有言解释：“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风雷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这个“八卦相错”即是把八卦二进制数序打乱了，也打乱了爻卦之为二进制本来面目。这层迷雾，直到两千多年以后，由极为渊博的哲学家、数学家，微积分的创始人莱布尼兹 Leibniz（1646—1716）把这层迷雾揭开，因为莱氏很早就研究中国哲学，他读过孔子传，看到中国人以理为神和自己的哲学很相似，从此他同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有来往，其中主要的是法国传教士白晋 Bouvet。二人交往甚密，到1701年十一月四日，白晋给莱氏一封信，随信送来易六十四卦圆图和六十四卦方图，第二年莱氏给白晋信中述及他所发明的二元算术和伏牺易图的关系。接着莱氏发表了《论中国伏牺二进制级数》，他又说：易图是流传于宇宙间科学最古纪念物，伏牺是古代君王，世界性的哲学家，也是东洋科学的创造者。莱氏揭示了六十四卦为二进制数学这一事实，

并承认二进制乃中国的伏羲所发明。

按八卦、六十四卦是我国原始社会人们的筹算法，经过了千百年的数学知识积累，约到商朝前后期，发明二进制数学，它是经由文字来表示的，又是画在图上，传到欧洲，由莱布尼兹揭开这层幕纱。二进制在现在电子计算机找到了应用，在世界大放异彩，这是《易经》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光荣。这一远古文化的珍宝，由西方人把它的科学价值推到了崇高的地位，我们炎黄子孙有必要研究，进一步发扬光大。

前面谈过，阴阳两爻，合称两仪，《易经》从复杂的自然现象和人事社会诸般现象中归纳产生了阴与阳两个基本范畴，由阴阳二项千变万化，再经其错综配合产生八卦，及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这是易之观物取象的观念，是对事物的变化发展过程长期经验积累，抽象概括的结果。把宇宙间千变万化复杂的事物用抽象化的阴阳概括为一对基本原则，并认为任何事物都不能不受阴阳之规律的制约。由阴阳这一抽象化名词衍变开去，从坤二到巽四、艮八、乾六，可得‘二底数的 N 次方’见下图与表：

$$\begin{array}{ll}
 2 \times 8192 \cdot 16384 \cdot 2^{14} & 2 \times 4096 \cdot 8192 = 2^{13} \\
 2 \times 512 = 1024 = 2^{10} & 2 \times 256 = 512 = 2^9 \\
 2 \times 32 \cdot 64 \cdot 2^6 & 2 \times 16 \cdot 32 = 2^5 \\
 2 \times 2 = 4 = 2^2 & 2 \text{ 两地数自 } 2 \text{ 起}
 \end{array}$$



$$2 \times 4 \cdot 8 \cdot 2^3$$

$$2 \times 8 \cdot 16 \cdot 2^4$$

$$2 \times 64 \cdot 128 = 2^7$$

$$2 \times 128 \cdot 256 \cdot 2^8$$

$$2 \times 1024 = 2048 = 2^{11}$$

$$2 \times 2048 = 4096 = 2^{12}$$

$$2 \times 16384 \cdot 32768 \cdot 2^{15}$$

$$2 \times 32768 \cdot 65536 \cdot 2^{16}$$

所谓三百八十四爻就是从上表变化而来的：

$$2^8 + 2^7 \cdot 256 + 128 \cdot 384$$

$$\text{或 } 2^9 - 2^7 \cdot 512 - 128 \cdot 384$$

六十四卦之三百八十四爻的实际数字是可以变化无穷的，它对后世哲学与科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前面讲的是易与数的关系，下面再讲一下易与我国数学著作的关系。《周髀算经》是我国最古算学书，这部书主要讲的是原始天文计算，但在书中开始阶段讨论的是直角三角形性质，为的是按高度和距离的比例进行地上和天上的测量。现在将《周髀算经》中与易有关的部分录在下面：

“昔者周公问于商高曰：‘窃闻乎大夫善数也，请问古者包牺立周天历数。夫天不可阶而升，地不可得尺寸而度，请问数安从出？’”

《易·系辞》说：伏牺仰则观象于天，他画八卦是与天文学有关系的，我们先不去从传说人物真实性来谈，从文字学来说，卦字从圭从卜，圭是测天的土圭，是用泥土筑成的上园下方的土堆，用来测日影。八卦，即从四正四隅八个方位来测天体变化。卜是占卜，是预测自然界和人事的变化。并且《易·系辞》又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因此古代中国早将《易经》理论应用于天文和律历学中。不用细说《易经》之作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易·系辞传》），汉代的《易纬·乾凿度》中也说：“天地灿明，日月星辰布设，八卦错序，律历

调列，五纬（郑注谓五星）顺执，四时和栗孳结”（郑注，孳育也结成也）。《旧唐书·五行志》说的更明确：“易有其卦，天有其星，今古相循。”唐代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曾经“推衍周易大衍之数，立衍以应之，改撰《开元大衍历经》”（按不定分析就是见于《易经》的大衍术，不定分析一直引起古今中外数学家的注意。一行此事见《旧唐书·方伎传》）可见易之大衍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我国古代天文学和数学，远不如西方近世之精密，但含有很多的成份，其中的主要原因则是与易同数学所形成的法则有关。

汉朝徐岳著《数术记遗》，其在此书中谈及计算方法时涉及五行，八卦有关的占卜方法。书中又说：“九宫算五行，参数犹如循还。”此书注释者甄鸾注说：“九宫者，即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尽管关于洛书真伪从宋朝以后争论不休，但在1977年阜阳双古堆的西汉汝阳侯墓出土文物中有太乙九宫占盘，洛书实物再次呈现于世上，将疑古阴云一扫而光了。

至于易与现代数学关系的研究，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沈仲涛就在《学灯》载文论《易卦与代数之定律》。因为它与本书主旨有别，所以不来多引用了。

前引《汉书·律历志》：“万物之数，由八卦而起。”易之八卦，给汉唐中国数学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也启迪了西方学家的研究兴趣。

第十一章 位居传统文化首位 的易经和现代化

传统文化是历史产物，是炎黄民族长期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在总体上反映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精神状态与文明程度。《易经》是汉民族长期生活实践中积累和沿传下来的古代典籍；《易经》的成书，传说是经三圣之手，即伏羲、周文王、孔子才定型的，在秦朝建立后，幸而没有遭到焚书之难，从汉朝以来，两千多年，研究《易经》的书有三千多种，它反映汉民族生活和思维方式与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当然在众多的易学著作中，各时期的历史精华和糟粕混在一起，正如一条河流从上游而下不免泥沙俱下，这是《易经》在历代即受重视又遭轻视的主要原因。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易经》列在禁区之内，虽然粉碎四人帮之后，《易经》从禁区中解放出来，但我们对传统文化所作的反省检讨，没有进入真理正轨。从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对《易经》的重视不断高涨，以美国来说，《易经》新译本有十几种之多，年销几十万册，读者遍及社会中各阶层。

日本梅原教授通过他广泛而长期地研究欧洲哲学后，曾说：西方文明像瘟疫一样威胁着现代世界。按西方文化发展到今天，已呈现空前的光辉灿烂，但在此光辉灿烂中，却潜伏着无比严重的危机，因为西方大多数人，自我赏识他们的科学成就，和前所未有的超过前代的享受而骄傲自满，以为只要如此发展下去，以科学的万能，去谋取人类需求的满足，自然会登上人间天堂，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摆在世界人民面前的，是人类文化和生存，都受到严重的威胁，先举显而易见的，如原子能的发展，核导弹的增多，人类却因此陷

入地球毁灭的恐惧，人们开发出科学的巨大能力，但远远未能掌握它，更谈不到驾驭它了。因此梅原教授说：唯一的医治方法是到东方文化宝库中去找。《易经》位居东方文化宝库中的首位，《易经》是六经之首，三玄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优良传统的思想基础，是源于古代哲理之中的。先秦哲学成为以后的传统文化健康发展，提供前进的促进力的，首先是《易经》中的十翼，或称之为大传。西方对《易经》有正确的认识，除前面谈到美国的《易经》热以外，西德、瑞士、奥地利，有一些学术团体，其成员大都是科学家、医生、学者，他们对易之八卦与阴阳大感兴趣，而且其中有的人，已写出书来绎释《易经》的哲理，希望用现代科学来论证《易经》之阴阳八卦的可信性。

不只是日本梅原教授见到西方文化的致命弱点，华裔科学家、哲学家陈慰中教授在八三年出版了所著的《中庸辩证法》，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著文评论说：“我发现本书绝对是第一流的，它令人振奋，见解新颖，而且我敢断言，它无疑是一部能改变人们思维方式的大作。”是书作者富有创造性地讨论了，西方自古希腊赫拉克利特到圣奥古斯丁，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进程，提出了西方辩证法，其最高目的是达到真理，而常把一切对立的事物看作是对立的矛盾；与此对照，作者认为中国思想界，从《易经》《老子》到王夫之、戴震的辩证法与大自然有密切的联系，是有人性及人道性的，可称中庸辩证法。在此书中作者提出这样的命题——今日人类的危机，要重新从哲学开始，哲学的解放要从辩证法开始。辩证法的解放，先把辩证法从逻辑的错误中解放出来，但不要否定逻辑的优势，而要加强进传统的中庸。自然界阴阳对立，及事务的相辅相成。在

对唯心论、唯物论、辩证法，伦理学，人性论等众多理论问题思考之后，陈慰中试图建立的正是这样一种中庸辩证法，即通过积极调和，互相补充，阴阳互易的方式来融合人类思想精华。

陈慰中所揭示出的西方辩证法是逻辑辩证法……而常把一切对立的事物看作对立的矛盾。《易经》与《老子》的辩证法是与大自然有密切的联系。按‘易’之命名，含有变易、简易、不易的意义。宇宙间森罗万象，视时间与空间因素，阴阳、刚柔、静动，变易而不易，复杂而简单，矛盾而统一，对立而和谐；《易经》中的阴阳论，即在阐明这一事实真像。所以易之哲理不是把对立的事物，看作对立的矛盾，以阴阳互易，积极调和，而互相补充。如《易经·说卦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方而两之。”用现代话来说是 从前圣人创作《易经》的意图，是为了探究宇宙万物的本性，发掘宇宙自然法则一贯的真理，所以将天的法则，定义为阴阳，将天地法则，定义为柔与刚，将人的法则定义为仁与义。阴阳是气体，凝集成柔与刚的形体，仁是柔和的德性，义是刚直的德性，因而八卦兼备天地人三者的道理。

以上是《易经》在《说卦传》中阐明的天人关系，也就是宇宙自然法则一贯真理。《老子》一书中的完整体系的总根据也是天人关系。老子把宇宙生成之本源，用一个抽象的“道”作回答 这是一个假定的“道”概念，用来代表宇宙本源。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不知其名，不是真不知，而是姑且用“道”来代表这个欲知的概念。因为“道”不易明确，难以形容，所

以说：“道可道，非常道。”它是感官所不能捉摸认识的状态，也不是用任何语言来能描述的状态，正是所谓：“无状之物，无物之象”（十四章）宇宙的本源是道，宇宙万物，不仅为道所生，并且在既生成之后，还受道的控制，也就是宇宙万物运行的法则。老子说：“万物恃之而生，……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三十四章）因为“道”是衣养万物的，因此得到“……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五十一章）得到崇高的地位成为宇宙万物运行演化的至高准则，天人关系就如老子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二十五章）从上面所引《老子》的本文和简要的阐释，可以得知老子的行而上学，实是一种“道的一元论”。“道”一方面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又是宇宙万物演化的法则。这些法则主要的是“人法地”，遵循万物运行演化的准则，也就是合理调节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老子的“道”和《易经》之“生生之谓易”（《系辞上》）不是由科学实验中得到的，而是伟大哲人的睿智的直接判断，但是它符合科学思想。人类生存在地球上，以地球为根本，但地球不过是太阳系中的一个行星，太阳系不过是银河宇宙中的一个系，银河宇宙不过是大宇宙的一小部份而已，追溯下去是无穷无尽的。易理所说：“广大悉备”（《系辞下》）“生生之谓易”。《老子》的“道”正是“强名之曰大”（二十五章）也相当于大宇宙的无穷无尽。

地球、太阳，或者在亿万年后会消灭掉，但是在宇宙中，必然有另外的新星球，不断生长发展，大宇宙本身，无始无终，永恒的生生不息，这正是《易经》所说的“生生之谓易”。由形体上看，人在地球上、大宇宙中，不是沧海之一粟，而是一粟上的一粒微尘中的小分子，生命在人类生存

历史上更是微不足道的短暂，也可说不及一刹那，然而，如此微不足道渺小的人的心志活动，却阐释了无穷尽的大宇宙，符合现代科学对天体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不能不承认是传统文化上辉煌的一页，从而说明儒家之易和道家之道在传统文化中居主要地位。

提到传统文化，人们总是常与儒家文化划等号，或者并列，这是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儒家文化经历了二千余年的风雨飘摇，步履艰难地向前发展着，无论是多次外来文化的挑战，还是本民族其他思想的浸润，都没有改变其固有内涵；相反，在发展过程中，它不断吸收来自各方面的养料，充实其本身，渡过一次次的危机，并使中华民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走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前面。而在其中起着主要作用，发挥深远影响的还是《易经》大传的刚健学说，《易传》在论天人之道时提出“刚健”观念，认为天是运行不息的，故称之为健，人也应当效法天的“健”而自强不息。又如大有、大畜全都依据卦象而赞美刚健。《易传》及卦中所宣扬的“自强不息”精神，激励着我国历代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前进探索，把民族与文化延展而保存下来。

儒家文化并不是儒家学派所独创创造的，而是我国文明经历了夏、商、周几千年之后，到了春秋时期，由伟大的思想家孔子继承概括所形成的，儒家的完整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有说明：“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司马迁用几十个字准确扼要地指出了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一脉相传的渊源关系。在这方面儒家学派创造者孔子也曾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表达了他对传统文化由衷的景慕与热烈的追求，是他创建儒家学

派的主要原动力。

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内在联系是密切无间的，它反映了我国民族的普遍心理。因为儒家学派创始以前，古代社会的各级贵族和一般自由民就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六行、六艺的社会教育。所谓六德，即：智、仁、圣、义、忠、和；六行为：孝、友、睦、姻、任、恤；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周礼·地官·大司徒》）从这些施教的内容可以明显的看出，古代社会教育完全是立足于华夏族在黄河流域的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习惯、惯例、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等上面的，儒家不仅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而且还结合春秋战国时代环境要求，使之进一步深化，上升到理论高度。

因为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正是社会上内部矛盾不可调和所引起深重危机撼摇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的时代，当时对传统文化怀疑与批判与日俱增，这就要求孔子不能光祖述尧舜，而要把时代精神注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中来，到了战国大变革时代前夕，人们在崩溃旧世界上展望未来的模式，在社会未来模式上传统文化应处在如何位置上，儒家学派主张是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通过和平手段的社会制度过渡，坚持在保存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推行“仁政”统一天下。孔孟之徒的儒家学派，在这场百家争鸣的大辩论中是个失败者，战国统治者不接受儒家学派的意见。

战国时秦国以法家主张为其社会模式的理论基础，认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史记·商君列传》）秦在政治实践中，奖励耕战，毁弃诗书，彻底与传统文化绝裂，所推行的是“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取得吞并六国，统一中国的大业。但秦

王朝的存在在历史上只短短的一瞬间，只持续了短暂的十四年，始皇的子孙万世帝王之业的美梦彻底破灭了。处分“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的人，“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邈三王”的蔑弃传统文化的法家治国论，无助于延续巩固秦统一的局面，终于在辉煌胜利之后，迅速败亡。这段历史发展情况是震惊人心的，它的原因，引起了政治家、思想家认真思考。首先是陆贾解答了这个问题，后来的贾谊在《过秦论》中又发挥精卓的见解。陆贾在同刘邦长治久安的对策时，首先驳斥了刘邦所说的，“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他指出“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在刑法不变，卒灭赵民。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史记·邹生陆贾列传》）陆贾驳斥了刘邦的狂妄谬论，以儒家学派的立场，说明法家的强权暴力是可以统一六国，只“争于气力”而“不竞于道德”的文化虚无主义的法家思想，是不能维持巩固政权的，必须按照逆取顺守的儒家理论，才可以保住国家的长期统治。刘邦是接受了陆贾的建议。可是儒家思想在汉初，并不占主导地位这是因全国太残破了。秦短暂十四年空前的工役和远征，弄得民穷财尽，秦亡接着是楚汉之争的八年苦战，好比病残之身更加剜戕，及至天下平定，全国名都大邑，都已残破不堪，户口减了十之八九。面对残破的家园，崩溃的经济，社会上的普遍心理只是休养生息，共同争取起码生活条件。摆在全国上下面前只是省事息民，所以无暇总结历史经验，适合当前的传统文化只有黄老之学——道家文化。

在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指导下的汉初政治经济发挥出深

远影响，当时朝野上下全是锋镝余生，劳极思息，道家的清静无为正是对症的良药。以道家文化的汉初政局，经历了高祖、吕后、文帝、景帝。不只皇帝是黄老之徒，高祖的功臣曹参也是黄老思想有力提倡者，文帝的皇后窦氏，她自己爱好《老子》这本书，也叫太子等皇族子弟读这部书，文帝也是黄老之学切实实行者，他一生行事，守着道家的“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

文景之治——汉初社会经济大繁荣是贯彻黄老之学所促成的，出现了“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人民给家足，都鄙廩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钅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上》）这种社会经济大繁荣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因为黄老的无为而治，在政治上出现了分权主义和经济上的自由化。前者的恶果是地方割据势力抬头，成为统一的对立物，导致汉景帝时七国叛乱。后者经济自由化，将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破坏，使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如孝文帝时，除盗铸钱令，使民任意铸钱，发生了拜金主义狂潮。“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汉书·食货志下》）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农立国的，经不起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摇撼，诱使农民弃农经商，小农经济趋于萎缩，导致自耕农大批破产。再者商人阶级崛起，改变了社会阶级结构，形成了对封建官僚政治的威胁。社会上的失控，成了政治上的大问题。

刘邦接受了儒家思想，但从汉初至景帝时，却实行的是道家思想，至是出现了大问题。所以汉武帝继位于景帝之后，作了重大的抉择，进行了指导思想的重大变革，实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把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学派放

在主导地位。毅然废弃了施行半个多世纪的黄老文学。

儒家的抬头，首先是董仲舒在廷试中上了著名的“天人三策”，文中总结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卷五十六）董仲舒所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是把黄老之学都包括在内了。儒家文化从此居于传统文化宝座，是有其优势原因的，首先是儒家文化的两个组成部份：儒家吸取了古代社会中贵族及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艺、六德、六行，儒家创始人孔子首先把技艺教育和人格教育结合在一起。将传统文化的六德、六行、六艺，提高为系统的道德学说和缜密的人生理想原则。孔子以前教育是统治者特权之一，师儒是贵族的寄生者。孔子在历史上第一个打破“学在官府”由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使传统文化普及到整个社会，这是一场大革命，学术平民化的开端，从此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

儒家文化第二个组成部份是《易经》，易是三圣所作。古代传说伏牺画八卦，至周文王演易为六十四卦，这是在易称为经的部份，孔子作十翼，又称大传，在易叫作传。至于易传是不是孔子作的，这个问题在经学上争论不休，至今也没有解决。伏牺其入否定的人不少，疑古学派就是主要之一。西方易学考古学者认伏牺为圣者这两个问题在此先不讨论。

《易经》初创于占筮，经夏、商、周三个朝代之际，一

批巫史和卜官，根据以前不断积累的占筮资料，加上当代人们掌握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逐步整理修订而成，加上吉凶悔吝的断语，用作占筮术的工具，来占断吉凶。到春秋时孔子开创了易学的革命，以十翼义理赞易，变占断吉凶的筮术易，为人事义理的儒家易，将易道作为人生立身行事的法则。因为《易传》（十翼）是孔子作的，或者说依托孔子作，以孔子的名义立论，于是在学术界有崇高的地位。的确，在‘传’中提出了不省精粹深湛的观点，启迪了秦汉以后的进步思想。汉以后‘易’列为群经的首位。经就是道，就是理。从占断发展到儒门易，启示了天理亦即人道变化的方法。阐明天理、人道的书，称作经。天理与人道合一的哲学思想，称作天人之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石，也是传统文化的特色。

汉武帝定独尊儒术而从传统文化找到了智慧开拓了稳定内部向外发展的统一帝国大业。由传统文化所形成系统思想把天人、古今，及各种自然、社会、物质、精神，组建于统一的系统思想中，其目的是为了巩固保持西汉巨大帝国社会机体动态平衡。

这个思想系统是把天地人各方面都通过易之阴阳五行而安排的，这是渊源于易理的，其深远的影响至于近现代。

《易经》所引发的中国传统文化^①，是受易学的启迪，在这里只先提三点。如‘生生之谓易’（《系辞上》）及‘日新之谓盛德’，（同上）天造化万物，日新又新，一刻也不休止，这就是盛大的德行，天地生生不息的功能，也就是易之

① 见拙文——《中国传统文化渊源于周易》载《北京财贸学院学报》1986年第四期。

变化无穷。《易·系辞》提出“日新”与“生生”这样的命题。日新就是新而又新，生生就是生而又生。《系辞》是强调生的，进而提出“天地之大德曰生”。唐朝孔颖达疏：“言天地之盛德，常生万物，而不有生，是其大德也”。德指本性，生即发生与产生之义。《易·系辞》中重视“日新”、“生生”因之在政治与社会上是强调变革，肯定改革的必要。《系辞》中又说：“变而通之以尽利”，“功业见乎变”。《革卦》说：“顺乎天而应乎人”。所以易学的研究，可用于现代化的经济改革。第二点《易·乾卦》“彖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即是天，像天道一样，永恒的运行不息，所以君子应当效法天道，自己坚强起来，就像天体运行不息一样。天体是永远运行不息的，人与万物都生长在这个运行不息的天地之间，所以立志的君子，要完成事业、事功等，应当效法天道，永无休止的求进步。《易传》在论及天人之道时，提出“健”观念，把天之运行不息，称之为健，所以人应效法天的健而自强不息，勉力前进。现在我国的改革，也临到勉力前进之时了。因为十年改革，为国民经济注入了强大活力，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重要的是改革结束了封闭停滞的局面，开辟了新的历史时期，但遇到的困难与问题也不少，主要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大。要遏制通货膨胀，控制物价，必须勉力前进，从易理中汲取借鉴。第三点，清朝惠栋说：“易道深，一言以蔽之，曰时中。孔子作彖传言时者二十四卦，言中者三十五卦。象传言时者六卦，言中者三十八卦。子思作《中庸》述孔子之言曰，君子而时中。孟子又曰：孔子圣之时者也。”（《易学·易尚时中说》）由此可见易理对时间因素和不偏不倚原则的重视造成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过就是离

开中，没有站在适中的位置。过热也没有在时间的轨道上，也就是过速。所以说，易之时中，仍有参考的价值。

第十二章^①《易经》中的经济 管理思想

（一）《易经》之主流始自经济

《易经》是一部古卜筮书 我们深入探索后 证实其原始主题是与经济有关的。因为，“易以道阴阳”^②和“生生之谓易”^③中之“天”、“地”与“生”是生产与自然关系最古的阐明。后来，这三个字被蒙上一层形而上学的色彩，就使《易经》的原始面貌含糊不明，古人认为《易经》是一部古代哲学典籍，这是后来的演化，并不是原始初意。

“生生之谓易”，这是《易经》一书中画龙点睛的一句话，也是此书的精髓。今天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来重新给这五个字以新的阐明。“易以道阴阳”这五个字，是庄子给《易经》所作的高度精辟的概括。《天下篇》是中国古代学术史杰作，它的重要学术价值是不容低估的。庄子这句话，洞彻《易经》的根源，远较汉代儒家所说的“刀尺静精微，易教也”^④扼要确切，还深刻揭示出其原始

① 本章之《易经》主流始于经济。曾发表于《经济学集刊》③其他则是作者所发表的易理与经济管理论文。

《庄子天下篇》。

③ 《易经系辞·上》

④ 《礼记·经解》《正义》：“易之于人，正则获吉，邪则获凶，不为淫滥是聚静精微、精深微妙也。”

经济之涵义。阴阳即地与天，在“自然是出发点”，^①因此，“生”“阴”“阳”^②就强调地指出了生产与自然的关系。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③是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
系。自从地球上有了人类，人类生存首要的物质条件便是吃，吃的食物与天地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吃是人的本能，所谓“食色性也”^④在寻求食物的长期生产实践中，首先熟习了大自然的“天”与“地”而采集经济与渔猎经济则与天地密切相关这是“生”与“阴阳”关系的一面。《易经》是由古代流传下来的卜筮书，古代社会卜筮所问的主要事项是采集、渔猎，虽然采集这个术语不见于甲骨文，但甲骨文的卜年、卜风雨。《易经》中之利悠往等所卜筮的，多是有关采集经济与渔猎经济方面的事情，这是不容置疑的，罗振玉在《殷墟书契考释》增订本上说：“贞卜类凡九，卜祭者五三八，卜告者三十二，卜享者六，卜出入者一七七，卜田猎九十六，卜年者三十四，卜风雨一二。”《易经》中的卜筮，亦不外：出入、婚媾、田猎……岁收、风雨。《易经》在秦汉时属于卜筮书，所以逃脱了秦始皇焚书的灾难，^⑤给后世留下不少珍贵史料，其中经济史料尤足珍视。

《易经》中首列阴阳，阴在阳之前，见于殷代易学——《归藏》，由坤卦开始，即列阴于首位。也就是对地更加重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6页。

天是阳、乾；地是阴、坤，详见《易经·上经》。

《易·序卦传》下。

《孟子告子》。

⑤ “非秦纪皆烧之……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神树之书”。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易经》得以完整保存下来。

视，可惜现代治中国经济史者，几乎全从“田制”谈起，并没有深入探讨“田”字的本意。《释名·释地》：“耕曰田”。可是未耕之地，也就是原始农业未兴以前呢？梁启超说：“田之十，乃象结网形，其口，则为画部落猎场之界也，后耕稼事兴，而田畴之形，又正与相类，乃即借此而为之耳。”^①按“地”之肇始涵义为大地、地面、次为土，“地之中别而为土”^②再则为田，这是截然两个经济发展阶段，后者是农业经济已耕之地，叫田。前者是原始农业经济以前之采集经济与渔猎经济的“地”。所以搞中国经济史者应先从“地”开始。

《易经》是仅有一部古文献给“地”和“天”以至高的评价。本文在后面要详加分析。

我们要试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剖析《易经》中的阴阳，次论‘生生之谓易’。按阴阳二字为两层神秘化的雾气所笼盖，一层是原始宗教范畴之卜筮，一层是形而上学之八卦，所以阴阳二字的经济涵义便隐而不明。

阴阳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人们企图了解宇宙的结构与形成，以揭示它的奥秘，用阴阳二字借彼喻此而引伸开来，上自宇宙、国家、以及哲学、医学无所不包，天地本为古代人所重视，这样就引伸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个方面上来了，但人类智慧的觉醒是缓慢的，因此人类在上述各方面的成就范围是狭小的；从狭义来说，它是原始宗教的巫术的一种，卜筮所用奇数——阳、偶数——阴的象征性符号，以阴（地）阳（天）的名称来引伸，用一个简单的解释，天用画一道来解释，地用画二道来表示，在这方面，

《国学蠡酌·国语文原解》载《饮冰室丛书》。

《五礼通考》卷四十一。

我们可以举《易·系辞·上》的“天一地二”这句话为证。它看来似乎简单，但一经繁衍演化，就复杂异常了。所以，自古以来，《易经》一直被认为是艰涩难读而不易懂的书。

卜筮的根源起于原始社会，在采集经济与渔猎经济阶段，是人们期望在生产上取得胜利成果而产生的，证以《易经》中的卜出入、问“利悠往”不？甲骨文中卜田猎等，全是采集与渔猎方面的问卜。因为，采集与渔猎一样，同受大自然主宰，会出现丰、歉的不同，因此人们想在事前问一问，也就是《易经》上载的“利悠往”即有收获；“不利悠往”，即无收获或收获极少。在采集与渔猎阶段的经济活动中，有时会有收获或猎获甚多；有时会全无所获，或所获甚少，连集体成员也难得一饱；甚至会突遭猛兽袭击，出现公社成员伤亡现象。因此，采集、渔猎的多寡，有时也会出现了无所获的灾难。年长日久，原始人逐渐认识到人世间的各种事情，全有成败、存亡、吉凶、祸福，这个截然不同的两个方面。《易经》中提到的“有悠往和不利有悠往”，这是回答卜筮者所问留下来的记录。人总是趋吉避凶，以求免于失败而获得成功，但大自然的威力相当强大，天地的变化，使原始社会的人们既惊疑又忧惧，如《易经·姤卦·九五爻辞》：“有陨自天”，说有的陨石自天下坠，声大如雷，落地后当时热度高，人不敢靠近。地震、大风、巨雷，同样令人惊惧。而最使人恐惧的，莫过于日食、月食。古人认为这是日与月的灾难，也就是天变，所以使人惊慌失措：“鼙奏鼓，嗇夫驰，庶人走。”^① 这是我国古代留下最早的天变时人们惊惧情况的记录。惊惧与忧虑俱来的，如《易经·震卦》：“惊远

而惧迩也……君子以恐惧修省”。又如“作易者其有忧患乎！”^①是说远在天上的惊变而使处在地上的人恐惧……君子应当效法这一精神，以戒慎恐惧的态度，提高道德水平，自我反省。这种惊疑忧思使原始社会人们从崇敬而畏惧大自然，因之产生原始宗教。人们对大自然的神秘力无法了解，认为有统驭自然及控制人类生活的威灵，在《易经》上说就是太极。见《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是阴阳。阴阳二气的变化隐藏着至妙至奥的道理，使人们即可敬又可怕。在《易经》未成书前，原始社会人们只得求助于原始宗教的卜筮。卜筮是巫术的一个分支，用它以期发现人类智力所不能思考出的神秘——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卜筮在世界上各氏族社会均极盛行。中国古代也把它看作是支配行动的头等大事，如《史记·龟策列传》讲：“闻古五帝三皇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可见不先去卜筮，是什么事也不敢去做的。

卜筮在周代大都用一些筮棒或筮草一类的东西，筮棒经过摇或抽等办法而取到的奇数——，或偶数——，或投掷钱的正面或反面，根据象征性的道理，命以阴阳之称谓，也就是《易经》中表示阳爻是——，表示阴爻是——。这是简单的卜筮。即使到了科学发达的今天，原始社会中卜筮的残余影响，仍有存在。例如，在球类比赛中以抽签法或拈阄法来决定哪一个球队开球时，是用投掷金属货币来进行，看货币落地的正面或反面而定。这个办法，也是渊源久远的。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氏说：“古人先揲蓍而后以钱记之，其后术者渐趋简易，但掷钱得数，不再揲蓍，故唐人诗有：‘众中’

①：《十驾斋养新录》卷一。

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①

卜筮和数字与最古文字画（按由单式象形字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字，极可能是同传说的伏羲画八卦演化而来）极为密切，先由奇数，偶数，而后错纵发展成了八卦，又进而成了六十四卦。

原始社会没有文字的时候，人们是结绳记事，以筹记数，在传说中有巢氏时代，人们穴居野处或巢居树上，席天幕地，夜间所常见到的有闪烁发光的群星，昼则太阳出于东方，月亮现在日落之时，大地上充满了山川与植物等等，而最令人感到伟大的便是天，于是，人们用筹作的符号——、来表示天，用——来表示地。因为人们看到天是一个整体，所以用——表示；植物从地中生出来，所以用——来表示。《易经·系辞上》九：“天一地二”是以筹作为符号的文字说明，至于形而上学的说法，则含有奇偶数字概念的意思。

原始人对数字的概念，一般都是极其简单的，在澳大利亚人的各部落间，仅有三个数目，三个以上的数目，统称之为“多”。中国原始社会的人们，也可能只数到五，所以阴阳之数“天五地五”。^②为什么只数到五呢？可能原始社会人们识数只到五，五以上的数尚未知道。汉朝许慎的《说文》书中的篆字数目只有一到五。可见《易经》的“天五地五”，源于原始社会人们数字概念的局限性。

以筹记数的符号化，出现于原始社会中期，我们看八卦的发展情况就可以知道，持筹是它的前身，叠三奇三，它从

《十驾斋养新录》卷一。

《易·系辞·上》五。

数字引伸为表意符号为天，所以《易经》称之为“乾三连”，乾就是天。叠三偶为☷，也从数字引伸为地，即《易经》所说：“坤六断”，坤就是地。（详后文）六十四卦都是由——一组成，系由阴阳两个符号错综结合而成。这两个符号，或可称之为自然界的要素，可说是万事万物的生命之源。所以《易经·上经》乾：“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坤：‘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在《易经·序卦传》上有进一步说明：“有天地然后有万物”。从《易经·上经·乾》及《坤》和《序卦传》等几处所述，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即阴阳与生存和生生不息之间，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三国志·魏志》所载博士淳于浚的话说：“包牺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神农演之为六十四卦。”这几句是说在原始社会用人工取火的燧人氏时代，人们在打制石器时，将出于生产上的体验与生活上的需求所了解到的天之知识，钻些点或圈于石上。后来又不知经历了多少岁月之后，在进入原始农业阶段时，人们由点、圈联成线，然后叠三线（画）成乾☰，又经繁衍成“经卦皆八，别皆六十有四”。①这虽是传说古事，但合乎人类社会发展的演进情况，叠三奇（数）是原始社会人们表意的一种绘画式符号，随着社会经济发 展，八卦也不断充实，由简入繁。所以淳于浚的这几句话，是反映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先是燧人氏发明人工取火，后是进入渔猎和原始畜牧业阶段的传说人物伏羲时代，再后就是“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的神农时代。

原始人不仅有了数字概念，而且还执筹以卜筮了。《易

经·系辞·上》说：“是以君子将有为也，……问焉而以言”，注云：“言人以蓍问易，求其卦爻之辞，而以之发言处事。”正是说明原始人们用木筹、筮棒、草筹（筮草）来卜筮询问：出入、田猎、风雨、卜祭、卜年等事，祈求得知未来的情况。这是原始社会人们认识幼稚，以及屈服于大自然威力的一种表现。

原始社会占卜的起源，是人类对大自然知识非常贫乏，斗争无力，于是在人们薄弱意志中，找到一种幻想的反映，这就是巫术的一支——占卜。恩格斯说：“但是，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发展中，在不同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①占卜是屈于原始宗教的范围，《易经》所反映的伟大力量是天地。至于天是乾、是男，地是坤、是女，则可说是历史中复杂的人格化。

卜筮是对采集、渔猎经济活动结果如何的询问。后来，原始社会人们就想如何使采集与渔猎获得可靠的保障。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现实世界也形成新的看法，特别是采集经济与渔猎经济向原始农业与原始畜牧业过渡的时候，占卜也从首位而退居次位，一种新的事物出现了，这就是对阴阳有了新认识，它是自然崇拜第一页，即对地母天父的崇拜，祈祷天地，求得她的恩宠，使原始人的经济活动有所保障。以上就是古代观察自然变化和从事生产实践，处理日常生活的一个概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54页。

(I)





原始人在卜筮上所问的，大都是生产上变“易”的未知数，所以应先从“易”上去深入地推求。易以阴阳二者变动作为它的根本原则。“易”字，似从“蜺蜥”、“壁虎”、“晰蜴”之形向创造的象形字。因为，“蜺蜴”这种动物，一天能变十二次肤色，所以“易”就表示在不同时间而能变动颜色及形状。可见“易”者就是不断变化改换之意。《周易乾凿度》：“易者，易也，变易。”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中》说：“孔仲达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先儒之释易义，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易经》指出：“‘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① 还有背离《易经》本意的解释，如《说文》一书中所引的纬书：“秘书说曰：日月为易，象阴阳也”，认为日代表阳，月代表阴，日代表阳，从文字学上是没有问题的，月代表阴则此说是不通的。清朝文字学家段玉裁说：“纬书说字多言形而非本意，此虽近理，要非六书之本，然下体亦非月也”^② 按纬书所言是会意，近乎望文生义，不是易字的本源。易是象形字，正确的说法是变动不停及生生不息的意思，所以易与卜筮应联在一起，卜筮所问的采集、渔猎等经济活动，所求知的事也就是在时间变化上所出现的动植物多少、繁盛、病萎情况，这正是与他们当时生存攸关关系的大事。

阴阳与生产的关系，就是自然与生产的关系。《易经》

《易经·系辞·下》。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的主题，也正是上述两者的关系。庄子《天下篇》的“易以道阴阳”的本意，现在需要再进一步加以探索（以下“阴”、“阳”在有必要的地方，改用繁体字，以便从文字学角度来说明），以追溯其与原始经济活动的关系。

《易·系辞·上》五云：“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注：“雨在故不测”。从原始社会到二十世纪今天，我们对天气预报中的雨量多少，仍是一个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古人说：“雨……不测”。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说文》：“阴”字下说：“暗也”。《释名》：“阴，荫地，气在内奥荫也。”句中“气”字，应作生机解，与俗语所说精气神，人之三宝，其意相同。又按阴之偏旁为“阝”，其部首是阜，《尔雅·释地》：“大陆曰阜”并有生长之意。原始人经过采集渔猎经济阶段，然后进入原始农业经济阶段，对地与大陆才有了更高的认识。如《书经·周官》卷六：“阜成兆民”，这是说大地繁育了众兆的人民的意。按“阴”古文作，是今字和云字相合而成；“今”字在《说文》解释为“是时也”。“云”为之原字。就是水气之意。字全部含义，就是大陆上弥漫着水气，是万物茂盛的生机。

阴和阳相配，才是《易经》中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至于“阳”字，除偏旁“阝”外，另一组成部分是“易”。

《说文》：“开也”；从日一勿。一日长也。”“日”是天体的主要部分之一，“一”字在《易经》八卦中是天的意思，即“天一地二”^①也，近似于古语所谓一画开天。《说文》又进步阐述：“一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你看他把“一”和“天”说得多么玄妙神奇，并将天地孕育万物也清

① 《易经·系辞·下》

楚的指了出来。“勿”这个字在《说文》中解释说：“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杂帛幅……。”“勿”本是象形字，象征在旗杆上杂颜色帛条，是表示太阳光的光线。“阳”字就是指天上太阳光普照一切，给人们带来光和热，是使“万物资始”的基本条件。

以下再从“乾”“坤”二字进一步阐明阴阳，“乾”字在《易经》八卦上是纯阳。《易·乾》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易·杂卦》：“乾，天也。”《易·说卦·九》：“乾，天也，故称乎父。”天是“万物资始”的生产要素，原始人们故称“乾”为父，“乾”在文字学上，有清楚的解释，《说文》曰：“乾，上出也，从乙，乙，物之达也。”清朝文字学家朱骏声在其所著的《说文通训定声》上说：“乾，上出也，从乙，物之达也……按达于上者谓之乾，凡上达者，莫若气，天为积气，故乾为天”。从上之所引《易经》与《说文》上看，可知“乾”既是形声字，又是会意字，“日始出”，①朝日东升之象也。“物之达也”，就是大地上，在_日春和煦气温下，草木萌芽而柔曲生长的形象。日照对于动植物生长发育关系至大，原始人逐渐从采集生产实践上，有了进一步理解，到了原始农业阶段，认识更深，于是产生隆重敬天思想。《尚书·尧典》：“钦若昊天”就是这种思想在现存古文献中的另一最早记录。这四个字的含意，不只是敬天，还要顺从天之规律，来推进经济活动向前发展。《易经·上经》“离”注云：“离，丽也，阴丽于阳，其象为火”。就是以离为日和为火。《淮南子·天文训》：“积阳之热而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原始人们把火与其目的性质，看成是同一的，正是由于火的

使用，才能使人类生活内容进一步丰富起来，正如孟子所说：“烈山泽而焚之，……然后中国可得而食”^①。不难看出原始人是把火耕与日照同样作为取得物质资料的条件的。

坤在《易经·坤卦》上是这样说的：“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易经·说卦》九：“坤，地也，故称乎母。”按“坤”是土与申之合体字。《说文》：“坤，从土、从申。”从字形上说，有从土中生长之意。在《易经》中，又将坤字，引伸为坤舆，此见于《易·说卦》：“坤……为大舆。”其意是地载万物，像车子载东西一样，因为自远古以来人们对地之崇敬，有增无己，所以对之歌颂说道：“德均载物，比大坤维”。

总起说来，“乾”字是以日为主体，指阳光普照着万物，给予万物以热和光；“坤”字以土为主体，是表示地之伟大，而万物生长于地上。《易·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就是天父地母之说在古代中国的由来。

以阳为天(乾)，以阴为地(坤)还包含有神格化的自然崇拜。自然崇拜由采集经济发展原始农业阶段时，由卜筮问神也发展到祈求自然神了。这是因为人们在同自然斗争中软弱无力，迫使人们屈从大自然——天地之神的支配而产生的。《易经》原是卜筮书，但对祈祷求神这一类事，没有留下记载。《尚书》把它留传给我们了。如《尚书·大传·洛诰》：“祭者，察也，言人事至于神也。”原始社会中的原始宗教首先是自然崇拜，所以，上引古籍所称的“神”就是天地二神，也就是人间的经济活动向天地神祷告，以求神的庇护。祈祷神明这件事，正如恩格斯所说：“竭力把客观世界嵌

入自己主观思维的框子里……’，

《说文》对“祭”字有较详的说明：“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际也。人神相接故曰际。”按“际”字之意是沟通人与神之间的联系，是原始宗教活动之一。到了近现代宗教，仍然有际于人神之间的宗教活动。在此无须赘述。“祭”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大事情。它渊源于远古社会的人们认为从采集与渔猎所获的食物，全是大自然的天与地二神所赐，所以先将田猎物来祭神。罗振玉说：“春秋传曰：‘惟君用鲜，众给而已。’……卜辞书田猎者，虽无用鲜明文，然大率为祭祀也。”^②再如《谷梁·桓四年》说：“四时之田，皆为宗庙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日蒐，冬曰狩”。按：田、苗、蒐、狩四个字，全是猎的意思。假如奴隶社会统治者把田猎只作为个人乐趣与享受，就会被全国上下共同认为是对神的大不敬。这种情况，在《史记·殷本纪》上说：帝纣“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飞鸟置其中，慢于鬼神。”殷朝上下认为慢于鬼神是殷纣王的一个严重罪行。这就是纣王对国家大事——“祭祀”太不尊重。这种行为在古代要遭到全国人民痛斥的。如果进一步剖析“祭祀”就是对大自然的宗教活动和经济活动的综合。从原始社会采集经济与渔猎经济活动中就产生了“祭祀”经济的涵义。因为“惟君用鲜，众给而已”这两句话，可用旧社会的一句俗语作个不全面的注释，就是：“心到神知，供后人吃”。祭祀一事渊源流长，今以《后汉书·祭祀志》为证：“祭祀之道，自生民以来则有之矣。豺獭知祭祀，而况人乎？”如田狩之事，不只是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9页。

《殷墟书契考释》增订本。

祀行为，还有一个副作用，甚至到了近代世界各国，仍有田狩的必要，这就是通过田狩，以消灭对农作物有害的鸟兽。

祭与狩两者关系密切，直到封建社会，也是如此。今举《易经·师卦·六五》为例：“田有禽”之“田”字就是猎。另一古文献《礼记·王制》说：“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谷梁》也讲：“四时之田，皆为宗庙之事也。”这都明确地说明了存在着自然崇拜。中国社会进入以农业经济占主要地位的阶段以后，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就不像采集经济、渔猎经济阶段那么简单了。诸如种子的收获与贮存，田地的修整与开拓，播种、收获、除草、除虫，以及小规模原始灌溉等等，在生产活动不断改变，趋于复杂的情况下，人们仍感大自然的威力在农业经济中有增无减。所以，人们从卜筮向神，进而发展到祈求天神与地神了。

(II)

在祈求诸神中，首先是阴——地；阳——天。这是由于人类全部生活资料，都是从地上生产出来的。《易经说卦》：“坤……为大舆”。即认为“地”是个大车子，它载着人类赖以生存的万物。另外一部儒家经典说得更为明确：“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①上面引文的大意是：大地载着供应的万物，上天给人们示以自然的规律，人们从大地得到大自然的恩赐，所以人们一定要尊崇天和地。

自然崇拜第一条就是尊天，因太阳的日照与光和作用，以及从天而降的雨露的润泽，是大自然中动植物生长的原动

^① 《礼记·郊特牲》。

力。这几点，原始社会末期的人们经过长期的劳动实践，认识得非常清楚。这是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所积累的卦爻辞有所反映的，如《易·大有》上九爻辞：“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人们崇拜天，求天保佑，才能在农业上，消除不利因素，这是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人们宗教思想的反映。热是伟大的能，《易经》上表达为“日为火”。到了西汉初期人们对于热能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因此所以说：“积阳之热而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①

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人们必然比现代更感受大自然所赐与的恩惠，这是祈求天神的起因。随着社会经济之发展，人口的繁殖，生活资料的需求也日益扩大，使人们感到在原始农业上去获取所需要的东西实在不易，因此，对天（阳）地（阴）的依赖和靠以生存之感也至为迫切，于是产生了畏惧而崇拜天地，希望达到“以通神明之德”。^②

古代社会对自然的崇拜，每每把祭祀天地和农业活动联系在一起，因为“食货所资，皆出于地”。^③ 奴隶社会在祭祀方面有等级之分的，如“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④ 唐朝司马贞在其所补的《史记》中认为农事祭祀创始于神农氏的。《礼记·郊特牲》中曾说：“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注文云：“蜡祭八神，……先啬一，司啬二，农三，邮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

《淮南子·天文训》。

《易经·系辞下》。

《礼记·礼运》。

《礼记·王制》。

按蜡祭八神，是与在大地上生育繁殖有关的，它明显地反映了农业活动中的宗教色彩。《礼记·郊特牲》指明了蜡祭的各个对象，即首先是祭祀创始农业生活的先啬；然后宴祀农官之神及有益于原始农业的猫虎幽灵，因为虎可以吃掉危害农业生产的野猪，猫能捕杀糟踏庄稼的田鼠，全是益兽，因之列入享祭之列；六与七所指的坊、庸，也是人们所祭祀的，因为坊、庸是有利于农业的堤坊和水沟。（按《礼记·郊特牲》书中的注文是这样说的：“坊，堤也，以蓄水，亦以障水。庸，沟也，以受水，亦以泄水”。）原始人们对有利于原始水利的灌溉设施，也看成神灵之一，这是原始社会以来万物有灵论的反映；至于《郊特牲》中列为第八位的昆虫，其祭祀之目的，在于使“昆虫勿作”，即不要造成对农业活动的威胁和祸灾，这样，农作物就能得到生长而免于歉收之患。

在自然崇拜居于主要地位的阶段，古代夏历十月，周（朝）历十二月，供奉有关农业的万物神灵，由天子主持举行盛大的祭祀，以祭祀八神。可见祭祀崇拜之目的是为了与之和好，进而得到神的保佑。从卜筮到自然崇拜“都是自己对时代经济关系的产物；……其他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①

由此可见《易经》中的阴，就是地、坤、女；阳，就是天、乾、男，这是天父地母的自然崇拜的中国形式。从原始社会以来产生的地母崇拜是世界性的。人类学家考察结果，认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甚至文化发达的先进地区，仍有稳约的地母崇拜仪式的存在，这可能是远古留下的遗俗，诸如

欧洲的五朔节（Mayday）和美国的感恩节（Thanksgiving day）等，都与此有关。

自然崇拜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均盛行不衰，它见于许多古文献中。根据王子年《拾遗记》说明远古传说时代的庖牺——伏牺，就有崇拜自然界百神的祭祀了。到了夏朝，由于私有制的出现，神权越来越为氏族长及部落联盟长所掌握。这些独掌最高神权的政治领袖，到后来就成为至尊的天子，祭天的神圣大典就由他们来主持了，可见其性质的隆重。《尔雅·释天》：“祭天曰燔柴”，就是焚柴使烟上升于天，表示敬祭之意。古代祭天地也同样由天子主持，《尔雅·释地》指出：“祭地曰瘞瘠”就是把祭品——牲，埋在地下，来敬祭地神。《唐书·礼乐志》记载：“古者祭天于圜丘，在国之南。祭地于泽中之方丘，在国之北。”

封禅是古代帝王对自然崇拜的另一表现。历代王朝，全以封禅作为国家的典礼。封禅渊源于原始社会，是部落联盟在举行会议时，部落中的成员要来祭天，尤其在战争之后，大聚会各族酋长的时候，也要祭天，报天之功绩，故曰封……报地之功，故曰禅。对天地之自然崇拜，后来发展到在一国之都城中建天坛、地坛，以隆重举行祭天的大典。现在北京的天坛、地坛，就是专供明朝皇帝祭祀天、地神而兴建的。

总的说来，祭祀天地，是祈祷天父地母之神的，它含有“生生”繁殖滋生的意思。因此有关古代祭祀的《礼记·郊特牲》说：“万物归根复命。”《易·系辞·上》五：“生生之谓易”。这句话的注说：“阴阳转易以成化生”。《正义》疏曰：“不绝之辞，阴阳转变，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上面所引的“万物归根复命”和“万物恒生”这两句

话 就是指人们崇拜大自然天地之神 希望得到“ 恒生 ”“ 复命 ” 的愿望。而易由八卦，变为六十四卦，再进而为三百八十四爻，正是“ 阴阳转易，以成化生 ” 的一种表现在符号上的形式。

用“ 阴阳转易 以成化生 ” 来注释“ 生生之谓易 ” 此对于《易经》全面概括还有所不足，因为溯源探索于经济方面，它只是《易经》最原始一个方面。《易经》是包罗万象的，《易·系辞·下》：“ 易之为书也 广大悉备 有天道焉 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这是易学发展至此，以天地人三才之道，代替了自然崇拜的鬼神之道。《易系辞·上》：“ 一阴一阳之谓道 ”，天地间一切事物变化现象，全是依当时之时机与所处之地位，或成为阳刚，或成为阴柔，刚柔动静变化作用不息的法则，这就是宇宙的法则，人生的要谛，即古人所谓的天人之学，或叫做天人合一。《易经》是从求问经济活动前景的卜筮，经自然崇拜，上升到天人之学。它达到了人类社会哲理之大成的高度。易道深矣。连孔子也说：“ 加（或有作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可见易在天人之学方面大有深入探究的必要，这是《易经》引起世界古文化典籍研究者重视的原因。

中国远古的自然崇拜，祭祀崇拜天地（阴阳）可能与自然条件有关：中国仅东部有一条海岸线，远古交通条件很差，难以在茫茫大海中探出一条海上交通线；西边是一条艰难险阻的陆路；南部高山丛立，将中国与印度、缅甸隔开；北部又是广漠的高寒地区，所以从我国地域上的自然因素，造成一种中心孤立感，以为中国居天下之中，中国就是天下的代称。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我国帝王，皆自称是上天之子。帝王称为天子，就可借渊源久远的敬天思想，来抬高

统治者身份、地位，又可神化其人。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经济意识是顺应自然地生活。“天人合一”就是《易经》所称的“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把天道与人道密切等同起来，就是天人合一的理论之一。《易经》中以阴阳 — — — — 两个符号来代表天地、乾坤、男女，所演化解释的正是自然与人的关系。这就是“易以道阴阳”所高度概括的含义。

（二）易理与经济管理举要

1. 易之宏观管理思想

《周易》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典籍，它在儒家经典中居首位，其价值从古至今一直不见减色，而且现在西方还形成了《周易》热。《周易》据古史传说，是经过三位圣贤完成的。“自伏羲画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史记·日者列传》）西伯……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史记·周本纪》）孔子晚而喜易，序、系、象”（《史记·孔子世家》）所以《汉书·艺文志》上说：“易道深矣，世历三古，人更三圣。”《周易》不是一个时代形成，古史有明白的记载，但也不是几个天才人物的产物，它虽然初起是卜筮，后来公认为是哲理书，也就是从卜筮以告诉人吉或凶，进而根据哲理指示人们如何趋吉避凶，管理也就在其中了。可是两千多年以来，历代研究《周易》的全属象数、义理两派，这就有了局限性。突破了这个局限性，才可见《周易》是跨科学的，综合性的。《周易》是四五千年来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结晶，在其中包含有宏观管理思想，而且也是最早将管理成就记载于典籍上传之后世的。

《周易》在东方思想史上，有巨大深远影响，现在受到西方的重视，新译本不断出现，研究《周易》的团体日益增多。

(I)

《周易》中的“易”字，就与管理有渊源。因为《周易》以阴阳二者变动化易作为根本原则。按“易”字可能是根据“蜺蜥”、“壁虎”、“蜥蜴”的形状而创造的象形字。因为“蜥蜴”这种动物一天能变十二次肤色，所以“易”就表示在不同时间而能变动颜色及形状的。由此可见“易”者就是不断变换之意。在《周易乾凿度》上说：“易者，易也，变易。”清朝学者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中》说：“孔仲达曰：‘夫易者变化之总称，改换之殊称，先儒之释易，未有明若孔氏者也。’”易是指变易的，社会中各种组织与情况是千变万化的。人从原始社会以来就想从千变万化的环境中对付变易的环境。古代人们从卜筮来问一些事的千变万化，而结局就是两点，吉或凶，这其中就孕涵着管理与决策，所以我认为《周易》是最早提示管理的。

《周易》是于卜筮而发展成具有哲学思想的儒家经典，因属于卜筮，所以逃脱了秦始皇焚书的灾难。（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卜筮辞中除记录了占卜以外，还有一部分是现实生活的总结，给后世留下很多宝贵文化遗产，其中经济管理资料，是宝贵的碎金片玉。

(II)

《周易》以阴阳为主。《易·上经》中说：天是阳、乾；地是阴、坤。按照《周易》的宇宙观来说，阴阳二气的变动

是宇宙的生命原动。《易·系辞上》：“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说卦》）又《系辞·下》：“变动不居 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是指人生与社会现象变动不息，时时在变化。

阴阳是《周易》中的基本符号，代表阳的是——，代表阴的是——，它是八卦的根本。由这两个符号组成四仪，每三个配成一卦，共有八卦，古人称作「经卦」，把八个经卦，每两个配成一卦，共得六十四卦，古人称作「别卦」。六十四卦同是由阴阳两个符号，古人叫作爻的六个爻组成。在乾坤两个别卦，各加上用九与用六。这表示从原始社会以来特别重视天（乾）地（坤）。这就是由阴阳两仪，变成四象：太阳、少阴、少阳、太阴，由四象变成八卦再变而成六十四卦，还有进一步的变化，在此不加详述。

《周易》以阴阳为主，阴阳是两个对立的符号。在《易》中明确的说：刚柔、高低、前后、上下、左右、内外、升降、进退、屈伸、往来、聚散、盛衰、消长、盈亏、新旧等，并认为无不是相对的关系，并互相转变，互相代替。所以成为相对中的绝对，成为变中之常，把《易》之对立论应用到管理上，如能完美的掌握运用，就是达到企业发展顺利的最可靠的途径。

《易》之对立论，其中有一是刚柔上的。或者说刚柔相济。对立的如相互需求，并互相依存而能存在，就能相济，也就是调和好彼此关系，自可产生正面效果，也是相生之现象。如刚柔不相易，那就因对立而对立了，其对立终必走上对敌之境，也就是易之所谓相克，必然产生负作用，双方力量因而抵消，所以阴阳对立论，可以启发我们在企业的决策

与管理上。为了进一步说明，再引《尚书·周官》：“论道经邦，燮理阴阳。”蔡沈注：“阴阳以气言，道者阴阳之理，恒而不变者也。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在“燮理阴阳”中之阴阳二字，其含义已经扩大，成为调理，亦即管理国家的最高准则。

(Ⅲ)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易·序卦》）。三个爻合起来，即叠三奇 ☰ 的表意符号是天，就是《周易》之乾三连；三个阴爻叠三偶为 ☷，其意义符号是地，即《易》之坤六断。

八卦最初的象征意义，正如《易传》所说：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八卦是八种自然物质。而这八种物质中的天与地是主要的，其次是水与火。这八种物质元素也是宇宙的根本，基本符合人类历史实际情况。用八卦作为符号，是古人认识和管理世界特有的智能现象。它是思维反映物质的外表现象。

八卦中之乾坤坎离与人类的生存关系最为重要，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对其有更多的注意，而《周易》中留下深奥而珍贵的管理思想启示。

人类首先认识的是天和地，因为原始社会的人们，取得食物的劳动，只限于从土地上生长和受天的因素的天然产物，即天之下、地之上而生长的植物，以供养身体维持生命。现在先从乾（天）说起。

人在地球上是有生命的一种动物。人首先迫切需要了解的是天。所以《中庸》上说：“思知人，不可不知天。”

《易·系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取法于地。”古代社会的圣哲凭他们高明之智慧，丰富的经验与实际观察总结所得。最

早而又未遭焚书之难，也未出现了大断层，只存在于《周易》。《上经·乾》：“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天是统理万物生生不息的根本原素。又“大明始终，六位时成，乘六龙以御天。”再又“乾元用九，乃见天则。”（《乾·文言》）以上引文全是说万物皆基于天，此处说的天，毫无宗教气氛，天是自然的，无意志的，天生万物，化成万象。

《易·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所以人要尊重大自然规律，也就是人与天要合谐。《易·乾·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这是说顺从天，要与天地的功德相契合，要与日月的光明相契合，要与春、夏、秋、冬四时的时序相契合。即是人要与天一致合谐。《易·泰卦》：“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财成就是加以调整成就，辅助就是遵循天地规律，而加以辅助、调整、安排，使其符合人们的愿望，既不是屈服于自然如天降大雨，造成洪水之患，如夏朝时大禹治水，也不破坏自然，以天人相互协调为理想。正如《易·系辞上》：“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按济字与齐通，即整谐调和意，要与大自然步调一致，是古人在管理方面在自然环境中注意到天的因素。

现在进一步阐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这两句话的意义与管理的关系。“天”字简单而通俗的说，即是天气。天气对人类影响极大，它每时每刻都在施展其神奇魔力。天气凉热、阴暗，风雨，云量等变化情况，是左右着人类生活环境的要素，又是供给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重要资源，它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发生直接的作用。农业、工业、海陆空的交通以及国防都不避免的受到“天”的干预，即《易》之“乃统天”。农业与天气关系最密切，农作物生长需要光、热，和

降自天的水分，如云、雾、露、雨。牲畜的放牧养殖，其生长同样受到天气情况的左右，如水涝干旱，冰雹，寒潮，必使农作物减产和畜牧业受损害。

天气对工业的影响虽不如农业那么大，但对原料来自农产品的食品工业，棉纺织业还是明显的。恶劣的天气能阻断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浓雾、暴风雪使飞机不能正常飞行，火车、汽车、船舶行驶困难甚至抛锚。新兴的宇宙航行，同样受天气冷热的影响。所以人们要掌握天气变化的规律，才能谈到管理，用准确的预测来趋吉避凶。这是自然之理，阴阳之变。《周易》告诉人们用“八卦定吉凶”，我们则要从《周易》发掘企业管理的思想。

(IV)

原始社会的人们，取得食物的劳动，只限于从土地自然生长的天然产物，即获取的是从土地生长的动植物，以供养身体并维持生命。人们在长期缓慢进化中，逐步提高对“地”的认识。在《周易·上经·坤》中有这样的话：“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及《周易·说卦》：“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这里对于伟大的“地”给了崇高的评价，其中就包含有管理思想的萌芽。“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周易·坤卦》）这就说明古人对于土地有深刻的认识。其中“乃顺承天”是古人在蒙昧阶段崇拜天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要顺从大自然规律，不要违背大自然规律。“顺”即适应顺从大自然，如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以顺从大自然的规律，才能占有大自然所赋予的恩赐，如此就能“万物皆致养焉”。违背破坏自然界生态规律，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从原始社会的经济活动（如狩猎、渔捞、采集等）、畜牧以及初期农业

的出现，到现代大工业，哪一项也离不开“地”，地是被称赞“至哉乾元”的，而“万物皆致养焉”。即使生命工程科学再发展，人类要维护生存仍离不开土地。

我国历代统治阶层中之所以对《周易》中的“至哉乾元，乃顺承天”中有关土地管理方面的观点缺乏了解，一个原因是被《周易》的形而上学神秘烟雾所干扰，另一个原因是因占卜而致力于象数上研究《周易》，而不从如何管理土地上去研究，因之远离了科学的道路。几千年来残酷而过分掠夺土地肥力，不给土地恢复肥力的时间和条件，这无异是榨取土地。破坏了土地肥力就是土地管理上的失误，必然给农业带来恶果。我国以农立国，可是因土地管理失当，而给农业带来连绵不断的灾难。农业灾荒，在历史上不断，主要原因是没有“顺承天”，即没有顺应自然规律而加以管理的原故。重视土地管理，首先要保持土地肥力。以保持耕地中有益物质，输出与输入要保持平衡。以上都是土地管理的主要事项，管理好土地，才能保障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

(V)

人类对水的认识与地一样早。原始社会时人以狩猎和采集经济为生，无水是不能生活的，那时是逐水草而居。进入初期农业阶段后就不再逐水草而居了，而是近水而居了。水与农业生产是密切相关的。“水流向不盈”、“习坎、入坎”，（《周易·坎卦》）水的自然流动状况对地球上人类生存最为重要。水流盈是正常状态。不盈，不是泛滥就是水流不畅或河水枯竭。问题的解决，就要“习坎”，即观察水性，“入坎”，即深入理解水性。地球表面上的水占百分之七十，了解和管理好水，使“水流而不盈”才能够灌溉良田沃土，又能

起调节气候的作用。“习坎”、“入坎”就是要观察认识水性，只有这样才能管理、保护好水利资源，从而有效地利用水。

“习坎，入坎”就是与水害作斗争，远古的事例，只能见之于古史传说上。“往古之时……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颧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积芦灰以止淫水……淫水涸，冀州平……颧民生。”（《淮南子·览冥训》）这是最早与水斗争的神话传说。《管子·揆度篇》注说：帝共工氏继女娲而有天下。共工氏既是神话人物又是古史传说人物。据徐旭生考证，共工族居处今河南省辉县，正处豫北平原，按该地自古以来就是容易发生水患的地方。（参考《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共工氏同他的儿子全与水患作过斗争。“共工氏……其子曰后土，能平水土，故祀以为社。”（《国语·鲁语·上》）共工氏有子曰勾龙。为后土”（《左传·昭二十九年》）后土既是人名又是官名，是管理土地的官，按土地管理的官就是社。所以《孔子家语·五帝篇》上说：“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治百谷者多矣，唯勾龙兼食于社。”就是说自古以来在管理土地方面只有勾龙贡献大，才在土地官位受到崇祀。在对水的管理方面也以共工氏和他儿子勾龙成就大。当然，共工氏在水的管理上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国语·周语下》有如下的记载：“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五五〇年）谷洛斗，将毁王宫，王欲雍之，太子晋谏曰：不可，晋闻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塞泽。”大意是，在周灵王二十二年时，原来谷水在王城北面，洛水在王城南面，各有各的水道，现在突然二条水位大涨，谷水溢出故道，流入洛水水道，两条河水相争，水位迅速上涨，不只要淹没王城西南，恐怕要毁掉王宫。情况十分险急，周灵王想截堵谷水，导水北流重回故道，免得发生水灾。但是

太子晋反对这样做，他说古代统治者，不堕毁高山，不填高无水沼泽地，不堵障水流，不决开湖泽使积水外流。他认为不能轻易将自然生态环境作大的变动，那是大自然的规范。太子晋进一步举出了共工氏在管理水的方面，违背大自然规律的事。说：“昔共工氏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患并兴，共工是灭。”就是说共工管理水的失败，是因为没有从全局出发，只为本部族着想，取高垫低，堵障百川河流，结果天下都受了水灾的祸患。“共工氏为水灾 故颡顛诛之。”（《文子·繆义·上义》）共工的错误，致使上天也不祝福他，老百姓也不响应他，结果，在外族报复攻击和内部人民的一致反对，共工氏终于遭到灭亡。这就是“习坎、入坎”不够的原故，共工氏以后在管理水的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是禹。原始社会末期大禹治水一事，是古代传说中最受重视而为人民所乐道的有关水的管理的事。禹的父亲鲧曾去治水，“九年而水不息 功用不成。”（《史记·夏本纪》）鲧的失败原因是因为他“遂共工之过。”（《国语·周语下》）他走的是共工失败的路子，也是习坎不够。禹接受舜的使命继承其父的治水事业。“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 过家门不敢入。”（《史记·夏本纪》）因为禹“劳身焦思”“习坎、入坎”作的好，变水害为水利，将水管理好，此事关系到古代国家的创建与统治，所以“禹代父鲧为司空平水土之官 以有天下。”（《邦计汇编》宋·李维）建立了夏朝。

人类发展离不开水，无论农牧业、工业及服务业莫不如此，如果水管理不好，就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三国时魏国王弼在他所著的《周易注》中说：“坎 险陷之名也。”水患是人类最大危险之一。《周易·说卦》：“劳乎坎”水患的治理

要付出最大的艰苦劳动，所以说人们必须在水的管理方面要付出足够的辛劳。我国从公元前二六六年到公元一九四九年，共发生大的水灾一千零九十二次；较大的旱灾一千零五十六次，这是因水流不盈或水流越过盈的程度而造成的旱灾或水灾。水是生命的根。在原始社会采集经济时期，人们就逐水而居。进入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则是近水而居，靠近河水建成了大的聚点，以后发展为城市。“习坎有孚”（《周易·坎卦》）是说相信人们深入学习水性一定能管理好水，“如月行天”故“习坎有孚”。“水行往来 朝宗于海 不失其时。”（《周易集解·坎卦》注。唐·李鼎祚）是说人们深入地“习坎”，掌握水的规律，就不会弄错水的涨落规律而失去了控制。“习坎入坎 失道凶也。”（《周易·坎卦》）“江河淮济，百川之流，行乎地中，水之正也。及其为灾，则泛滥平地……是水失其道也。”（《周易集解》引干宝注）失道就是凶，如果要避免发生凶险的水患，就要学习管理好水，防止水患的发生和变水害为水利。

(VI)

八卦的离卦，离为火。“离，丽也”；“离者火也。托于本，是其附丽也。”（《周易集解》卷六）人类生产和生活离不开火。马克思、恩格斯把火的使用，当作划分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马克思认为原始群告终始于把鱼类用作食物和获得用火的本领。（参见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恩格斯也说过从原始群向更高阶段发展，由采用鱼类（虾类、贝壳及其他水栖动物都包括在内）作为食物和使用火开始。（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十页）。

我国云南元谋人，周口店北京人也经历了这段原始社会历史过程。从使用天然火到人工取火曾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间。古代是“钻燧取火，以化腥臊。”（《韩非子·五蠹》）韩非子指的是人工取火，时间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这是对火的控制和掌握，此后人类进入一个新时代。人工取火是人类控制自然力的开始。这个伟大的成就，在考古发掘上，有周口店山顶洞人留下的篝火遗迹。这是我国原始社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人类生活的巨大变革。据儒家文献记载：“舜使益掌火（即管理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疏导河水即是管理水）……然后中国可得而食。”（《孟子·滕文公上》）这是古代早期我国人民对火与水的管理，古时人民曾以火来开发到处榛杻的荒芜原野。

原始社会的人们先使用天然火和发明人工取火以后，初民对火的管理成为生活中主要大事，这是因为人工取火得之不易。当时人们燃烧火堆不使熄灭，迁移时也带着火种。根据民族学资料，澳洲塔斯马尼亚人就是这样管理火的。当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时，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时候，氏族中行火（即管理火）的人，必须由年老的氏族长来担任。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王”字作“𠩺”，“𠩺”是器皿，合起来即是皿上有火燃烧的样子。而王字的原意是管理此器皿的人，也就是管理火的人。（参见《中国古史起源考》丹羽正义著，江侠庵译。载《先秦经籍考》）现再以古文献作进一步说明：“司燿掌行火之政命。”（《周礼·夏官》）行，犹用也。行就是管理的意思。司燿是管理火的官，此是奴隶社会国家组织机构扩充了，原由王管理火的职事，拨归专门管理火的官了。

(VII)

《周易·上经》最后两卦是“坎”与“离”卦。坎离合起来就成了《既济》卦。《周易·既济》卦是离下坎上，就是火在下，水在上。水火是不相容的，是相克的，“水火不相射”（《周易·说卦》）“射”厌也，就是抑制之义，也就是对立的。离与坎合在一起，成了《既济卦》。怎样把相克之性变为相生之用？也就是使水与火相济？做到这一点是人类在管理水与火方面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周易》中的“易”字有三种含义，其中一种就是变易。“易者易也”（《周易乾凿度》）“易其害为益，认识和改造世界就在“易”字涵义中。“易”字如何在水火之中起调和的作用，使对立的矛盾怎样转化，叫不相容的水火和谐起来，就必须在水火二者中间有一个调济物，这个调济物就是原始社会的人们在陶器、金石并用时期所创造的铜器。“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本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礼记·礼运》）“火之利”就是利用火的热力、如何管理好火，使它对人有利用，用火的热力而“合土”。由于学会了管理火，进一步推进了制陶术，水和了粘土，经火烧炼，改变了原材料的化学性质，成为新物质、新材料。这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一项重大创造。原来只是消极的顺从大自然的安排，现在通过人们的努力，达到改造大自然的目的了。到了夏朝有了铸造的铜器，就是“范金”。古文献上记载说：“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左传宣公三年）在夏朝的时候，在远方图画上有少见的稀有之物，又叫九州牧长贡献金铜，禹用这些金铜来铸鼎，并在上面铸造上图物。夏朝的铜器遗物在考古发

掘上尚未见到，但从商朝出土铜器物来看，商朝的冶铜技术水平高，一定是继承夏朝冶炼技术发展起来的。有了陶器与铜器，使水火相济的调济物就有了。

用陶器和铜器，在器皿中放进食物与水，然后将器皿放在火上烧，火焰的热能将器皿内的水烧沸了，火的热能将水的蒸发力强到将食物煮熟变软，这是水导火的热力，产生有益的作用，由此水火由相克变成相生了。水火调和克服了对立的矛盾，是人类管理水火的一个大跃进。自从人类在管理火和使用火方面取得进步之后，火化熟食是半消化的成品，因此缩短了消化过程，并且使人吃的食物种类和范围扩大了，也能更多的吸收营养，增强了人的体质。正如《周易·既济》卦注：“水火相交，各得其用，故曰既济。”

从字面上讲“既”是完成意和尽到意。“济”是渡过水，又含有好意思，今天河北东部及中部的方言，常用“济了”来表示成了、好了。既济成为复合词，那是都渡过水了，比喻一切事物都已完成。从卦象上说，本卦坎为水，离为火。离在下，坎在上，是水在火上。在下面的火，其性是往上炎的，在上面的水，水性是润下的。上下相交，怎样才能济呢？靠的是调济物——陶器与金属器皿，和水火两者的相助，火不烧水，则水熟不了食物，以火助水熟物，火也尽了它本身的作用。

在《易·卦辞》云：“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前面说了“既济”是一切事都完成了。通是通达了，但亨通是小的，是说天下事没有不变的，所以应当守着经营的正道。在企业有了成就之后，是初阶段的吉利，如果满足于企业之成就，而不戒惕，可能会发生的变化，终必乱了套，造成企业经营失调，就是“终乱”。这是溺于晏安，而不去求济。“象

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思患而预防之。”所以要有预防，才能保其“初吉”也就避免了“终乱”之患。

(VIII)

在“既济”卦有终乱的告戒，所以要心存未济。下面就谈“未济”卦。未济是既济的补充。本卦是坎下离上，坎为险，王弼《周易注》：“坎，险陷之名地。”离是明，“日月丽乎天”。（《周易离卦》）在日月之光照耀下，比喻为顺利之情况，谓之明，可是外虽有明之象，但内含险情，内险即企业在险中。一个企业家如未自济，是说没有正确经营观念，当然即不能济人，即指领导企业员工，此从卦义上说名为“未济”。再从卦象上来说，坎为水，离为火，水火背向，不能相接触，调济物也用不上，不能由相克变成相生，所以卦象名之为未济。水火不交为未济。未济是既济的补充，而不是它的延续，因为“既济”有终乱之戒，且为相交之中，还有相害之机潜伏着，这可从两方面来说明：水多了溢出皿外则火灭，火过于旺了，则水涸；企业之中上下相交而和睦，日久也会发生变化，企业发展到高峰，居上位的容易骄，职工因满足现状而容易懒，干劲就下降，是从已济，转为未济了。

宇宙是多么广远，航天事业不过处在起步阶段。人事社会更是复杂万端。一个最发达的企业，不能永有“既济”之日，说某一企业的成功，只是某一阶段的成功而已。如石油十姊妹控制全球石油市场，及至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一出现，立即失去控制石油的威风。所以对“既济”与“未济”深入学习应用在管理学上，将是十分有益的。

《周易》是一部有关社会经济哲理的书，书中蕴含了不少管理思想。本文所发掘的只是阴阳六卦的管理思想，为进

一步加深研究我国管理科学实践上，提供一愚之得。

2. 易理与管理决策

《周易》是中华民族炎黄祖先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社会最高哲理之大成，是世上古文文化学者最为关注的宝贵经典。之所以如此，可先看《易·系辞·上》所说：“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务成物，冒下天之道……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断天下之疑。”这几句话是说，易开创万物成就，包括天下一切道理，就是这样一门学问。所以圣人以易理通天下一切人的心，用易理来开定天下的事业，并用来决断天下中一切的疑难问题，这是易成书时所为。后代研易者还有进一步说明。唐朝的孔颖达说：“故易者所以断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周易正义》序）宋朝易学家程颐说：“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务成物之道也。”（《易传·序》）载《二程集》成为儒家经典的《周易》，其定型为今本现状，是有悠久曲折发展的。《周易》经过夏、商、周三朝，定于孔门儒家之手，虽渊源于卜筮，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最初在宗教的形式中形成。”^①《周易》正是如此，它用天、地、人三才之道^②，去代替鬼神之道。其目的是总结和概括客观世界的基本规律，以开阔人们的思想和指导人的行动，来开创如何引入吉途，而避开凶境。十翼即先秦时所称的易传，十翼是古人解释发挥《周易》卦名、卦辞和爻辞的。通过解经，即上下经的经文，将其原始宗教的卜筮予

《资本论》第四卷《马恩全集》第二十卷第26页。

见《系辞》：“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

以扬弃，加之以理性思维的思想内容。从易之上下经到十翼的完成，约经历了七八百年，所以卦爻辞所含的哲学智慧，经过解经有了大量阐发，其中有从哲理上为国家管理奠定了基础。

孔颖达和程颐二人所说，都认为易之哲理是阐发客观规律的科学，乃“明王道”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古人说它是“王教之典籍”，因此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周易》。汉朝将《周易》列为六经之首，提高了它的地位，历代研究热情一直不减。

我国历史上出现的有成就封建皇帝多少都从《周易》中汲取教养。汉化较深的清朝康熙皇帝，最具有代表性。他在《口讲易经讲义》的御制序中说：“惟王道法，裁在六经，而极天人，穷性命，开务前民，通便尽利，则其理莫详于《易》。《易》之为书……广大悉备，自昔庖牺，神农，黄帝，尧舜，王天下之道，咸取于此……若乃体诸躬行，措诸事业，有观民设教之方，有通德类情之用，恐惧修省以治身，思患预防以治世，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而治理备矣。”（朱彝尊辑《经义考》）

《经义考》中记述了康熙帝以经学为王道治国的法则。并说：“其理莫详于《易》”，又说：“易‘观民设教之方’，能治身能治世，援引易理来伸展开，顺其类而推求之，增长之，因为天下万事皆尽在此易理之中，所以治理国家的道理也就具备在其中了。”


从易理中汲取哪些在“体诸躬行，措诸事业”上，现在仅举三个主要方面，希望这些能作为企业领导的启示。

一、从阴阳消长转化可用在应变决策上

《周易》以阴阳为主，阴爻阳爻六个符号叠起来，即六

个爻，就成了一卦。《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句的主要是说：一阴一阳相反相生，运转不息，是宇宙万事万物盛衰存亡的根本，这就是道。所以说阴阳是八卦的根本，因为由阴阳二者结合交感而产生万物，是一切现象的根本。

《周易》之六十四卦代表六十四个具体的事物，每卦六爻的时位，就代表此一事物在具体条件下所呈现出六个层次的变化，所以六爻的吉、凶、悔、咎不同情况，是源于主客观条件之变化。而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随时随地在不停运动变化。关于变化，《易·系辞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三句在《周易集解纂疏·系辞下》的注疏中有如下的说明：“阴穷则变为阳，阳穷则变为阴，剥极必复，复极必剥，皆天道自然之运也。庖牺教民取禽兽，民众兽少，其道易穷，神农则教民播殖，以养其生，是血食穷，则变为谷物，此穷变之大要化，化而裁之，存乎变，故穷则变，推而行之，存乎通，故变则通。”

前面说了，宇宙间万事万物随时随地在不停运动变化，不能只看一时，如大壮卦  乾下震上，本卦四个阳爻，两个阴爻，阳盛阴衰。卦辞。大壮，利贞。按说在大壮的时候，应是大利贞，但未用大字。朱熹注说利在正固。这是说阳刚大壮，容易转向弱的方面。爻辞：“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初在全卦最下端，趾本为足趾，足的功用在行动，壮于趾，即勇于动。征义为往，征凶是以刚冒进必遭凶祸，这就是用刚而未防止转向反面。爻辞。“九二：贞吉以中也。”居中用中所以得吉，是刚而能柔之象。“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在这个爻是说应当谨慎，像禽兽畏网罗似的，不要得意忘形，误触网罗。羝羊壮

健，性喜抵触，壮于进，羸其角，是触入藩篱，羊角被挂住了，进退不能，这是戒人自恃壮力的比喻。因此刚壮要配之以柔，以达到刚柔相济的平衡状态。在应变决策上要从调整阴阳关系上，汲取借鉴。大壮虽有可喜的状况，但六爻只九二居中得吉，其他爻辞反多凶危之义，正是要我们刚柔相济、防患于未然。

再举一卦。豫卦䷏ 坤下震上。豫。朱熹注：“和乐也”，情况处此应该逸豫了。可是本卦六爻，除“六二……贞吉”之外，余爻不是凶即是险。这是告诫人们，逸乐的生活是好事，但享受惯了，丧志败德，而不能知止知戒，欲罢不能，好事成了坏事。朱熹注六二说：“豫虽主乐，然易以溺人，溺则反而忧矣。”豫卦强调居安思危，要有危机感，处豫而要想到会产生不豫的事，六爻中的“初六 鸣豫凶”。因为它自鸣得意而遇凶。六二，以中正自守不豫得贞吉。“六三：盱豫悔，迟有悔。”盱是仰目上视，是张目仰视来伺察在上以取媚，可是举止不当或者迟了而有悔。九四因多惧不敢豫，因为不是志大行之时。本爻是卦中唯一的阳爻，以阳刚之资，处在阴柔之中，所以失位之爻，不是行大志之时。“六五，贞疾、恒不死。”六五是阴（爻）在阳（爻）上，以柔乘刚，形势不利，如人有疾病，因为知道有病，产生病危感，所以才可救“恒不死”。因此管理者要居安思危。“是故君子安不忘危 治不忘乱”（《易·系辞》下）豫卦是告诫人们 根据阴阳消长和互相转化的规律，要居安思危，作出调整，来防止产生负作用。

二、“太和”是国家管理的最高目的与达到目的的方法

《周易》提出的太和境界 是这样说的：“乾道变化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

卦·彖传》) 宋朝程颐注：“保谓常存，合谓常和。”(《二程集·程传》卷一)^① 又宋·朱熹注：“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保合全于已生之后。”(《周易本义》) 乾道即天道，天道是刚健中正的，太和即指最高的和谐，指各种矛盾的关系，相处在刚柔相济，而又协同配合，保持了最高的和谐，所以万物生长，天下万国全都安宁。

《周易》所提出的“太和”是作为奋力追求的最高境界。它是国家企业以之施行的有效管理。《乾·彖传》虽是讲宇宙万物生成之原理，实质上说的是物质运动的普遍规律，亦即保持住阴阳对立的平衡，使各种矛盾关系由紊乱的无秩序状态转为协和有序的状态，事物才能相对稳定，如果不树立一个太和境界作为国家或企业奋力追求的目标，一切措施将无从谈起。《周易》以“太和”作为管理国家或企业的理想目标，而且在《经》与《传》中提示了给人们如何处理矛盾以达到理想目的方法。如《易传·系辞》和《易经》中的两卦，有的地方，从表面上看似乎矛盾，但深入探索，实是平衡阴阳的对立，统一矛盾关系，如《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贵贱位矣。”乾为天为高，坤为地为低，这就定下了尊卑贵贱的等级在人类社会上，但是《易经》的否、泰两卦的经卦上下一倒换，就出现完全不同的卦和卦义。否卦䷋(天)上，坤(地)下，“彖曰：天地不交，否。”朱熹注：“否，闭塞也。”彖曰：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本卦天在上，地在下，是符合天尊地卑如《系辞》所说的情况，否卦彖曰：是天地不交的现象，以国家或企业来说，如国家政府领导或企业的领导

者高高在上，而不与属下相交往，由此形成的隔离，会导致企业中上下分离，引起管理混乱。

把否卦上三爻和下三爻，上下一倒换，就是泰卦。泰卦䷊乾下坤上，“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宣 以左右民，”朱熹注：“财成以制其过 辅相以补其不及。”彖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以上是泰卦象彖之辞和注文。下面再引古人进一步的说明。“天地之道何道也？一言而尽，曰交而已。君民之情交，故鰥寡达于旒纆，君臣之志交，故幽侧发于梦卜，天人之心交，故言行感乎日月，大哉交之道乎！”（杨万里《诚斋易传》卷四）从上引都是说，相交而致相通，按所谓志同即沟通思想，从而达到认识上的统一。从领导者来说，就是虚心接纳意见，而使下情上达，这是国家或企业稳定发展的保证。

太和思想作为管理国家和企业方面，还可以另一卦为说明。剥卦䷖。剥卦六爻只存一阳爻高高在上，说明是阴气盛，阳气势单。剥义为剥落，本指果木凋谢说的，植物有荣枯，朝代、企业有盛衰，这是物理人事的必然现象。植物的荣枯是由阴阳二气消长变化而定的，朝代企业的盛衰，则是以人事等管理为转移。但自然界是一成不变的，春生秋枯。人事则不同，国家企业盛衰，则系于人员调动、选拔、安排，不似天之自然规律的固定性，如管理得当，使衰败现象无由形成，至少可使其迟缓出现，本卦以五阴剥一阳，上九以一阳仅存，要使由剥而复，就要讲处剥之道。按剥卦是坤下艮上，复卦是震下坤上。

处剥之道。“象曰 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唐·李鼎祚注曰：“山附于地，谓高附于卑，贵附于贱……君子当厚锡（同赐）于下，贤当卑降于愚，然后得安其居。”（《李氏易

传·剥卦》) 剥卦卦体是下坤上艮。坤为地，艮为山，不说山在地上，而说山附于地，这是说经过长时期风雨浸蚀山崩土裂而附于地面，是剥落之象。上指统治者、领导者，从此象应悟出在人事方面，即应宽厚对待下属。居上位有贤德的人，不应自满，应谦虚的向地位卑下的属下征求意见，才能取得长治久安的发展，有利于国家或企业的长远利益。

三 从乾坤屯三卦阐发出给领导者的启示

乾坤是天地万物之始，所以《乾卦》：“彖曰 大哉乾元 万物资始 乃统天。”《坤卦》“彖曰 至哉坤元 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说卦》说：“乾 健也”，天体是静止的，但天上的日月星辰及寒来暑往是变化不息的。上经乾卦是取自强不息之义，卦旨是示人以创业之道，要像天之运行不息的自强，本卦的主要意思教人效法天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彖曰 至哉坤元”是说至矣哉坤之元德 地体厚大 因之生养万物，与天之无疆相配合，所以说乾坤是“万物资始”“万物资生”。既然有了万物 管理的需求也就随之而来。按“乾”健 除自强不息之义外 还示人以国家与企业的创业之道，要使国家与企业的领导，和人民大众及被领导的企业人员所应遵循的自强精神。

乾坤是天地之始，乾坤二卦之后的是屯卦。屯卦的象辞是这样说的：“云雷屯，君子以经纶。”按屯卦是䷂ 下坎上。朱熹注：“坎不言水而言云者 未通之意。经纶治丝之事，经引之，纶理之。”屯义为难。是说一个事业，在初创的时候，正如宇宙开阔之初，一片洪荒世界，像乱丝一样。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或企业管理者，管理好事业，如同治理乱丝似的。因为创业之始，要由无序成为有序，才能很好的向前发展。“君子以经纶”是说管理者（君子）缔造他的大业，如同在云

雷屯时的处境，屯义是困难，一个有作为的管理者，应从困难环境中冲击去，建立其大业。

屯卦象辞所说：犹如云雷交临的象征，管理者处在此情况下，要善于规划好谋略。水气屯于天为云，云化而为雨，才起大旱之后普降甘霖的作用。当阴云蔽天，即企业万事待举之时，企业家应像雷似的，去摧促云化为雨，使万物蓬勃发展，使事业生机焕发。

本卦象辞与彖辞，所取卦象意义相通，全是雷雨交临，天地晦冥的情况，但含有新生之机，又似创业之始成败未卜，前途又有险象。“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按这几句话是说：“刚柔始交”就遇到险阻艰难，“雷雨之乱满盈”是出现了希望，有了雷摧雨降，下了充足的雨量，使万物欣欣向荣，蓬勃的生气，出现在大地上，即是亨通。一个国家或企业创业的阶段，当时所处的环境，正像未开辟的草莱，到处是荆棘，又值天亮前的黑暗，事业前途上多是险阻艰难，克服前进道路之障碍大为不易，必须搞好人际关系，协力同心，才能脱离险境，进入坦途。

屯卦的屯字虽为难，在卦辞屯字后面，却是：元、恒、利、贞。象辞并且肯定的说是“大贞亨”，两者之意全是鼓励人们不要畏惧危难。本卦六爻所说的：“虽磐桓”“屯如遭”，“往咎”，“往吉”，“小贞吉”，“大贞凶”都是对患难处理的指示。

屯义是难，本卦六爻辞也说难，其中还有一层涵义，宋、洪迈说：“乾坤二卦之下，继之以屯、蒙、需、讼、师、比六者皆有坎，圣人防患备险之意深矣。”（《容斋五笔·三》）坎是水，六卦中有坎（水）是险阻艰难之象。从屯卦

来说是给国家及企业领导人的启示，是要将郁结未能发展的处境，加以整顿，如治乱丝一样，理出前进发展之道，在艰难环境中冲出去，要力挽狂澜，从困境中拼搏出去，这就符合屯卦的精神。

《易经》共六十四卦，包罗万象，其中哲理性启发都是管理者、领导者需要参考领会的。《易经》之研究，被人们称为易学的研究，此至为恰当，易学是浩瀚学识之总结，又经过六千年来千万人的丰富的发展，在哲理指导性上是最高层次的，对任何事物都有指导意义。

3. 易与亚洲管理哲学

管理是人类生产活动的必有产物，从原始社会的时候起，有原始人群的生产活动就有了管理，一个人要完成人生目标就离不开管理。哲学是对人生经营所作的反省，管理也是人生经验的一部分，所以对管理经济所作的反省，就是管理哲学。

企业经营者，如果只是为了发财致富，或只是以获得营利为目的，那不是企业家。企业家应有崇高的目标，在经营上要能创新，以新的观念创造出合理的利润来分享给顾客，造福社会。为国家和民族作出贡献，这就要有哲学素养，所以企业家应具备的主要条件之一，即是哲学素养。

亚洲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能在战后废墟上，经过二十多年，使经济增长出现了奇迹，成为经济大国，日本东京也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就在于日本企业家运用了管理哲学。日本的管理哲学，也成为欧美各国争相研究的对象。在日本大企业中，以松下幸之助所创建的松下电器公司，具有亚洲管理哲学的浓厚色彩，步在日本这个亚洲

经济大国之后的，还有亚洲新兴的四个工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上也创出奇迹，是同属亚洲管理哲学的范畴。本文只讨论最具有代表性的日本松下电器公司的管理哲学。松下幸之助在日本被誉为“经营之神”。全世界最大的工业公司中，松下公司在 1986 年排在第二十位，到 87 年上升到第十五位，在日本仅次于丰田。他的事业成功，与其理想及言行多蕴含着儒家哲学的成分分不开，细加检视，他的管理哲学乃渊源于儒家经典之首的《周易》。他的企业经营理念是把握宇宙的道理和社会的法则，从管理哲学中发挥了无形资产的作用，他的成功给全世界提供了完整的中国儒家管理哲学思想，在亚洲后起的四个先进开发国家和地区，全受其影响，同属于亚洲管理哲学范围。

正如美国赫德逊研究所创办人何门康 Herman Kahn 所说，他认为儒家伦理思想对东方经济与社会发展，可能正像基督新教的伦理思想之于西方经济与社会发展，有着同样的重要性和划时代的意义。何门康氏又说：靠勤俭、耐劳、进取的儒家精神，才缔造出高效果的经济的发展。

松下幸之助在国际间享有盛誉，在亚洲是第一人。他不单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家，而且还在立言方面有突出的贡献，著书有数十种，其早期著作有：《大家来想》、《事物的想法与看法》以及《实践经营哲学》。最近（八十年代）出版了《松下幸之助经营管理全集》二十五卷，其中有二十一卷是松下本人之著作，有二卷是松下与他人的对话记录，另外二卷是各国学者专家分析松下选用人材成功的因素，并附有松下与索尼公司总经理盛田昭夫的对谈。《全集》已在港台译成中文出版。

亚洲管理哲学常使西方人有奥秘的感觉，尤其是引用到

《周易》更增加了神秘化色彩。《周易》一书自汉朝以来为人所夸张，又经过纬书的曲解，被人目为是儒学经籍中最诡异之书了，但经历代学者研究，大都公认《周易》是中国古代重要思想的总根源。

松下在企业经营上的巨大成功，引得人们常常问他：“到底您的经营秘诀是什么？”松下说：“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并没有什么秘诀，我经营的唯一方法是经常顺应自然法则去做事。又说：人类无限生成发展是宇宙自然的法则。因此顺应自然的法则所进行的做事方法，乃是适应生成发展的必然的趋势。倘使人类以其微小的聪明才智去思考问题，依照自己所想的庸浅方法去处理事务，违背了天地自然的道理，其失败与挫折乃是意料中的事。因此人类虽然应该运用智慧的能事，但仍然须要遵照超越人类智慧的伟大天地自然法则与道理去经营，才是获得成功的确切保证。”①文意深入浅出，说出了高深的道理。松下所说的超越人类智慧的伟大天地自然法则与道理，在其所著的《实践经营哲学》的编译者注中有如下的说明：“易经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以太极为宇宙之源，立此以统阴阳两仪。太极生两仪，于是有天地之分，男女之别，昼夜相后，寒暑相推。两仪生四象，而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循环。四象生八卦，于是有水、火、风、雷、山、泽等基本现象之认识。重八卦为六十四卦，而宇宙间各种事务之变化表现无遗。宇宙不断的演化。它的性格生生不绝。故易经曰：‘生生之谓易’。而‘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就是宇宙生成发展之道理。”又在另一注中说：“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①松下幸之助著《实践经营哲学》周君铨译，第35至37页。

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因为乾是天 其所代表之意义为健。乾卦六爻全是阳，故其象为天，其德刚，其行健。天道有常，寒来暑往，运行不息，故能成其刚健。君子效法天地，故当自强不息也。以此比喻我们做人处事要依照自然法则和顺应天道，……”君子效法天地，就是管理哲学的无形资产之一。按“生生之谓易”见《周易·系辞上》。“天地之大德曰生”见《系辞下》。上引松下书中周君铨所注的两句，所说太简略，又不深入，没有能够释明《周易》与亚洲管理哲学关系，现在从历代研究《周易》的诸家注疏中汇集以说明之。

松下在前引书中的《事事谋求生成发展》一章中说：“大自然及宇宙是由无限的过去到无限的将来连续生成发展所进化而来。在这个无限历程当中，我们也相信人类社会的共同生活。无论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也将无限的继续不断地发展下去。”^①松下也提到地球上资源枯竭的问题。这个问题曾引起世界各国的纷纷议论或探讨。“也许再过几十年地球上的资源就会耗竭殆尽。那时候人类将变成怎样？是否就无从生存下去？当前怀有这种悲观想法的人未尝没有。但是我对这个问题基本上的看法并不以为然。世界各种的资源的确有一定限度。在人类继续使用资源期间，资源总有可能枯竭的一天。但是人类的聪明智慧终将发现或找出可代用的物质来，这是必然的。证诸世界历史。人类就是这样进化而来的。”^②就以人类所用的能源物质来说，最初是用木料，后来才用煤，再后是用石油。现在用铀为核发电的原料。到不

同上引书第 14 页。

同上引书第 15 页。

了二十一世纪之末，世界上的产油区所储藏的石油就枯竭了。但已有相当多的办法，来解决石油资源枯竭的问题。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用水代汽油为燃料，初步已经成功了。菲律宾人丹尼尔丁格尔，经十四年研究发明了用水代替汽油，只先用汽油将汽车发动机发动起来，就可以用水为燃料驱动汽车前进。事事谋求生成展是符合《周易》“生生之谓易”的。

在《周易本义》中宋朝朱熹注：“阴生阳 阳生阴 其变无穷，易之理如是，故其书亦如是。”清朝陈梦雷之《周易浅述》也照引朱熹之注。阴阳自古以来解释为万物化生之基本因素。至于阴生阳、阳生阴是形而上学的抽象化，我们在此先不用管它 其中最主要的一句 就是“其变无穷”。人类所利用的能源 正是“其变无穷”的最好说明。如已经使用的如木、煤、石油、核原料（铀），还有正在发展中的太阳能，风力 地热 海潮等等。陈梦雷说：“易变易也 天下有可变之理，后人能变之道……文王示人以可变之几，则危可安，乱可治，特一转移间尔。”^①《周易》之易，其主要之义就是变易。松下根据这个“其变无穷”说：“假如世界资源再过几十年会被使用枯竭时，人类的生活一定终会造成困窘，届时我们的企业经营非设法谋求适应不可了。”又说性成发展的原则，在大自然宇宙及人类社会当中运行不息，我们的企业就在这种运行不息之中从事经营。”^②这两段话把“生生之谓易”的哲理用活了。为了进一步阐明其涵义。再将另一注释引出来。“荀爽曰：阴阳相易转相生也。疏：阴极生阳，阳

陈梦雷著《周易浅述》卷八。

②松下前引书 15页及 14页。

极生阴，一消一息，转易相生，故谓之易。……阳入阴，阴入阳，二气交互不停，故曰生生之谓易。”^①注疏所说，简单讲来阴阳二气交互万物就化生。《史记·太史公自序》：“易（经）著天地四时阴阳之行，故长于变。”再引《周易》进一步来说明：“天地变化，草木蕃。”（《周易·上经坤·文言》）也就是说生生不停运行不息之理，松下把《周易》哲理能用于企业经营上了。

松下经营其企业发展的经过，完全符合“天下有可变之理，人有能变之道。”下面即把他的经历列举出来：
1904—1905 年在大阪火盆店的铺子里，既是学徒，又是保姆，三个月后转到五代脚踏车店当学徒，当了六年学徒，因为他勤奋有为，得到赏识，学到了经商之道。1910 年，转入大阪电灯公司作见习工。到了 1917 年开始了他的“能变之道”，辞去大阪电灯公司职务，他创造了电灯插肖座，而且自己去向电器批发商请教，学习掌握产品市场行情，他不仅能创新产品，而且学会了推销。第二年就创建松下电气具制作所。至 1928 年，他的制作所制造了脚踏车上用的电池式电灯。推向市场销售，取得了畅销成果。1925 年，其制作所的电灯装配工厂成立。从 1927 年到 1929 年其制作所又成立电热器制造厂。开始销售电炉。他从制作电灯插肖座到电炉问世，真是历尽了能变之事。他不只从生产方面变，也在变上求发展。在 1935 年，电器制作所改组为公司组织。到了日本侵华战争开始的第二年，他不露形迹的，从民用工业转向与军用工业有关方面发展。创立了电动机公司。不久，到 1940 年日本政府就公布了电力国策纲要，松下抓住了一

个可变的机会。军事用品订单就源源不断而来了。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他再变，创设了松下造船及飞机制造厂，这是在 1943 年。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日本全国几乎都成了废墟。松下的企业也受到严重摧毁。松下面临到了绝望的境地 而他却从《周易》中汲取了动力 就是：“文王示人以可变之几，则危可安，乱可治。”当时日本社会经济一片混乱，黑市盛行。全国陷入贫穷的环境中。他知道他的企业由危而安，须要举出个标志旗号来，使能符合战胜国与战败国人民的心愿。于是在 1947 年由他倡组成立了 P.H.P 研究所，(Peace and Happiness through prosperity) 意为通过繁荣，以达成人类的和平与幸福。

研究所的成立，是个巨变。他从中得到了超出“危可安，乱可治”的范围，从国际上也捞到了莫大的经营益处。到 1950 年，美国驻日占领军总部下令解除了松下财阀的整肃令，给他的企业恢复开了绿灯。

松下把“危可安”贯彻在经营理念上。日本由于战败 所有企业都陷入了绝境，可是他从儒家哲学宝库——《周易》中认识到“危”和“安”、“乱”和“治”是正反的两个方面。关于在危中求安 他说了如下的话：“战争结束以后，日本对海外市场的开拓，增加了许多机会。当时我们对于海外的基本经营策略，与国内经营策略并无二致，仅在具体的经营方针上，与执行方法的运用上，尽量去适应当地国家的个别需要。此外也考虑到能为各国政府及人民所接受。”^①日本国内的企业危机主要是战败后日本人民是穷困而缺乏购买力，他将市场战略转向国外市场去开拓。他在 1951 年去

美国考察，美国是战胜国，美国人民在战争期间积存了很多储蓄，购买力是强的，所以亲自去探路，寻求买主。

为了从危中求安，进一步长期巩固下去，他看准了有巨大发展前途的电视机，在 1952 年，同荷兰菲立蒲公司订立合作生产电视机的合同。因为日本工人工资低，工人工作时又比欧美长，故此产品价格低，能在欧美打开市场的销路。第二年又在产品种类上 变中创新 尽了“能变之道”，开发了电冰箱制造，市场推销顺利。同年去欧美考察，亲自了解欧美市场的需求，并吸取欧美先进技术，来改进提高它的产品质量 这也是他“能变之道”。

松下掌握的可变之理与能变之道，不只表现在不断推出新产品，而且在企业组织上也在变。1956 年他把事业部改变为新事业部。新的含义就是去旧更新，亦即“易，的变易也。”变易在其企业中的应用，是符合其企业经营之利益的，也有助于其企业长远之发展。

松下在日本战败后，其企业所受毁坏的程度，达到破灭的边缘。他本人又被驻日占领军列为整肃的日本财阀之一。但他能将儒家经典《周易》的哲理应用在经营管理上，再加上他刻苦耐劳，也是其企业复兴的原动力，正如《周易·困卦》的彖辞所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彖辞中说：“君子以致命遂志。”他对《周易》这两句话有深刻的体会 他说：“人类的社会不可能走到尽头。几百万年来，人类一直继续生存及进步到今天，绝对永无止境，因此，我相信今后仍然会如此，尽管会遭遇许多困难，但最后必能找到相应的对策，这虽然不容易，但为了适应动荡时代，经营者至少在基本上需要这

种信念。”^① 所以他能从困境中摆脱出来。

松下说：“人类依照自然法则与生成发展进行共同的生活。”^② 这几句话是从《周易》几个卦和各卦的注疏体会而得的。他深入浅出的总括为超越人类智慧的自然法则。

为了探源索隐，我从《周易》中钩索出原句并加以说明。先将原文列举在下面：

《周易·系辞》：“天地之大德曰生。”孔颖达注：“言天地之盛德，常生万物而不有，是其大德。”又崔憬注：“后人行易之道，当须法天地之大德。”

《周易·益卦》：“曰：……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周易·姤卦》：“天地相遇，品物咸章。”

《周易·咸卦》：“天地感而万物化生。”

《周易·恒卦》：“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

《周易·同人卦》：“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

《周易·泰卦》：“天地交而万物通。”

我认为松下将“天地之大德曰生。”必定心领神会用于企业经营管理上，首先是因为他独具慧眼，明确认识到企业是社会的公器，不能只为发展自己的企业，过份的竞争，竞争一旦激烈起来，就会发生冲突，冲突结局，就会导致一方失败，另一方力尽精疲，或两败俱伤。这是一种短视作风，其害处是大的，所以松下认为竞争不可过份。“行易之道，当须法天地之大德。”大德也就是求生存而不只是独家企业生存。宇宙的自然法则就是“天施地生”。企业经营应照顾到整个

松下幸之助《经营管理全集·金字招牌生意经》。

同注一引书第21页。

国民经济的利益。社会法则可从《周易》中的“天地感而万物化生”来阐明。因为企业经营运转必与许多有关系的方面有接触与往来，如原材料的购买，产品的经销，以及资金周转等许多关系方面。松下的经营管理，领悟到《姤卦》之“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运用到企业经营，方是“通天下之志”，而使“品物咸章”，使各方表显于世。天下之志也就是宇宙法则。“通天下之志”是说企业应从发展中求长期共存。而不搞独家垄断。在《恒卦》中有言：“日月得天而能久照。”没有宇宙的存在，日月怎能久照呢？这是松下所遵循的，他说：“无限发展进行共同的生活。”他又说：“人类依循自然生成发展的原则，对于本身及万物共同生存，具有永恒无限发展之权利与责任。因此人类应该具有正确的人生观，每一个经营事业的个体更应该具有其自觉性。进而建立坚强的信念，这样才能使企业经营生成发展下去。”^①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高速度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的三十年内成为经济大国，又是头号贷款提供国，并且有巨额贸易顺差，海外投资有一百亿美元。松下在日本经济发展中所起作用突出的，具有代表性，如松下企业的营业额，从战后至八十年代初增加了四千倍以上。在日本财团中松下是最受尊重的一个，因为只有他是一代人创建起来的；在世界最大工业公司的五十家中名列第十五位。这是美国幸福杂志公布的1986年名次。

西方对亚洲管理哲学认识是不够的，根据美国帕斯卡尔和阿索斯的调查分析以下几个原因：“明确承认占有市场份额的重要性。只要产量提高能使成本有所降低，就将其收益通

同上引书第二十三页。

过降价转给顾客。……通过创造上积累的经验得到节约和降低价格的手段。建立起防止竞争者打进市场的壁垒。……从一开始，松下就不想当技术先驱者，而是强调质量和价格。……在市场上立足于它的式样。质量和价格，使它成为当时在同类产品中最畅销的产品，松下在其组织结构的革新方面总是处于领先优势。……松下公司认为划分产品部是可以使业务规模变小和易于经营管理的一种方法。……每个产品部都能自由的活动，就像每条船有它自己的船身一样。这样产品部经理们的积极性就被激发起来。他们的目光敏锐地盯着市场 就像船长盯着天气一样。”

“松下划分产品形成了分权制，他意识到这种分权制有内在的缺点。并趋向于摆脱总公司的控制。同时，也难于使各产品部之间的合作。松下通过对四个关键性能的集中化来平衡朝向分权的推动力。首先他任命了一批直接向总公司汇报工作的主计长，建立一个全面集中的会计制度。第二，设立一个公司的银行，各产品利润必须交银行，需要资金时可向银行贷款。第三，集中人事权。认为这是关键性资源。第四，对培训工作集中管理。”^① 以上是两位美国管理学专家对松下企业经营所作的调查，并赞扬了其优点。

美国管理学专家分析了松下经营管理优点，但并未触及到其核心实质，也就是未提到他的经营管理精髓。松下经营理念，乃是亚洲管理哲学，而亚洲管理哲学以《周易》为中心。松下在其所著的《实践经营哲学》中，深入浅出的阐发了《周易》哲理在管理上的运用，是书译者注明其渊源于

^①理查德·帕斯卡尔等著《日本企业管理艺术》第13至14页。杨道南等译。

《周易》。他从《周易》中学到经营理念 是他取得辉煌成就的主因。

4. 乾卦六龙的管理思想

《易·乾卦》：“彖曰 大明终始 六位时成 时乘六龙以御天。”这几句大意是，它是宇宙光明的开始和终结的根源，它包含六个爻位的程序，形成宇宙时间的作用，犹如六条龙一样，联续不休地驾御天体运行的规律。其另一层意思是：圣人立六爻是以通顺了乾的情，乘六龙是行乾之道。

经卦的乾☰是取天之象，意为天人合一思想，别卦的乾☰是取其自强不息之义，所以《说卦》说：“乾，健也”，本卦的卦旨在示人以国家与企业的创业之道，要遵循八卦中乾卦的“安人”概念 是与国家领导与企业领导的日常工作有重要的关系，因为安与危是相对的，古人曾说：“人有理则安，无理则危。”①要使企业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上下相安，才能使企业蒸蒸日上。“安人”就是搞好人的修养。

《周易·乾卦》第一句是“元、亨、利、贞。”元为始生万物，无偏私、泛爱及于群众，这是天的元德。一个国家领导人、企业领导者，要体现天的“元”以达到仁者爱人，则身为国家领导及企业领导就当之无愧。元居于众美德的首位，所以古人说：“元者善之长也。”

“亨”为万物生存繁荣茂盛之意，可以称作亨通，亨通能使诸物合聚，吸引住众多的人。一个国家或企业的领导者应体现天的“亨”德，待人接物，周旋于众人之间，都能洽到好处，没有迟滞的地方，也就是礼貌的周全。

“利”指天地阴阳相合，从而使万物生长，各得其宜。这就是天的“利”德，一个国家或企业领导者能体现天之“利”德，以利物之心与人相合而不争，就是以处事得到相宜，而且还合乎义理。

“贞”是天地阴阳相合而且吉正不偏向。作到这一点，则万事万物，能够正直，凝结而长久，不会使单位出现散沙情况。要作到“修己以安人。”^①就能体现天的“贞”德，信守正道，绝不受不良影响，正已然后正人，这样就没有事作不到的，足以办好万事。

有了这四德，即“乾：元、亨、利、贞”。是可以简括为仁、礼、义、事。行仁能得众，行礼能联合群众，行义能利众人，行事能将事办的上了正轨。这四者作好了，即合乎乾卦，元、亨、利、贞的四德。这四点可以概括为两项，即管理职能的领导与用人。

以上是乾卦卦辞的解释。乾卦设六龙为象，也就是乾卦六爻皆龙为象。

“初九，潜龙勿用。”按初九是指乾卦第一爻，爻位在下。潜龙一词，先解释一下龙，龙在我国文化中的迹踪是源远流长的。河南濮阳发现“华夏第一龙”。濮阳西水坡遗址中，发现有蚌壳塑的龙体等，断定它是一处距今六千多年的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古史传说远在伏羲时代，只存在于万物有灵论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的一种虚拟的神物。虽然传说中龙在我国古代是一种想像的神奇动物，在自然界并不存在。中国人心目中却一直活灵活现，栩栩如生，龙在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和文化的象征。

在原始社会时代有万物有灵论的意识，在我国根据古代历史资料上的记载，远在伏牺传说时代，就有以龙为标记和以龙为官名的，如龙师。中国文化的龙可以三栖：空中、水中、地上，并可以表示为天，即适应于抽象的天，因为它变化莫测、隐现无常，所以乾卦的初爻就以乾龙作表示。

周易八卦与六十四卦，乃至三百八十四爻的变化，都表示天地万物与社会人事中变化不定的道理，龙所表示的变化莫测、隐现无常正合《周易》之“变动不居”的哲理。

“象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是说龙所反映乾阳之变化，在初爻之时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它的能力还没有显现出来，也不要显现出来。初九是企业发展的起步，或者一个企业领导者，当他接管一个营业不振的企业之时，虽胸怀大志，心有成竹，但羽毛未丰，须有含蓄的功夫。即解决问题，处理问题时，并不用所掌握企业领导者手中的权说话，也不只用一般的估计和推理。而是“藏诸用”（《易·系辞上》）用调查研究，对问题做由表及里的深入细致的分析，定出周密而切合实际的可行方案。潜龙勿用中之“勿用”二字含乃用之意，然后可期于大成。所以本爻的用意有两个方面，以积极方面讲是教我们在创业或改进企业时，要深沉含蓄；在消极方面防范企业发展中阻力之害，汤遂球在他所著《周易爻物当名》中说：“初故潜，潜故勿用，传曰：藏诸用，勿用乃用。”这是说“初”本是潜；“潜”本是勿用，是把力量含蓄不发，则达到了勿用乃用之境了。按“勿”包含有不可用、不能用和不必用之意。即是说时机未到，不可逞能，要“藏诸用”等待时机来临。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晋·王弼注曰：“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周易注》）如诸葛

亮隐居时，他躬耕陇亩，有人同意他自比有管仲乐毅的才干。当刘备要谋求他多年来没有机会扩充势力，又无固定地盘的情况，他依附曹操，又投奔刘表，表恶其能，不敢重用他，四处奔命，十分狼狈。刘备与诸葛亮二人，一处于有“出潜”之要求，一处于离隐之机会。当刘备为曹兵所破之后，因与刘表有同宗的关系，所以到荆州投奔刘表，刘曾访士于司马徽，徽对刘备说“你所说的人都是儒生俗士”，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卧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三国志·蜀书》）及《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按卧龙与凤雏是比喻奇才，但尚未发展其才能。

刘备要摆脱困境，是求“出潜”，诸葛亮也遇到离隐的机遇。刘备所尊重的徐庶，也推荐诸葛亮，并说此人不可召见，“将军宜枉驾顾之”。刘备冒着严寒时节，亲自带着关羽张飞到隆中，去了三次才见到，就是有名的三顾茅芦。一席隆中策，分析了几个割据称雄的人，河北袁绍、淮南袁术都已失败，曹操孙权都不可轻视，覬伺不得。就只有荆州的刘表父子，和益州（蜀）的刘璋，比较容易对付，劝刘备将这两地盘夺过来，这就是定下了三分天下的大计。

此爻“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可引伸到，由于诸葛亮离隐，帮助刘备逐步扭转了大局，博望坡一战，把曹操的十万人以火攻打败，又使巧计，火烧新野，在危急时刻，联吴抗曹，火烧赤壁，大败曹兵，终于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疏：“郑注：六爻位象三才，三为内卦之终（顶之意）而有参天地之功，故五爻皆以龙兴，而九三独称君子。”（《周易集解纂疏》李道平）本卦下乾三爻是事业的基础，上乾三爻是事业的大

成，而事业大成。完全在基础良好，正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三居于下卦之顶峰，所象征是国家建立与企业创始时的小有成就的阶段。

晋王弼对此爻是这样说的“(九三)处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在不中之位，履重刚之险，上不在天，未可以安其尊也；下不在田，未可以宁其居也。纯修下道，则居上之德废，纯修上道，则处下之礼旷，故终日乾乾，至于夕惕，犹若厉也。居上不骄，在下不忧，因时而惕，不失其几，虽危而劳，可以无咎。”(《周易注》)①这是说九三处于下乾卦（按六十四卦每卦全由八卦重叠而成，所以每卦都含两个单卦，称为上下体或内外体）二五爻称为中，此为九三爻，所以说在“不中之位”至于“履重刚之险”指九三爻下二爻均为阳爻，成为重刚，因此地位险而难。九三之位既不能“纯修上道，必须慎重对待，因此要终日乾乾，至于夕惕”就是说整天自强不息，以致到了傍晚，一天将要过去，仍然小心翼翼（惕）的。

九三说的是人事道理，所以不以龙为比喻，而用君子为代表，君子在今日比喻为国家或企业的领导，居这个爻位不要因事业小有成就，忘其所以，甚至得意忘形，这是企业在创业时的大忌，所以在九三爻这个阶段应终日自强不息，到了一天将尽之时，仍小心翼翼，像面临危险是的，如周文王在创业之时：“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书经·无逸》）这是说周文王也曾从事过卑贱的劳作。加修整道路、耕种田地……从早晨到中午至下午，忙碌得无暇吃饭……文王不敢把

各邦国交来的贡赋用在游猎玩乐上。真正作到克制自己的不正当欲望，真是作到了“夕惕若厉”。终于到武王时翦灭大商，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周朝。周公旦以叔父辅年幼的成王为天子，曾对他儿子说：“我是周朝创立者文王的儿子，建立周朝的武王之弟，天下之中我的地位不能算是低下吧！”可是当我洗头时，有人来，我就握头发去接见，当吃饭时曾三次吐出口中之饭，去接见贤士，全是怕失去贤士之心。”同样是夕惕若厉，自强不息。

周文王施行善政，“日昃不暇时”“终日乾乾，夕惕若厉”不单摆脱了羑里之困境，并从纣王那里所赐弓矢斧钺，使西伯有了征伐之权，加速了势力的发展，以上引的古史可作为企业家推动企业发展的借鉴。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四与九三两爻，同居全卦之中，盖九四之位，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这两点与九三相同，而人位则不如九三居于下卦，理与例见下述。本爻之“或”字，是欲进未定之辞，“或跃”犹“在渊”也，当局势有变动之时，欲进未定。所以有在渊之象。

九四以阳居阴位（四是阴），阳志于进，阴是对进不果断，本爻是表示欲进不定，犹豫难决，这种情况，举个国际间的斗争，企业领导者如何在决策上从下面所举史实与实际工作对照，藉以借鉴，达到古为今用，用在管理上来。如三国时赤壁之战前夕，曹操大败刘备，又乘荆州牧刘表死亡，其子刘琮又投降曹操，在的大好时机下，曹给孙权送一恐吓信：“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余万，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这封信首先吓坏了孙权的部下谋臣，张昭等首先发言，主张投降曹操，其理由是曹操不只是挟天子令诸侯，而且长江天险已经是双方共有，曹军势众有

压倒之势，投降派占了上风，鲁肃在会上没有发言，乘孙权离座更衣时，追到屋檐下，权知其意，执着鲁肃手问道：卿要说什么？鲁肃说：刚才众人所说的话全是耽误将军，这些人成不了大事。我鲁肃可以投降曹操，孙将军你不能，为什么呢？因为肃降操，操在最低限度上还可以委任为小小的科长，大可以升到州郡之官长，将军迎操，曹操拿什么职位给你？你的出路是什么？将军应早定大计，切勿犹豫。孙权就是正处在“在渊之象”。也是“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用易理的天人之学来说，天地两才不具备，而人位又不如九三，即孙权不如鲁肃。孙权还不能决，召回周瑜，周瑜给他分析了双方的条件，周瑜说：“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北土未平，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而操舍鞍马，仗舟楫……今又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之众，远涉江湖，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擒曹，宜在今日。”（《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是夜，瑜复见权曰：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怀恐懼，不复料其虚实，便开此议，（指降曹）甚无谓也。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尔。尚怀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愿将军勿虑！”（同上引书）孙权所处情势，正如本爻九四，他考虑了成败因果，然后行动，作了决定。他向小成的界限迈出，向大的成就跨跃。本爻“或跃在渊”可以用《左传·昭四年》：“或多难以固其国，或无难以丧其国”来说明，孙权从困境中巩固邦基，而有发展，如在渊中跃出，而得到无咎的

结果，那就是历史上脍炙人口的赤壁之战，大败了曹军，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多难兴邦，企业的困境如何扭转，从乾卦九四的易理，可以提高我们的能力，证以孙权从困难中突破，巩固了邦基，并有大的发展，就是很好的史实榜样。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本爻是说国家或企业领导者处于最佳的情况。因九是阳爻之名，“六爻皆天德，而五乃天位。天德之得位者，唯有是德。”（《周易浅述》）什么是天德？就是乾道，并且六画皆奇，奇又是阳之数，所以是纯阳，纯阳就是至健，因此说：“九五刚健中正”，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有成就的企业家，应是善于体会“乾道”的，乾是刚而能柔，谦卑逊顺。如周武王克商之后，下访商朝遗老，足见其虚怀若谷，箕子回答武王，陈述治国之大法。正是“五在天位，故曰飞龙。此武王克殷（商）之爻也。”（《周易集解纂疏》李道平）

公元前一二五四年，殷（商）武丁，即商宗，举傅说于版筑之间，任以为相，傅说曾隐居，代胥靡刑人筑道，武丁任用他，使殷国大治。^①在武丁统治的五十多年间，可说是殷朝最强盛时期，所以司马迁说：“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同上注）《诗经》中的五篇商颂：其中《玄鸟》《殷武》都是称颂武丁的，关于武丁治国的伟大业绩，《诗经·玄鸟》等及《孟子》都有记载，这与武丁柔逊自谦有关，又有识贤的能力，可以说武丁在君位有君德，是以人民有利见大人之喜。

我认为“利见大人”就是武王见箕子和武丁见傅说这样的贤者，也就是尊重人才发现人才。虽然历史发展上的不同阶

级社会都有各自其根本利益的需要，虽然有不同的界说，但皆有相同之一点，即是凡有志于建功创业的杰出领导者，都为了它的事业或企业的发展，无不用贤、敬贤，因此谦卑柔逊，商武丁得傅说，文王与武王得吕望（即姜子牙）都是得到贤人，因而一个使国家大治，一个创建了周朝。

《吕氏春秋·期贤》：“凡国不徒安，名不徒显，必得贤士”。《求人》篇云：“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可见“利见大人”之用多么大。吕不韦在《先识览》中说：“贤主得贤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又在《赞能》篇中进一步加以说明：“贤者责人以仁，（原文贵字作善，今从许维通改）中人（任人）以事，不肖者任人以财，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贤人……文王得吕望而服殷商。”以上是说商朝周朝得贤兴邦之例，可以为本文作为说明的，到了春秋战国社会大动荡历史时期，“利见大人”用贤的实例更是多的很。

春秋时期，因齐国在经济文化上都比他为先进，具备了首先称霸的条件，主要还是齐桓公不记私仇，将在争夺宝座时险些射死了他的管仲，任用为相，把国政托付给他，并称他为仲父。齐桓公对管仲及他所推荐的人，真是作到知而用之，用而任之，任而信之，不猜不忌。韩非曾以其合作者比做衣服，来比喻君臣合作无间，“管仲善制割，宾胥善制缝，隰朋善纯缘，一衣成君举而服之。”^①这个比喻说明齐桓公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王。正是“圣功既就，万物既覩，故曰：利见大人矣。”（李道平前引书）

“上九 亢龙有悔。”以六爻的爻位来说，上是最上的一爻，上九是位到最高处，再上进就无位置了。又无法下降。因此说“亢龙有悔”悔的涵义是错误。从《易经》中阴阳之理来说，位到极处必变，阳极则生阴，阴极则生阳，这是消长盈虚一定之理数。

王肃注云：“亢者 穷高也。”穷高是位到极处。本来九五之尊就是高的顶峰，过了这个顶峰，则是上九，到了上九就是亢，穷高就是高而过份，太贵了，因此下面的人难于亲近，免不了凭籍财势，刚愎自用。如石油国际垄断组织——石油十姊妹，在操纵世界石油方面，它是处于穷高之位。不久欧佩克一出现，石油十姊妹的威风一落千丈，这就是物极必反，乐极生悲。由石油十姊妹过去的独霸过份产生了悔，大错已铸成，利润损失的祸害，也随之而至。郑玄解释“悔”字，义为小疵，是有理由的，因为乾含有刚强之义，不愿对乾之刚强有所贬低，所以不用吉凶二字，而只说“悔”，所以国家领导人，企业的领导者，应当以此爻吸取教训，领导者地位越高，在德行方面应表现得越谦恭。

《文言》：“上九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这是孔子根据上九的爻辞，说居于高位的领导者容易犯错的通病而告诫说的。登上过份高位的龙是会产生悔的，为什么呢？因为“贵而无位”。荀爽曰：“在上故贵，失正故无位。”失去正当上进的位，就是无位。“高而无民”是说他地位太高了，远脱离下面的群众。九家易解释说如太上皇，难有亲上面的人。至于“贤人在下位”，是指两阳，即九三与九二，比为贤人。“无辅”即得不到辅助，所以一动就有悔了。

要想求得贵而有位，高而有民，并得到下面的贤人为

铺。就是要作到屈己尊贤，或待贤如师。如唐朝的狄仁杰受到武则天的优礼，把狄仁杰从豫州刺史调到京师，升为宰相。一天武则天对狄仁杰说：你在豫州之时，治理有方，名声很好，但有人说你坏话，你想知道这些人吗？狄仁杰说：如果陛下认为我有过错，我当改正，如果陛下知道我的过失，这是我的幸运，至于谁在说我的坏话，我是不想知道的。武则天认为狄仁杰量大能容人。在这方面武则天与狄仁杰二人，都作到贵而有位，高而有民，能屈己容人，才能得到下面贤人的辅助。这是武则天执政时期中，文武大臣都愿为之用，也是她作到‘亢不至悔’（《周易浅述》）

美国企业家，石油大王洛克斐勒，他在石油界成就最大，积累了巨大财富。他认识到适当的财富给人以自由，就是本爻所说的亢，也就是穷高，则必产生悔，所以他在慈善事业的捐款数目居美国的首位。他家所经营的美孚公司能历久而不衰。因此就避免了“贵而无位，高而无民”的凶境。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按《易经》占筮之例，凡得阳爻者用九不用七，得阴爻者用六不用八。九六为动爻，七八为不动爻，《易经》占动，故用之。“用，可施行也”（《说文》），南齐·刘瓛说：“总六爻纯阳之义，故日用九。”刘为当世大儒，他的说法为唐代解易的著作所采用。（见《周易集解·上经·乾》）不是今人、台湾学者傅隶朴所说：用九乃爻外附加的意见。

本卦是纯阳卦，六爻俱是阳，九是阳的代名。而用九含有刚健之意，刚健是历代成大功创事业，必须具有的条件，它是创业奋斗的精神。但是国家领导人，企业领导者，如果对待被领导的职工，持刚健的态度，容易表现成态度生硬，则事情会弄僵了。这要深入理解本爻用九的含义。本卦六爻

都是以龙为喻 因六龙即六爻（见《周易浅述》）九三及九四，虽未明言龙，实际仍是以龙为喻的。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长能短。这是《说文》所释。这种古代传说的神奇动物，不只变化多端，还能兴云作雨。因此用九含有两层意，一层是刚健，一层是阳——龙的灵活性。“见”字作表现解，表现是六爻即六龙，而每一爻全含有刚意，也无一不吉，但必要群龙无首时才吉，这是为什么呢？李道平汇集了古人研易的注疏，作了下面的解释：“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宋衷曰：用九六位皆九，故曰见群龙，纯阳则天德也。万物之始，莫能先之，不可为首，先之者凶，随之者吉，故曰无首吉。疏：六爻皆九，故用九，六位皆取象龙，故曰见群龙。乾纯阳为刚，刚为天德……文言曰：乾元用九，天德即乾元也。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万物之始，莫能先之……先则过刚，故凶随 则柔以济。”（《周易集解纂疏·上经·乾》）

按上段大意是说：《易经·乾卦》发扬了自强不息的精神，鼓舞了人们的旺盛精神状态。总而言之，六爻的纯阳，就是天德，但不可为首，因为六位全是九，所以呈现群龙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不要冒失抢先，抢在前面遭人嫉，结局是不好的。“先则过刚 故凶随”即是先则刚 难免进入凶境，应当用柔来调剂。如在日本被称为经营企业之神的松下幸之助，他创建了松下电器公司，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大企业 但他不是以“刚健居人之首”而是以柔逊方式来处理日常诸事，如每当他领着客人参观他的工厂时，随便走到一个工人身旁时，他即对参观者说，他是我们的经理，使这位工人觉得自己工作优异，本企业最高领导者，才这样赏识他，又认为经理一职在不久的将来他是有可能当上的，松下给人认

为他会是众多经理的一员 正符合“见群龙无首 吉”用九的哲理。

本卦是以刚占主要地位，表现在六爻都是刚，并且无一不吉，但是一个国家领导者或企业领导人，不能够只单凭刚健这单方面，想办好全部工作，作为一个聪明的领导，重在用人，不在各方面突出表现自己，使被领导的职工各尽所能，发挥出大家的智慧，共同管理好国家或企业。如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在他执政的二十六年，无论在政治、经济，以及外交等管理方面，均有卓越的贡献。现在只就对“群龙无首、吉”这句易之哲理来说：“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其大夫之族性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裨谿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谿乘车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太叔行之，以应对宾客 是以鲜有败事。”^①

这就是说，子产能发挥出决策层中每个人所长，如子太叔长得秀美，举止温文儒雅，公孙挥对各国情况了解最深，写文章说话又善于措辞，裨谿的谋略多而广，但要到野外才能把谋略想好，在城内就想不出来。子产每有国家大事先向公孙挥了解外国情况，并叫他将要说的话多准备好，然后他同裨谿乘车到野外筹划，将想好的谋略，请冯简子决断，作好决策交子太叔去执行。因为这样，郑国在国际间交涉的事务很少遭到失败。以上是子产的事迹，正好是“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的哲理最恰当的史迹注释。

①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企业员工能尽力而为，发挥每个人所长，是符合“群龙无首吉”的，如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具体工作环境中是没有监督者，而只有助理这个职位，起指导及协助工作，所以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成了建立公司文化的典范。可见“群龙无首”是“吉”的。再举一个例子。日本本田汽车厂是使世界所有汽车厂感到的最可怕的对。它成功秘诀是多的，其中一项是如下所述的：一天，人们吃惊的发现，本田先生在他担任领导期间从不参加董事会的会议。他说：我的权力太大了，如果我参加会议，那会出现什么情况。人家都听我的，不敢发表与我相反的意见。人们首先会说恭维我的话。相反，如果我不在场，领导者们——董事会将会尽力制定一项正确的政策。世界上最成功的汽车领导人，多么巧的合乎“群龙无首吉”的哲理。

5. 可作困境启示的屯卦

《周易》的实践功能，和它的涉世妙用是丰富的。现在仅从屯卦试谈其管理思想。

屯。震下坎上。屯的意是难。宋·洪迈《容斋五笔》中说：“易经乾坤二卦之下，继之以屯、蒙、雷、讼、师、比，六者皆有坎 圣人防患备险之意深矣。”按坎是水 是险阻艰难之象。震为雷。雷为阴阳两气相搏所发出之声音。天由二气所构成，故二气相搏，便是天震。震可有两种解释：《释名》：“震 战也。”孔颖达《五经正义》：“震，动也。”动的力量即行动，感动，主要意是天翻地覆的动之意。

排在乾、坤二卦之后，首先屯卦，在序卦中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万物之始生也。”万物始生的时候，很不顺利，所以

“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在这方面来知德有进一步的解释：“屯者难也，万物始郁结未通，似有险难之意，故其字像（意为草木初生也）穿地，始出未伸也。”（《周易来注》卷二）世上万物与万事创始初生的阶段，多是郁结而滞，伸长不如，就是险难之意。一个企业在初创阶段，或企业经营失利，同是困境。正像宇宙开辟之初，一片洪荒世界，像乱丝一样，企业领导者要将郁结未能发展的处境，加以整顿，如治乱丝一样，理出前进发展之道，从艰难处境中冲出去，现在有不少企业家，力挽狂澜，从企业濒临破产中拼搏出来，全是从企业领导者优良品质作起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就符合屯卦的精神。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屯字还有深入的解释。“乾坤始交，而遇险蹈，故名为屯，以气始交未畅曰屯。”（来知德前引书）又说：“物勾萌未舒曰屯，世多难未泰曰屯。”（同上引书）一个企业开创当未畅达，没舒展开之时，需要打开企业发展的途径。对新创企业前途未卜，或经营失利的，都是未泰。企业和人生一样，有顺就有逆，逆就是难。创业与改善企业不利状况，可以从屯卦取得借鉴，得到启示，因为屯字后面一句是元、亨、利、贞。按元、亨、利、贞，古人所谓四德，是指人的好品质，旧的说法是道德修养。元为始生万物，无偏无私，泛爱众，这是天之德，企业家应体会天德，以仁者之爱去爱人。孔子的仁者爱人，就是要管理者必须爱人，他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论语·阳货》）这在人际关系中最为重要。仁是儒家道德伦理核心，从管理角度来说它是儒学管理思想。郭沫若说“仁”有尊重、平等之意，从这个角度说也是管理思想的精粹。仁字体现在经营上，可举《史

记》一例：齐国的风俗贱视奴婢，而刀闲这个人却喜爱他们，把他们看得很高贵。凶悍，狡猾的奴隶是人们感到不易对付的，唯有刀闲敢于收留，叫他们为他捕鱼、制盐与经商以获利，甚至叫他们坐车骑马与官吏交游来往，因为越来越信任他们，终于利用了奴隶发了大财，家产高达几千黄金。

（《货殖列传》六十九）这个刀闲就是以仁爱用之于管理上的。亨为万物生长繁茂亨通之意，是天地的亨德。企业家也应体会天地亨德，使企业内部每个人都能发挥每个人的长处。利为天地阴阳相合，从而使万物生长各得其宜。这是天地的利德。企业家应以利物之心与人相合而不争。这同孔子思想中的‘和’是一致的，也有管理之意。他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后世的人们将其理解为和谐、团结，也是与原意不悖的。和为贵在俗话说是，和气生财。贞是天地阴阳相合而不偏，正己然后正物。正己就是儒家所提倡的修身，从这点来说是以自我管理为起点，至调和各种人际关系的人事管理，然后逐级放大，‘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虽具备了四德，但处在险阻之境，要有举动，应当谨慎守正，不可轻举妄动，所以说“勿攸往”。这是因为时之未至，不能轻动，时之既至，必须乘时而动。“利建侯”是指企业领导者要选拔人才作为骨干。“人才为事业之灵魂，故物色人才与善用人才实为事业家之首务。人才既属于我，使各尽所长，以治各事，莫妙于施行将将法。”①按穆藕初是二十年代纺织工业家。对于管理学有研究，曾译过泰勒之管理学。将将法也是古代管理著名样板，当西汉刘邦（汉高祖）取得政权后，曾自鸣得意的说...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餮，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史记·高祖本纪》）如果把管理简单分为三个层次，那么高层次的管理者只把中层次管理控制好，自然低层次管理用不着管，就能各尽所能，以治各自份内的事。

屯的意虽为难，但卦辞却附上元、亨、利、贞，是鼓励人不要畏难，具有四德，即可克服险阻。“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贞亨，雷雨之动满盈。”《周易》之物象思维，在解释“刚柔始交而难生”是这样说的：十二月阳始漫长而交于阴，故曰刚柔始交，万物萌芽，生于地中，有寒冰之难，故曰难生，于人事则杂乱无序，整治为有序，才能很好的发展。“君子以经纶”是说企业家缔造或改造大业时，正值阴云满天，有困难之时，像雷震化云为雨，救出干旱，打开或挽救了局面。震字在震卦卦辞是说：“震，亨。”（《周易本义》）即是当停滞郁结不通之时，震能使万物的郁结得到亨通。所以“经纶”二字是指国家及企业的管理。云经过雷震变为雨，泽润万物，这是鼓励人们积极进取。

本卦彖辞和象辞，在卦象意义方面是相通的，全是雷雨交加险阻的情况，实际上其内含有新生之机遇，因为企业创业之始，或为挽救企业从亏损转为盈利，两者成败未卜，故有坎险之象，但只要“动乎险中”振奋起来，就可以克服险阻。所以企业家应本着“君子以经纶”的精神作为启示。正如《古今图书集成》的主编所说：“经纶，治丝之事，君子治世，犹治乱丝，解其纷结。经者，理其绪而分之，犹雷自敛而发；纶者，比其类而合之，犹云自散而聚。屯难之世，人

皆惶惧沮丧 不知正是君子运季业初之际也。’陈萝雷《周易浅述》彖辞说“动乎险中”是断之以大亨 也是鼓励人们不要畏惧艰险，动虽有险，但动则物通而得正，物通即是想出办法 可扭转险境 给企业打开出路 所以“大亨”了。

彖辞的大贞亨后两句：“雷雨之动满盈 天造草昧”，雷震象，雨坎象，雷雨交作，满盈于天地之间，此时必须兢兢业业，以求克服企业发展前途之艰险，唯有这样才能迎来刚柔始交化险为夷的前景。正如雷摧雨降，使万物得到充分的雨量，立即蓬勃的展开生气。“天造草昧”，古人也有解释：“谓阳动在下 造生万物于冥昧之中也。”（《李氏易传》）

屯之大象说：“云雷屯 君子以经纶。”宋朱熹：“经纶，治丝之事。经，引之；纶，理之。”（《周易本义》）按经字作为动词意为治，作为名词，为治道之常则，即整理秩序之义。屯大象这两句是说一个事业的初创，正如宇宙开辟之时，一片洪荒世界，要开辟荆棘草莱，也正像企业初创或企业失利的时候 所以正要“经纶之时也。”（陈萝雷《周易浅述》卷一）

第十三章 《易经》与生态经济

《易经》为儒家六经之首，肇始于原始社会卜筮，后经夏、商、周三个朝代发展演进成为世界首讲天人之学的哲学书。在卜筮辞中除记录占卜以外，还有一部份现实生活经验的总结，其中主要的记有社会的人们有意识与无意识同自然进行交换，也就是讲自然生态与经济活动的关系。《易经》的主要内容是：“易以道阴阳”（《天下篇》）庄子这句话是《易经》的精辞提要，给我们提供了世界上最早接触到生态经济的论断。

《易经》以阴阳为主 就是地与天“自然界是出发点”早期译为“自然界居首位”，这是强调生产与自然的关系。

《易·乾卦》彖：“大哉乾元 万物资始”，“至哉坤元 万物资生”（《易·坤卦》）“乾，天也，（《易经·说卦》），坤也者地也 万物皆致养焉”（同上《说卦》）

阴阳是八卦的根本，是说由阴阳二者结合交感而产生万物，是宇宙间一切现象产生的根本。天是万物资始的，地是万物资生的，这是人类最早认识自然与生产的关系。八卦是：乾（天）、坎（水）、艮（山）、震（雷）、巽（风、木）、离（火）、坤（地）、兑（泽）。《易经》是以八种自然物质作为八卦。乾（天）坤（地）是作为宇宙间一切现象产生的父母，由此而衍生其他六卦作为子女。以八种自然物质作为的八卦，可简括为六项，山可并入地，泽可并入水，全

是环境系统。天是主要的，而地尤其重要，从天与地、人类得到的是自然界的光、热、空气、水分等等。八卦所代表的八种自然物质是生命系统赖以生存和生命流传的所必需的自然条件，也就是生态环境系统，有了这环境系统，才有生态经济可言。如海洋是生命摇篮，在辽阔的海洋里，有终生随波逐流的浮游生物，有龙腾虎跃的鱼类及其他生物，它们和周围环境互相作用与依赖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这个整体的物质不断循环，能量不停流动，为强调这统一性，生态学家把它称之为平衡，也就是易理的变理阴阳。

生态是生物通过同化和异化与环境之间不断进行物质交换和能量转化，从而不断实现新陈代谢的更新作用。由于生物的生存、活动依赖于非生物客观条件。以生物系统和环境系统，在一定条件的空间所共同组成的系统，就是生态系统，或称之为自然生态。生态系统永远处于运动之中，《易·系辞·上》：“生生之谓易”；“易者，易也，变易也”（《周易乾凿度》注生态系统随时随地都在不停运动变化“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系辞下》），“易”简单说就是变易，说得明确些，是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平衡的恰当就能“通则久”。关于“易穷则变”等这三句在《周易集解纂疏·系辞·下》的注疏中，有如下的说明：“阴穷则变为阳，阳穷则变为阴，剥极必复，复极必剥，皆天道自然之运也。庖牺教民取禽兽，民众兽少，其道易穷，神农则教民播植，以养其生，是血食穷，则变而为谷食，此穷变之大要也。化而裁之，存乎变，故穷则变，推而行之，存乎道，故变则通。”上引《周易集解纂疏》所说，虽与今日生态学有距离，但所说是属于生态系统协调范围。在生态系统中的网络式结构中，每一部份都互相牵连制约，可以取得生态平衡，但

一旦生态失去平衡,这就是《易经》上所说的“穷”。生态系统其他部分,可起协调补偿作用,即“穷则变”。生态自我协调可以“变则通”,人为的协调更可以“变则通”。在自然生态变易中,还有另一面,《易经》中的“既济”卦,是离(火)下,坎(水)上,水与火是相克的,也就是对立的,用《易经》的生克说。八卦中的坤,即土,“土遂克水”(程大昌《易原》卷一《五行生克之原》)水土是相互制约的,而水土保持,即可在一定的情况下取得稳定状态,水是农业保姆。必须把水土资源保持好,不然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挽救是困难的。

古文献上说:“土者,万物之所资生,是为人用。”(《尚书大传》)八卦中的坤卦,主要讲的是生活在大地上人们的农业活动和对大地的认识,可见古代对生态系统有较为正确的看法。

《易经》中的“坎”“坤”二卦是生态经济中所有人们最关心的水与土。《易经》中的坎卦:“水流而不盈”“习坎、入坎”,地球表面有百分之七十是水,它是维持生态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水流而不盈才能实行灌溉,又能起调节气候作用。习坎、入坎就是要学习了解水性,深入理解水性,才能合理利用和保护水的资源。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的大禹治水一事,是古代传说中最受重视而为人民大众所乐道。禹的父亲治水失败被杀,就是习坎不够,不理解水性的原故。习坎、入坎后,才有可能变水害为水利,使生态系统的平衡得以保持。如果水害得不到治理,生态系统便会失调,就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四分之一,列在第八十八位,面临缺水局面的城市,在1984年有188个城市缺水。289个城市80%供水有困难。这个问

题不解决，将制约我国经济的发展。晋朝王弼在其《周易》注中说：“坎 险陷之名也。”水害是人类最大危险之一。《易经·说卦》：“劳乎坎”水患的治理要付出最大的艰苦劳动。我国的水土流失，是不合理的经济活动所造成，它使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如毁林开荒，不只造成林业资源的破坏，还带来了土地松散。容易为大的雨水将泥沙冲入河内。我国目前仅长江、黄河每年带走泥沙就有二十六亿吨，相当于损失沃土良田六百万亩。也加速了土地沙漠化。我国仍以每年一百五十万亩的速度继续发展着。

《易经》的坎卦中所言的习坎，到今天仍有很重要现实意义，水利资源出现的问题，就是习坎不够。现代社会的生产发展速度快，人口增加过多，而淡水资源日趋减少，我国已有一百八十八个城市出现缺水现象。世界上也有不少地区淡水资源日缺。据专家估计与人类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江河湖泊等淡水资源，只占地球上淡水十万分之七左右，其余的淡水则需要大量投资才能使用。调整控制淡水资源，就要“习坎”。马克思说：“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以人的自身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过程。”

《易经·坤卦》：“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这三句是古人尊重土，也是古人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土地为生态环境的基础，“万物皆致养焉”，从采集、渔猎，畜牧、农耕，小手工业，现代大工业，那一项也离不开土地，人类所不能缺少的能源也从土中所出，土是被称为“至哉坤元”“万物皆致养焉”。到了二千年的时候，生命工程科学发展，土仍是人类维持生存所依靠的生活环境中最主要的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01页至202页

项。

历代时有人对“至哉坤元 乃顺承天”的主要涵义重视不够。《易经》又为形而上学神秘色彩所笼罩，因此出现了长时期残酷的过分掠夺土地肥力，不给土地以恢复肥力的时间和条件，这无异是榨取土地的余烬，破坏了土地肥力和农业的生态平衡。河北的耕地每年有四分之一受旱，六分之一沙化严重。生态失去平衡，就会引起灾难的后果，这是没有“顺承天”即自然界生态平衡原则。重视生态平衡，首先要保持土地肥力，保证那些包含在耕地中的物质和能量，以及输出与输入的平衡。水是农业的命脉，有了水才能灌溉良田沃土，而水流又调节了流域的气候，从世界史上看，四大文明古国，全都是起源于名川大河之畔。

利用和保护水的资源，即是搞好水与生态平衡。《易·坎卦》所示：“水流而不盈。”是说水流不畅以及雨水过少，形成了旱灾，或超过盈就溢出河道，造成了水灾。从公元前二〇六年到一九四九年，我国发生较大的水灾，有一〇九二次。我们要维持生态平衡，就要“习坎”以调节水的过多或缺少。马克思说“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的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他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消耗最少的力量，在无愧于和最适于他们人的人类本性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①按马克思所说：“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就是指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合理的调节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易经》这部儒家经典已给我们揭示了一些生态关系，要我们今后深入学习探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926页至927页

第十四章 易学发展概况

谈到易学发展首先是起源问题，《易经》起源于八卦，伏牺画八卦，这是古文籍所共载，虽然有人把黄帝以前都列在存疑之列，但对伏牺却未有人作专论来全部否定它，可以说为世人所默认。有了八卦然后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然后有卦爻辞。关于卦爻辞的产生，约在殷末周初。有卦爻辞然后有十翼，即大传，至于十翼是不是孔子作的，从宋以来就有争论，至今学术界共认为是出于儒门孔子的弟子之手，定型在汉初，即传到今天的《易经》流行本，同考古发掘从汉古墓得的帛书本《易经》基本相近，那么八卦又是怎么来的呢？古代学者多认为是本诸河图洛书。主要的根据是来自《易·系辞》：“河出图洛出书 圣人则之。”关于河图洛书 争论就更多了。根据古文獻的记载，也没说到孔子见到过它，虽然《论语·子罕》篇：“子曰 凤鸟不至 河不出图 吾已矣夫。”但只举河图 未提洛书，假加《尚书》中将河图与大玉夷玉并列于东序，即河图似乎是玉石宝物一类的东西，有没有文化上的意义，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河图洛书这两名称，还见于以下各书：

1. 《尚书·顾命》：“陈宝、赤刀……在西序，大玉、夷玉……河图在东序。”
2. 《礼记·礼运》：“……故天不爱其道 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
3. 《大戴礼记·诰志》：“雒（洛）出服，河出图。”

4.《史记·孔子世家》：“河不出图 洛不出书；吾已矣夫。”

5.《墨子·非攻》：“天命周文王代殷有国，……河出绿图。”

6.《管子·小匡》：“昔人之受命者，龙鱼假（至）河出图，雒（洛）出书。”

从以上所引古籍来看，虽然大都包含一种“祥瑞”意味，但还不是无稽之谈，也没有神话色彩。到了汉朝谶纬之学大兴，也就被渲染得五花八门了，但可以从其中选些有助于探索其发展的线索的，再录在下面

1.杨雄《覈灵赋》：“大易之始 河序龙马 洛贡龟书。”（李善注）

2.张衡《东京赋》：“龟图授牺 龟书畀姒。”

3.《春秋纬》：“河以通乾……洛以通坤，……河龙图发 洛龟出感。”（郑玄《周易注》引）

4.《孝经纬》：“德至深泉 则黄龙见 醴泉出 河出龙图 洛出龟书。”（孔颖达《礼记》疏引）

5.沈约《宋书·瑞符志》：“龙图出河 龟书出洛 以授轩辕。”

从上引材料看，河图另名叫马图、绿图，龙图，而洛书，又名龟书。

我们可以认为河图洛书，并不是不可理解的神话传说东西，只不过是两件上古时代的民族文化的出土文物而已。龙图、或绿图，其实或者是原始石刻的动物图像；洛书或龟书，也就是刻有古代象形文字的龟甲片。

河图洛书不只见于古史传说时代，汉以后之史籍也有类似记载。首先是清·胡渭在《易图明辨》中说：“东城苏氏

(见《苏氏易传》)曰夫图洛书其详不可得而闻矣然著于《易》见于《论语》不可诬也……山川之出图，有时而然也。魏晋之间，张掖出石图，文字粲然。时无圣人，莫识其文尔。河图洛书，岂足怪哉？”这是对河图洛书取肯定的态度。以魏晋之史实，来证远古是会实有其事的。再者如《三国志·魏书·管宁传》上载：“青龙四年辛亥……张掖三川湍涌，海波奋荡，宝石负图，状像灵龟，……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上皇圣帝，所未尝蒙，实有魏之祫命，……盖隆亦以此为河图之类也。”上引二书全以史实为证说明河图洛书之可信，并不是无稽之谈和神话传说。

到了现代八卦源于河图洛书，有人著文论证，今介绍如下：

“河图盖初民象星象为之，……作者当在上世，太古无文字以结绳记事，以筹记数，未结绳持筹以前殆用器。野处者殆席天幕地，仰辄睹诸星，盖天布列之象，其数不可究结，顾数始于一，终于十，法之以说数，钻诸石而为圆点，乃秩然成图焉。迨结绳持筹之事兴而斯法废，图遂见委弃，转徙以入于河，不知经多少时间，沙泥拥之而出，而包牺氏（伏牺）见之，继而疑，终乃见其数有奇有耦，悟夫象有阴阳，于是引点（·）成画——，叠画成卦，叠三奇画为三，叠三耦画为☷。错纵奇耦成八卦，文王重之为六十四卦。今按《三国志·魏志》博士淳于俊言：“包牺氏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图盖作于钻燧取火之旧石器时代。”

以上黄氏所论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古代的河图洛书，自汉以后即从古文献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汉书·艺文

志》之六艺略中记《易经》十二篇。师古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因此对宋代朱熹所编著《周易本义》中的河图洛书及太极图，有人持否定态度，乃得自道家方士，不是真传。更不是易之根本。

宋元以来因之研究河图洛书之易学的，多达数十种，然对此怀有疑问的仍不少，元朝陈应润在其所著的《爻变义蕴》中，指出先天诸图为道家假借易理以为修炼之术。明之归有光，清之王夫之、黄宗羲、毛奇龄等学者，亦相继抨击，对河图洛书的可信性提出了疑问。认为《易经》未遭秦火，不应独失其图，而由道家藏匿。再加上清朝编《四库全书》时，又对河图洛书多有批评贬斥。这样就成了定案。前引黄建中之文，其说虽可信，但还缺乏实证。现在有了实证，在一九七七年春，阜阳市双古堆发掘了西汉汝阳侯墓，在出土文物中，有一面“太乙九宫占盘”。据《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阳侯发掘简报》^①上说：“太乙九宫占盘的正面是按八卦和五行属性（水、火、木、金、土）排列的，九宫的名称和各宫的节气日数与《灵枢经·九宫八风篇》篇首图完全一致，小园盘的刻划则与《河图洛书》完全符合。”也就是实与《周易本义》篇首上刊载的河图洛书相符。这是早在汉初或秦以前，就有了河图洛书的实物证明。由此可见河图洛书及先天图，从汉初实物看来则战国时代早已有了，这是确凿无疑的了。《易·系辞》：“河出图 洛出书 圣人则之”是可信的，八卦出于河图洛书也是没有问题的了。因为河图洛书在汉以后于易学发展中中断，首先从华山方士陈希夷传出图书及象，再由宋代周敦颐将华山刻石《无极图》作《太极图

① 《文物》1978年第八期。

说》，传给二程，（即程颐和程颢），朱熹又命蔡季通入蜀取得图象，置于所著的《周易本义》之首。从此易学的图书派又得复振，此派易学下面有专文来叙述。

以上是易之萌芽阶段。我认为八卦是出自河图洛书是可以肯定的。古史传说是伏牺画八卦，伏牺有无其人在学术界是有不同意见的，我认为他是原始社会发展中一个阶段的象征性代表。西方人认为是实有其人的圣者关于他画卦，在《易·系辞下》是这样说的：“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在没有发现考古发掘到的实物证据以前，我们可以暂认为画八卦者是伏牺，如此则伏牺是易学的鼻祖。以后神农、黄帝全是继承伏牺的易学，这是孔颖达在《周易正义》《论三代易名》中说的。以后就有了古之三易。在古文献中最早载三易之名的是《周礼春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注’名曰连山，似山出内气也者，此连山易，其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是名连山，云气出内于山，……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者，此归藏易，以纯坤为首，坤为地，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中，故名为归藏易。郑不解周易之名。在《周易正义·论三代易名》则解释道：“……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这是夏、商、周三代的易学的名称，即是夏朝叫《连山易》；商朝叫《归藏易》；周朝则名《周易》。以上是易学发展按夏商周三个朝代说的。以上是易学生长阶段。属于卜筮易。

连山易主要是概括了夏代易学的研究。商朝人因轩辕黄帝之学而称为归藏易，这是《帝王世纪》书中说的：“殷人因

黄帝曰归藏”，它是总结了商人关于易学的研究。连山易早已亡佚，考古也没有发现线索。归藏易也早已亡佚，但清朝人马国翰对归藏作了辑佚工作，残缺不全。见《玉函山房丛书》

易学到了周文王和春秋时期孔子达到了宏大阶段。

《周易》的作者，据《汉书·艺文志》云：“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是说伏牺作易时有卦无辞，文王增以卦辞、爻辞，故分上下篇。《艺文志》又云“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艺文志》是传统的说法，认为伏牺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并作卦辞爻辞，孔子则作大传以解经，这就是人经三圣的说法。至于把周公旦作爻辞说加上，成了人更四圣的说法，那是东汉经师所提出的，并不为历代治易者所接受。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有人认为《周易》中的经文部分，即汉人所说的易经，不是文王所作，主要证据是在卦爻辞中讲到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的出于文王周公之后，如晋卦爻辞所说，因此断定卦辞不是文王所作，而认为《周易》成于周初叶。这是以一点概全面，因为《周易》也包括传文部分，不是一人一时所作，而是陆续形成的，并且学术界大多数认为经文的基本素材是西周初期或前期的产物，与西周王朝建立有密切关系。所以文王演为六十四卦还是可信的。

周文王演易为六十四卦。并加上吉、凶、悔、吝的断语，用为卜筮的工具，以占断吉凶。仍属于卜筮易。

易学发展到孔子是掀起了重大变革，由最初的卜筮易演变为讲哲理的书，不能不归功于孔子和孔门弟子。虽然孔子

作十翼的传统说法早在宋朝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中就提出了疑问。他在文字和内容上发现了问题，行文口气上也不对头，但他相信《彖》《象》为孔子作的。后来宋、元、清的学者进一步断定《彖》《象》亦不是孔子所作，“必是曾子以后之人所为。”近人钱穆也为文以证十翼非孔子所作。至此已推翻了十翼为孔子所作的传统说法。但还不能完全肯定十翼非孔子所作。因为孔子离汉初不过二百多年，像司马迁班固这样伟大史家，他们对史料认真负责的态度，是为人所公认的，绝不会凭空编造，他们一定言之有据的，并且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及《汉书·儒林传》都详细列了孔子传《易》的师承关系名单。^①

孔子周游列国不遇，年五十而学易，第一个接受孔子传易的是高贲。后来传孔门易的是：桥庇、^②臂、周丑、孙虞、田何。据《汉书·儒林传》中说：“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由孔子五传到田何，时间在西汉初。孔子及其门徒在十翼中，以义理赞易，变占断吉凶的卜筮易，为人事义理的儒门易，视易道为人生立身行事的法则，且纳易为教材，献出一颗仁心，致力于现实人身的改善。后来田何授王同、（司马迁之父受易于王同弟子杨何）王孙、丁宽、伏生四人。田何以一人之力，重振易学，正如一支手擎大旗的前导。

丁宽传田王孙，田王孙传易于施^③、孟喜、梁丘贺三人，儒门易大兴。

到了汉朝自宣帝以后，社会上与学术界受到流行的灾异

① 蒙传铭在《周易成书年代考》中列有西汉易经传授表，可参考，载《周易研究论文集》

思想的影响，因此易学的风气骤变。焦延寿、京房、费直诸家，各以当时流行的数术之学与易结合，这样就与前此之儒门易大不相同，不是根据易经文字讲解易理，而是由卦象的排列与五行、干支、历律等数相配合，创造了一种“术”，用此术来占验灾异。后来至东汉，复用于注经。后世易学家因称之为象数易。在汉易的主流象数易中，焦延寿是一个才气极高的人，他对象数易颇有创建。焦延寿字赣，曾为官小黄令，史称他能先知奸邪，盗贼不得发，爱养吏民，政化大行，他自称曾从孟喜问易，在易学上长于灾变，分六十卦，更值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能在占验上有表现。后来京房（此是另一京房，不是梁丘贺所师）从焦学易，对灾变占验用之尤精。他元帝建昭中以说灾异为石显所谗杀。

焦延寿著有《焦氏易林》十六卷，着眼于卦变的研究。京房有《京房章句》十二卷，书对八宫、四时候、六日七分之法颇有研究。另外有杨雄著有《太玄经》，阐明太极“含三为一”之理，有独创的见解。东汉桓帝时，会稽上虞人魏伯阳，以易之爻象论作丹之意，撰《周易参同契》三卷。他说将《龙虎经》妙旨融入其中，按《龙虎经》乃道家书，撰人不详，宋王道有注本。魏伯阳把导引的内丹与外丹同易理结合，将象数运用到这一可知而不可见，可受而不可传的领域。《参同契》所描述的内容很难以一般语言表达。古人曾经对这书作了许多注释，仍然使人难于领会。也不要因其词语诡诞，而斥为异端邪说，要进一步努力透过它文字所表术的现象，来了解其实质内容。东汉时还有几位从象数来研究易学的注疏家，如马融与郑玄各有《周易注》之作，二人对爻辰有研究，以爻辰言易。

儒门易经历了一百五十年，象数易历时约三百年。易学

在西汉是盛行的，东汉易学虽不如西汉旺盛，但今天所能见到比较系统的汉“易”，却只有东汉人的了。兴旺的象数之易，最后走入穷途，其原因是多端的。自武帝立五经博士起，至平帝时止，不到一百五十年时间，即出现了“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人”的局面（《汉书·儒林传·赞》）令人有皓首难穷一经之叹。又据《后汉书·儒林列传·张兴传》张兴讲梁丘《易》弟子达万人，在当时烦琐训释的学风中，张兴讲梁丘易也少不了一二十万言吧。秦火之后，天下唯有《易经》一书，汉初又为田何一人所传，结果在约二百年的时间，出现的情况是今文之外又出古文，师法之外又有家法，因而演成“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能正。”易学研究在两汉是“如干分枝，枝又分枝，枝叶繁滋，浸失其本。”（见清·皮锡瑞在其所著的《经学历史》之语）像滚雪球似的易学象数发展，因烦琐而混乱，不易了解导致崩溃。

易学发展到魏晋，开始了崇高义理的探讨。代表人是王弼，字辅嗣，三国时魏国山阳人，注《周易》上下经六卷，《周易略例》一卷。生于公元二二六年，卒于二四九年，只活了二十四岁，这位年纪轻轻就夭折了的天才青年，他注释的《易经》与《老子》是当时人人爱读的书。在政治动荡不安的三国时代，人人关切的是明哲保身的哲学，发挥注释的易老，因而普遍受到欢迎。

王弼勤于写作，不局限于前人旧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注解《周易》的经文部分提出若干体例，他认为从体例中可以体现易的基本精神，也是他的易学观，全见于他的《周易略例》。他以精练的语言，力求简明易懂。唐代人邢昺为王弼易注作序时称赞说：“王辅嗣略例，大则括一部之指

归，小则明六爻之得失……观之者，可以经纬天地，探测鬼神，匡扶邦家，推辟咎悔。”至于王弼未注《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等传，或许是因其对易之总理解，已见于《周易注》及《周易略例》不再注释，或许是青年早夭，未能作成完璧。

王弼之注释方法，着重把握经文的整体意义，只要把握住全文的含义，经文中一字一句，尽可以忽略。如“牛”和“马”等字的出现，只不过是人间某种现象的象徵，不必一定要拘泥于一事一物；卦的形象，只不过是假象，尽管有“牛”“马”等字，如果要从卦形中去寻求根据，学易与研易是劳而无功的。基于这一构想，他将象数易的繁琐的象数，完全割弃，尽可能以孔子的《十翼》来解说经文。他一扫汉人象数之说，提出了“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新观点。又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周易略例·明象篇》）以上这一段话，是对《系辞》中的“圣人立象以尽意”说的。王弼所说的“出意者也”的出，不是生出之意，而是表现出来或显现之意。《系辞》并没有说“象生于意”，而王弼则将“立象以尽意”解为“象生于易”。并说“意以象尽”则可以不必拘泥执着。由此他举了一个生动例子：“犹蹄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非得意者也。”

按他举的筌鱼之例，是来自《庄子·外物》篇。筌为捕鱼工具，蹄是捕兔工具。是用庄子的话来解释言、象、意三

者之关系。其意是说卦爻辞是说明卦爻象的，既然得到卦象内容，就可忘去卦爻辞了。既然卦爻象和所取的物象是用来保存卦义的，如此得了卦爻之意，便可忘掉卦爻象了。如得龙象“潜龙勿用”一句便可忘掉，既然得到乾健之义，则龙象可以舍去，如执着龙之象，不会认识到乾健之义，他认为探讨一件事物的本质，不能为现象所惑。

王弼易注一出世，使混沌神秘的象数易学，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声势大降，开创了以义理为主的新风气，这是他对易学一大贡献。三国以后到了晋朝，继王弼之学的是韩康伯。史称他：“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艺。”（《晋书·韩伯传》）著有《系辞注》对王弼易学有所发展和阐发，进一步排斥了汉易中的象数之学。

到了唐朝，义理的易学在唐王朝政治的统一与稳定，封建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情况下，出现了总结经学研究的局面，唐太宗命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周易正义》是其中的一部，此书采取的是王、韩二人的易注。称赞说：“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至颖达奉诏作疏，始专崇王注，而众说皆废。”《五经正义》完成于六五三年，颁行全国，定为国定本，选拔官吏的科举都以此为根据来考选官吏。以上是义理之易学由魏到唐的发展概略。

象数易学并不能由王弼及孔颖达完全否定，对汉易象数之学也有持肯定态度的。如唐陆德明及李鼎祚。陆著《经典释文》其第二卷是《周易音义》，释文博采晋以前至唐犹存的廿十多名家《易》著，也为后来研究汉易提供了宝贵资料。保存汉易最主要的功臣是李鼎祚，他将当时所能见到的三十五家《易》著，都采用于他著的《周易集解》书中。到清朝人重振汉易，进行研究，是得力于此书。所以《四库全

书总目·经部·易类一》说：“盖王学既盛，汉易遂亡，千百年后学者得考见画卦之本旨者，惟赖此书之存尔，是真可宝之古籍也。”李鼎祚将很多失传的《易》学著作保存下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是有功劳的。

以上是魏晋义理之学的兴起，至唐而大盛的简单概述。

到了宋朝是以理学来讲易的，有宋一代之理学家，著名学者程颢、程颐、朱熹等都对易有研注，也对易理有阐述和发挥，其中二程对此颇有自负。程伊川（颐）为明道（颢）作行状上说：“先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又说：“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敦颐著有《太极图》《太极图说》）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岁，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程颢之学其根植于《易经》，曾说：“圣人用意深处，全在《系辞》。”又说：“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只是善”，他留下有《识仁篇》《定性书》及遗文语录。

程颐字正叔，曾居伊水上，学者称伊川先生。著有《易传》四卷。伊川说：“离了阴阳便无道，所以阴阳者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上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则是理也。”在程氏《易传》中，《周易》的象乃出自理，理能偏理天地之道。理不只是象之源，也是阴阳的根源，同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又认为理是天地间不可变动的最高法则。

伊川《易传》虽对后世影响很大，但只能作为理学著作，至于阐发及总括《周易》，则远不如朱熹。

朱熹字元晦，亦称晦庵，是宋代最博学的人，幼年时即聪颖，十九岁中进士。他是有宋一代对《易经》研究贡献较著的一人。《周易本义》是他易学的主要著作。在《本义》

书前首列太极图象，河图、洛书等九图。为了探究易学源起，他派其弟子蔡元定入蜀，于西蜀隐者手中得太极图象。朱熹相信河图洛书，因而对“图”与“书”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按河图洛书约在宋太平兴国年间，由居在华山的方士陈抟传出，据黄宗羲之《易学象数论》卷一说：陈抟传种放，种放传李溉，李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范谔昌传刘牧，刘牧据河图洛书著《易数钩隐图》。河图洛书因受到朱熹的肯定，以致后来有人认为不能肯定，但碍于朱熹的权威地位，害怕“有干清议”不敢非议，所以元明以来，河图洛书成为易学组成部分。至清朝有宗奉河图洛书是易八卦之源的，也有反对的。但是争论是解决不了问题，幸而考古发掘有了出土文物，即太乙九宫占盘，本章前面已经介绍过了，所以我认为朱熹将河图洛书列在《周易本义》之首，不是朱熹之失，而是对易学研究有重大贡献之举。因为他使失落的图书易学有复兴之望。汉以后唐以前很少见到河图洛书之名，有之亦同图书易学无关。到清朝编《四库全书》时，不单冷落图书易学，并加贬斥。与我国情况正相反的是西方学术界对之大感兴趣，初步探索，已在著作中略谈些，见《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

朱熹在《周易本义》注经中本着义理与象数兼顾的精神。他是“以为先见象数，方得说理，不然事无实证，则虚理易差。”（见《困学纪闻·卷一·易类》）

朱熹有独到的见解，也吸取前人之长，如引王弼之说及从古本《易经》的异字，而取古人之长。特别值得一提的即是朱熹治学的严肃态度，他在注释经文中，对六十四卦卦爻之辞，凡他不明白就直言不理解，凡有疑问的也提出来。如注《明夷》卦“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他就明

说：“此爻之义未详。”而不像有人注经那样作牵强附会的解释。使人坠入五里雾中，百思难解。

朱熹的《周易本义》，文字简洁，他曾说：“在义理方面，程传详细，因而从略。”虽然他以《易》限定为占卜的书，认为经文就是问卜的卜断，如“利悠往”“利涉大川”，遭到王夫之的反对，认为他这种见解，将《易》降低到世俗的占卜上，认为不对，不过卜确是《易》原始的朴素面貌。

总之，朱熹是近代最伟大哲学家。他的《周易本义》的注释，为明清两代的国定本易学著作，为《周易大全》及《御纂周易折中》所全载，也有程的注释，是科举时代思想基础。

《周易本义》与唐·孔颖达之《周易正义》同为封建社会的教科书，影响是深远的，缺点也不少，只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就会取出精华来。

元朝是处于游牧民族统治下，作为知识分子的儒，只列在丐之上，易学的凋零是必然的。因此元代有关易学著作极少，仅有陈致虚《周易参同契分章注》，吴澄《易纂言》。

明朝建立于异族统治之后，学术文化一时难以恢复。明代易学的研究也处在低潮，但出了一位易学大师，即来知德。来知德，字矣鲜，号瞿唐。科举不顺利屡次落榜，乃潜心研易，用了三十年左右时间，写成《周易集注》，此书由来氏苦思而成，其中不免有穿凿附会之处，但在揭示今流行本《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及卦体之间的变化方面，确有发汉、宋人研易者所未发。来氏在其书中提出宇宙模型之说，在解释天尊地卑一段时，指出了易卦的阴阳、动静、刚柔的变化，就是客观世界天地万物的阴阳、动静、刚柔的模拟，反映了宇宙的本体，易之象数即本此来的。此书是有优

点的。清·朱彝尊在其《经义考》中引郭子章的话说：“予谓矣鲜易注，继往开来，亘百代而一见者也，其谓孔子后而易亡若至今日始空虚语哉。”把孔子后易学衰亡，至来氏又复振起，称赞得够高了。清代符永培在《周易集注》跋语中说此书：“妙悟不测，法象自然，理气象数无不具备……发明前圣因数取象之意，补先儒训诂所未及。”来氏将易学的义理与象数融在一起，并发明了前人没有发明的因数取象，所以被当时誉为“绝学”。

易学发展到清朝，是发掘、重振汉易的时期。据《清史稿艺文志》上载，清人著书解易的，多到一百五十家，成书有一千七百多卷，最有价值的贡献，是对汉易辑录和校勘，在这方面清人惠栋的《易汉学》是著名大作，此书共八卷，其中辑孟喜《易》两卷，虞翻《易》一卷，京房《易》两卷，郑玄《易》一卷，荀爽《易》一卷，最后一卷是他根据汉易来推论至宋而出现的河图洛书。此书系统比较全面概述汉易各大家著作。在惠栋以前宋王应麟也辑录成《周易郑康成注》一卷。是辑汉易最早的一部书。惠栋又作《增补周易郑注》一卷。

惠栋另有《周易述》是以虞翻易为主，并参考诸家，自行注疏。该书目录虽有四十卷，但只有二十三卷。另外《易微言》也是一部未完成之作。《易例》也是未完成之作。

继惠栋之后的张惠言，他对汉易作更大规模的辑录与整理。成绩是伟大的，有《周易虞氏义》九卷，《虞氏消息》两卷，《虞氏易言》两卷，《虞氏易事》两卷，《虞氏易候》一卷，《虞氏易变表》两卷，《周易荀氏九家易》一卷，《易纬略义》一卷，《易义别录》十四卷，其中辑集：孟喜、姚信、翟子玄、蜀才、京房、陆绩、干宝、马融、宋衷、刘景

升、王肃、董遇、子夏等家易说。

张惠言在所辑著中，对所引易文皆注明出处，并有考证，使零散在众多古籍中的汉易全汇集在一起，这对后人所考古易有莫大的便利，功在易学。所以清朝阮元对之称赞说：“自仲翔（虞翻字）以来，绵绵延延千四百余载，至今日昭然复明，呜呼可谓盛矣。”（张惠言《周易虞氏义》阮元序言）

清代除对汉易有重大贡献外，还有著名学者王夫之、黄宗羲、胡渭、陈梦雷皆于易学有贡献，在此不详细介绍了。

易学到了现代出现了新动态。第一是在易学中注入新血液。朱谦之著《周易哲学》将欧洲哲学上的术语，如宇宙观、人生观、知识论用在易学的解释上，实际上在朱谦之以前严复在其所译《天演论》序言上，即阐发易理用以介绍赫胥黎之《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所译的是此书的一部分。这就给易学注入新血液，出现了新面貌。

第二，在六十多年前辟易学新门径的，是海宁杭新斋，杭氏在袁世凯称帝时遭祸被捕入狱，在狱中得异人传授易道。出狱后搜集古今言易之书六百二十多种，他夜以继日的攻读。曾在广州主讲于研易学社。著有《易楔》《学易笔谈》《易数偶得》《愚一录易说订》及《读易杂记》和《改正揲蓍法》等书。他书中的主导思想是将自汉至晋、宋以来的象数义理融于一炉，又将佛教、基督教之哲学与易理相比附。以证明易道之大，大到无垠，可以说是欲集古往今来易说之大成。为后来易学开辟了很多新门径。但杭氏专精而系统性不够，又逝世偏早，不然他会为易学有更多贡献。

第二，在开拓易与科学方面，国人首创以英文写作的，首推沈仲涛，著《易卦与科学》在一九二四年出版于上海。在此之前吴晓初之《评易》载于《国故论丛》，吴文第一章

是《近今科学家之论易》其中主要部分乃引自日本日下部理化学博士之主张。吴氏又说：易生生之义，是推究事物发展及变化之迹，用现代话说是“活动”“运动”“流动”就是自然界中之能量移动之迹象，很似今日电力学上之自然观。易之太极、无极，或宇宙、自然，就是易理上之能，常运动不息在物理空间。易之能一动一静而分阴阳，立两仪，其理与电子学之分极作用正相吻合，阴阳合而生五行，与电子学主张：“由阴阳两种带电粒子构成现代化学界上既知之八十余种原子，由此八十余种原子构成种种物质分子”之理亦适相当。

在这方面薛学潜之《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超相对论》二书，前书是按《易学》上的卦方阵演变之定律，推引到西方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狄拉克的方阵学，希鲁汀格及达尔文各方程式，证明易方阵精微广大，凡物质波量子力学诸定律全能与易之方阵定律相合，薛氏又说：由此执一钥可以开启千古学术奥秘。这是西方对易学感兴趣原因之一。薛氏不仅以现代科学比附于《易》，而且还借易以阐发其所创的思想。其后丁超五著《科学的易》。丁氏说，看到日本五来欣造之《儒教对德国政治思想之影响》书中，得知十八世纪德国大哲学家、微积分数学发明者莱布尼兹，用其二元算术符号“○”与“1”代入先天图中每卦之各爻，“○”代阴——，“1”代阳——，发现有几何级数，非常惊异，并且说：“易图乃留传于宇宙间科学之最古纪念物”。因此确信易卦不是神秘的，而是科学性极强之物，但可惜的是至今仍然不能解开这些密码。还有王寒生著《宇宙最高原理太极图》文中引为列证的有莱布尼兹之说，门德尔遗传定律，爱因斯坦之新统一论等，而归结天人一体，即天人合一，来证明太极即道，是宇宙的根源。今人沈宜甲乃比利时籍华裔科学

家，著《科学无玄的周易》，原书为法文，沈氏说：中国上古对抽象繁难的代数学，造诣之高，举世罕匹，……《易经》以至巧妙之代数学，用作占卜，可谓大材小用。

第四，是从易学中探索到管理思想。我在学易中探索到管理思想，这是我四十多年从学习《易经》的曲折道路中，获得的收获。

我在学《易》中有一种又苦又甜的经历。六岁到十五岁，在私塾和邻居家塾就读时，《易经》与《书经》，使我吃了不少苦头，真是俗语所说的：念了《书经》打的哼哼。上中学六年，将所学不感到兴趣的《易经》等全忘了。在辅仁大学时，曾受教于朱师辙先生，朱先生是清史馆馆员，清代著名文学家朱骏声的孙子，在《易经》上有家学，朱先生应我们几个同学的请求，在他家中给我们讲了《易经》，在义理方面启发了我的兴趣，开始尝到甜头，虽下了功夫，读了汉、宋、清名家研易之书。但只在义理与象数方面绕圈子，未能深入发掘《易经》在社会科学方面宝藏。后来有缘认识了卢淞庵老先生，得以在他收藏的两三千卷《易经》各种书中，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十年动乱，我的书籍遭到劫掠，其中十几种《易经》有我在书页天地上的心得与个人见解和几十本读书笔记，其中有的是读易提要，这是使我最痛心而又苦恼的。在抄家后，我在满地杂乱东西中，找到一部还完整的石印本《周易本义》，在清队时，我撕下一页一页的《周易本义》在小屋中乘无人时，反复研读。

粉碎四人帮后，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喜悦，在十一届三中

① 《科学无玄的周易》沈宜甲著，中文本第十六页。 1981年友谊出版社。

全会后，我的精神更加奋发，我在财贸学院，除授课外，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古代经济研究。八二年应陶大镛先生之约到北师大讲古代经济史，在撰写讲稿时，我认为过去从《易经》中发掘的经济材料少的可怜，经济管理思想则是空白，因此我深入探索《易经》这个东方文化宝库，先写出《易经主流始自经济》发表在《经济学集刊》〔3〕，得到陶大镛先生高度评价。

在一九八四年由国家经委经济管理研究所召开的第一次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讨论会，会上我宣读了《最早管理思想见于周易》，会议结束前经委主任袁宝华同志对我这篇论文，大加赞扬，会后由前国家经委经管所发了简报，重申了赞扬本论文。此文后刊载于《中国古代思想与管理现代化》^①，给了我很大的鞭策，使我认识到拙文虽是国内外从《易经》中探索出管理思想的第一篇，且是初步尝试，却怀有抛砖引玉心情的。

在探索经济管理方面，也得美籍华裔教授，夏威夷大学哲学系主任成中英的赞许，他约请我加入国际易经学会为会员。成中英博士在济南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上说：他认为《周易》思想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天人互感，万物化生的观念，历经夏之玉器时代，商之龟卜时代，周之卜筮时代，到孔子作《易传》而最后定型。这种发展是从象而数，数而象，从象数走向义理。还说：占卜包含了很多义理和哲学智慧，既是预测学又是决策学。易应是开拓新知识的工具，而不是解释的工具，主张与现代知识接头，使易对医学、智能科学，决策管理作出贡献，他提倡中国式的管理，

中国式的管理就是《易经》的管理。台交大教授曾仕强也有此议论。

他肯定发掘《易经》中管理思想的正确性。并认为探索出的易理管理思想，用之于实践是有成效的，日本、新加坡在企业管理的成功范例 就是明证。

第五，易学动态中有近似于猜的探讨。如关于易成书时代及卦爻辞的时代和作者等方面。如余永梁的《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郭沫若的《周易的构成时代》，沈尹默之跋及陈梦家之书后，皆持反对意见，疑古最出力之顾颉刚著《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和《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故事》，其弟子齐思和曾修书与其商榷，表示不同意见。李镜池著《周易探原》《周易筮辞考》，书中对传统旧说之伏牺画卦，文王重卦，周公系辞，孔子作十翼均加以抨击，大加怀疑，立说又前后矛盾，并无考古实证，勇于疑古，求不到定论。沈尹默对于这方面易学探讨，曾说：此等问题，本无法解决，但不妨大家猜上一猜耳。可以说切中了不务实之动态。

第六，是从《易经》中发掘气功理论根据，这方面古代早就有，清代修《四库全书》的总编修纪昀曾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炉火，导引……皆可援易以为说。”气功古代叫导引，与易理搭上关系，渊源久远，有关这方面材料多载于《道藏》，《周易参同契》是古气功专著，被奉为丹经之祖。现在气功组织遍及全国，气功研究，日渐深入，有关气功与《易经》之论述，曾有不少出现在气功研讨会上，如八八年十月在青岛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气功学传统理论学术研讨会上 就提交了易与气功的论文多篇。这是一件古事新动态。

① 请参阅本书第十四章第三节

第十五章 西方易学热

在西方兴起了《易经》热，这项学习研究热，不同以往其他项目的热，而是广泛波及到社会各阶层，时间也久而不衰。其起因是电子计算机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并浸透到日常生活各个方面。

中国计算工具科学落后，虽有精深奥妙的《易经》宝库却启发了欧洲人。《易经·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按所谓伏羲六十四卦，乃两仪、八卦、十六、三十二、而至六十四卦，即为二之累乘方， 2 、 2^2 、 2^3 、 2^4 、 2^5 、 2^6 ，即为数字之二进法。三千年来我国研《易》的学者很多，能够称得上家的就有七百多人，现存注释《易经》的书，与不下三千种。但是对《系辞》这几句话，一直没认识到其中的数理涵义。

还是等到十七世纪欧洲人所发现。

德国大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兹 Leibniz 1646-1716，他收到白晋 Bouvet 传教士寄来的《易经》译本。莱氏研究六十四卦图之数字排列顺序，结果他发现了和他在一六七八年发明的二元算术得力于中国的八卦。根据莱氏二元算术。由德国人斯密特 Schichardt 和法国人帕斯加尔 Pascal 二人用齿轮的齿数来进行加浅乘除、四则运算，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成功的利用步轮控制多次加减，并使乘除运算自动化。这是打开了计算机前进的大门，然后经过许多人努力，到第二次大战后不久，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成功的制成电子计算机。时在一九四六年二月。

十七世纪是欧洲科学的黄金时代，也是欧洲人民开始同中国文化接触的时代。莱布尼兹曾高度赞扬了中国灿烂文化以及中国对人和自然界的独特看法，自那以后，中国文化已成为欧洲科学的灵感来源。

二进位制的原始起于古老的《易经》，还在数学上的排列组合，最早也是始于《易经》按《易经》是世界公认第一部讨论排列组织的，由阴阳两爻每二个合成一组，则共可得 $2^3=8$ ，即八组成八卦；二为基数，三为指数，若用六爻，则为 $2^6=64$ 卦，此种排列与组合，在世界是最早的。因此后世的排列组合，一致承认始祖为《易经》。

其次是《易》之卜筮与数学或然法。如以六十四卦代表六十四种可能之答案，每卦又有六爻，就出了六项不同的答案，卜筮得到命中率为 $\frac{1}{64}$ ，或为 $\frac{1}{64 \times 6} = \frac{1}{384}$ ，它与近代数学或然法相合。

以上是西方对“易”感觉兴趣主要的一项 因之对易的热度增高。

西方考古学的展示，对《易经》也起了激励作用。八十年代美国易经考古学会、宣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出土一件印第安人彩钵，上刻有七个表意符号，与《易》之复卦相符，用考古学技术测定之年代，断定为七千年前之物，与中国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古物上符号完全一致。美国易经考古学会还推断早在七千年前，中国半坡民族的后人，已辗转移居到美洲了。

又有出土于世界各地的古物，其中有三百多件古宝与《易经》卦图有关，并在造型、功能与中国经史上的记载相吻合，这是多年来能用理论与实物相互配合的重大收获。在

许多古宝之中有一件三千多年神奇的青铜喷水震盆，样貌及大小有如一个炒菜锅，但底为扁平，左右各有一个把柄，盆底刻有四条鲤鱼，鱼与鱼刻有四条河图抛物线。美国易经考古学会，当众试验，说是据古文献的记载，倒入半盆水，用两手摩擦盆的两柄，未久，盆里的水居然分成四股水箭向上射了两尺多高，并发生念震卦六爻之古音，与黄钟音一致。美国物理学家研究了该古物，无法解释，此物的仿制品也未能达到原古物功能。按这个古物是阴阳六律定音器，乃三代时帝王，用以祭天地和祖先时盥手用的文物。

另一件是三千二百年前古希腊遗留的陶盆“河图”底上有中文古篆铭文“连山八卦图”。那时的希腊人也会刻上中文，这是令人十分感兴趣而奇异的事。美国报纸上多以显著的版面报道了以上令人兴奋的事件，也是对《易经》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西方文化走向衰落，也是欧美《易经》热的原因。早在本世纪二十年德国学者斯宾格勒 Spengler 著《西方文化的衰落》在当时学术界起了不少的影响。七十年代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同意这本书作者的观点，与之有类似观点的，是当代最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 Toynbee 1889-1975，是被誉为国际智者的学者，他预言在人类历史上下一个阶段，西欧将把主导权交给东亚，而中国有可能成为使世界走向大同的地理和文化的主轴。近代科学竞技中，西方走在前头，但他认为由于西方人对于科技的迷信，以及这种迷信在一些人贪欲支的下，导致对科学技术的滥用，正使现代西方文明面临毁灭的危机，以当前最为人所关注的几件事来说，如：生态平衡的破坏，核战争的威胁，城市的畸形发展等方面。

西方科学技术的光辉业绩与人们道德伦理的极度贫乏，

所形成的空前大鸿沟，使人们容易想起当年希腊人、罗马人的悲剧命运，正慢慢的临到西方人头上。

汤恩比在东方却看到了一种希望，他在古老文化中发现了现代西方文明中格外缺乏，而又是二十一世纪继续生存必不可少的东西，它使一个民族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保持着政治、文化统一的共同生存信念，就是融孕于儒道学说中力求与自然和谐的神秘的合理主义精神。汤恩比说我国在两千多年中一直保持着统一共同生存信念等话。这可举《易经》中几节来为汤恩比的话作注，《易大传》即富有辩证思想，其中观念是变易、日新，如《易·系辞》：“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这是说：道德与学问，乃是天下万事万物的，都达到富有就是伟大的事业，日新月异就是具足了盛明的德行，变化前进不已就是易。日新又新，生生之谓易，这是使中国在两三千年来，相对保持统一而生存下来的促进力量。

《易·泰卦》：“财成天地之道 辅相天地之宜。（财同裁，唐·孔颖达疏：天地之道者谓四时也，冬寒夏暑，春生秋杀之道。天地之宜者，谓天地所生之物各有其宜。）按财成即制裁成就，亦即遵循其固有规律而加以辅助，肯定了人有调整自然的和谐作用，不要违背自然规律，因物各有其宜，扰乱了其宜，生态就遭到破坏。

《易》之精华在于道和阴阳对立变化之理。《易经》是发现并应用相对现象与相对原理在历史上最早的一部书。古之研易者将六十四卦作相对表，如天（乾）地（坤）相对；风（巽）雷（震）相对；水（坎）离（火）相对；山（艮）兑（泽）相对，宇宙万物皆属相对，故有大即有小，有高就有低。西方科技与精神文明之间的鸿沟日益增大，不能相称，

就是缺乏易理之相对所致。按易理之相对，乃古哲人观察宇宙，体验人事所发现，与近代之相对论相同，或涵义更广。

汤恩比从古代东方找到了希望，即世界唯一的智慧宝典——《易经》，因此西方《易经》热，非比寻常热门题目，它热度不减，而日益广泛展开。

第十六章 打开学习《易经》的门窗

《易经》是一部从古以来不容易学的经籍，有一句俗话，学得《易经》打的哼哼，古代学习是三部曲：念、背、打。打就是打板，所以从古今很多人视学易为畏途。本章是我个人从走过曲折困难的道路上获得到的不成熟学易经验，供有兴趣学习《易经》的同志参考。

在我国曾有人说过：《易》为诡异之书，在欧美西方人认为《易》是东方之谜。经过两个多世纪西方从各方面学习研究之后，认为《易经》是东方文化宝库。所以有上述的不相同的说法，原因是复杂的，《易经》深奥难懂，令很多人望之生畏难情绪，又因历代研究注释《易经》的书，多到三千种，真可以称的是浩如烟海，先不用说读懂，就是有选择的看一遍，也要十几年时间，古人说浩首穷经，学习《易经》要比学习其他经书用的时间要多。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在济南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上说：《周易》的思想甚至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商之龟卜时代，周之卜筮时代，到孔子赞易，即作《易传》而最后定型。这种发展是从象而数，数而象，从象数走向义理。他又说：易应是开拓新知识工具，而不是解释的工具，主张与现代知识接上关系，使易对医学，智能科学，决策管理作出贡献。这就扩大我国易学研究的领域。

易是多层次文化形态，它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古代传统上的说法，易是经三圣之手，三圣即伏牺、文王、孔子，或加上周公，即经四圣之手了。汉朝至魏晋在易学研究上，

出现了象数与义理两大流派。流派细分还相当多，因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炉火、导引，乐律、星历，以及六壬……皆可援易以为说。”（一）到了现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接上头，则易道本大而易说就更繁了，这么多的易学著作，先从哪里下手，免得劳而少功，走上弯路。解决上述问题，下面提出四点建议，供同志们学易参考。

第一是易学书目，目录学是治学入门第一步，现在介绍三部书：程启槃《历代易学存目》及《现存易学书目》，沈竹初《自得斋目睹国朝易学书目韵编》。第二是初学入门书，也先介绍三部：吴纲《周易大纲》，陈柱《周易论略》，刘厚滋《易学象数别论初衍》以上三部书或许现在不太容易找到，最近国内重印了两部港台书，孙振声《易经入门》（原名《白话易经》）南怀瑾、徐芹庭合编《周易今注今译》，以上两种书，国内重印不久，容易购到。第三是易学基本书，通行的有两部：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和宋·朱熹《周易本义》，以上两书虽是封建社会唐、宋、明清的国定本，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学易不能忽视的，并且二书最近有重刊影印本。《周易本义》武汉、天津出版社各有印本。第四是读法 先通读《易经》的“经”和“传”然后重点反复多读《易传》，即采取古人所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之理，再反过来读易之上、下经，如此打好基础，然后择与个人性趣所近的易学论文或专著来开拓视野，这样可以算是进入易学之门，入门之后，登堂入室那看个人修行如何了。

如果进一步深入学习《易经》，则清修《四库全书》给我们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四库全书》最近国内外有影印刊行。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四库全书》所收《易经》全部陆续印出，已有几种印出。《四库全书总目》有二百卷之

多，经部内首先是“易类”六卷，及易类存目四卷，共十卷。总目为《四库全书》所收历代《易》学著作作了简明提要，其中包括书的作者、卷数，内容提要，及四库书编者对该书的译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此书有影印本，容易在图书馆看到。近人余嘉锡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辩证》可参考对比。

另外台湾出版有严灵峰编的《易经集成》，该书共收易学著作三百六十二种，共一千六百十四卷，包括三百一十九家著作，近期著作收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出版的，该书为影印，极便学习参考，节省时间到各图书馆查询作者、书名、内容初步工作。

至于学习《易经》，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易经》中有的部分需要下功夫来背诵，使熟练的记住。一提到背育，我是有顾忌的，因为三四十年来教育界方面盛行一种说法，学习只要能理解就可以了。用不着背诵，好像念与背连在一起就带有封建色彩似的。虽然近十年来有人在讨论学习方法上提倡背诵，举学习外语的拼写与字义等都需要以背诵来记，中文一个字的形、音、义、词组，古今文中的范文，也需要通过背来记住。但是不愿背诵，或不习惯背诵的风气仍然在教育界、知识界中盛行。《易经》是世界唯一的符号经，而易之符号与文字交织在一起。有人称易是诡异之书，西方人认为易是东方之谜，就是因此而产生的，符号要经过背诵才能记住。欲读《易经》，必须先了解它组成结构的特点，它由阴爻阳爻符号而组成八卦和六十四卦符号，全部六十四卦卦象组成了《易经》一书的符号部分，此外就是它的文字部分。六十四卦象由两部分组成，下面的三爻称为内卦，上面的三爻称为外卦。首先要记住八个卦象的名称，

看、读是不行的，必需要经背诵来记住。宋代时就流行于世的《八卦取象歌》，时到今日仍是学易入门的一项帮助：“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复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这里只举前两卦为例来说明，其他六卦读者自行看书好了。乾卦由三个阳爻组成☰，坤是三个阴爻组成☷。上面所说的这首歌诀，形象的把卦象与卦象的名称连成一体了，是学易入门的一助。

六十四个卦象名有六十四个自不相同的名称。其名称是：

乾卦、坤卦、屯卦、蒙卦、需卦、讼卦、师卦、
比卦、小畜卦、履卦、泰卦、否卦、同人卦、
大有卦、谦卦、豫卦、随卦、蛊卦、临卦、观卦、
噬嗑卦、贲卦、剥卦、复卦、无妄卦、大畜卦、
颐卦、大过卦、坎卦、离卦。咸卦、恒卦、遁卦、
大壮卦、晋卦、明夷卦、家人卦、睽卦、蹇卦、
解卦、损卦、益卦、夬卦、姤卦、萃卦、升卦、
困卦、井卦、革卦、鼎卦、震卦、艮卦、渐卦、
归妹卦、丰卦、旅卦、巽卦、兑卦、涣卦、节卦、
中孚卦、小过卦、既济卦、未济卦。

记住六十四个卦名，在背诵方面当然是很吃力的，这个困难可靠从宋朝时已流行于当世的《上下经卦名次序歌》，它可以使人们较容易的记诵六十四卦卦名和排列的先后顺序。卦名次序歌如下：

乾坤屯蒙雷讼师，比小畜兮履泰否。
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兮噬嗑贲。
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三十备。
咸恒遁兮及大壮，晋与明夷家人睽。

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继。

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兮中孚至，

小过既济兼未济。

《上下经卦名次序歌》将六十四卦中加上几个虚字如今、与、兼、及三十备，编成一歌是学易入门又一助。

学易入门，还要熟习卦画，很多人把学“易”看作是畏途，主要的阻力就在于不知卦画，不知卦画，又很容易误以为卦画太不容易知道，实际上只要下功夫背诵，就能解除这项入门的阻力，除记诵牢固前面说的《八卦取象歌》外，还要将《分宫卦象次序》，通过背诵，牢记在脑中，要除去学易阻力并不难，因《八卦取象歌》仅二十四个字，《分宫卦象次序》仅二百零七字。用些时间来背诵熟习则卦画难知即可解决了。下列《分宫卦象次序》如下：

乾宫八卦

乾为天、天风姤、天山遁、天地否

风地观、山地剥、火地晋、火天大有

坎宫八卦

坎为水、水泽节、水雷屯、水火既济、

泽火革、雷火丰、地火明夷、地水师、

艮宫八卦

艮为山、山火贲、山天大畜、山泽损

火泽睽、天泽履、风泽中孚、风山渐

震宫八卦

震为雷、雷地豫、雷水解、雷风恒、

地风升、水风井、泽风大过、泽雷随

巽宫八卦

巽为风、风天小畜、风火家人、风雷益

天雷无妄、火雷噬嗑、山雷颐、山风蛊

离宫八卦

离为火、火山旅、火风鼎、火水未济

山水蒙、风水涣、天水讼、天火同人

坤宫八卦

坤为地、地雷复、地泽临、地天泰

雷天大壮、泽天夬、水天需、水地比

兑宫八卦

兑为泽、泽水困、泽地萃、泽山咸

水山蹇、地山谦、雷山小过、雷泽归妹

历代数术家多用《分宫卦象次序》，传说是出自《火珠林》，是汉朝京房易学之法，虽然此对学习易学经传无直接关系，用它作熟习卦画入门之用，是最有用的。学习熟了卦画以后，读“易”之上、下经时，就可免去九六之数混淆不清之病，爻有十二个异名，即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全都可得而理，而每卦之爻是九是六全不用强记了，并可免九六之数混淆不清的难处。

卦画上遇到阻力消去后，最好熟读经文，熟读不是背诵，应当读起来上口，念起来口顺后再求了解经文中之意。如果对经文还不熟习，就去泛览研究《易经》前贤论著，获不得什么益处，反而茫然失望，这就是《左传》所说的多方以误之。所以先不宜博览诸家，应先读宋朱熹《周易本义》唐·孔颖达之《周易正义》《二程集·周易程氏传》这三本书是《易经》义理派的代表经籍，以后如欲学象数易，则先读唐·李鼎祚《周易集传》又名《李氏易传》这部书收集了许多汉人解“易”的资料，这些资料，因三国时魏、王弼

创“易学”新风向，尽扫象数，汉代象数易学衰微，著作散亡，唐·李鼎祚为保存象数之学，免丧失无存，在《周易集解》序上说：“刊辅嗣（王弼）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他把唐时能收集到汉朝易学家著作收集、著成此书，给清朝研究汉易学留下宝贵资料，以上这四本书可用入门后的阶梯。

儒家经籍中，能有助于学习《易经》的，首推《中庸》是书最能发明易义，可以作学易之一助。道家中最于学有参考之用的是老子、庄子，本书有《易经》与老子一章，可与本章配合来读，老庄的缺点，从“易”道来说，是知阴不知阳，知柔而不知刚，只有“易”之一面，读者有兴趣来将《易经》与《老子》对比而读，自会加强认识。

今日“易学”研究有广阔的前景，全世界已有七十多个“易学”组织，我国“易学”亦受到重视，虽然易“学”深奥不易攻读，但只要坚持学习，有恒心，不在困难前丧失学习信心，总会取得进步与成就的。

作者简介

周止礼 1915 年生于北京。先后毕业于北京财商学院、辅仁大学史学系、辅仁大学文科研究所。现任北京财贸学院经研所教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国民经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周易研究会会长。曾先后任教于长春大学历史系，西北艺术学院文学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并为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管理系研究生开专题讲座课，参与人民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博士论文评议。

担任社会职务有：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理事，北京市钱币学会理事、中华子规文化苑名誉理事、国际易经学会会员，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文献委员会委员。

主要专著有：《西藏社会经济研究蠡测》、《国际贸易壮丽史诗——丝绸之路》、《试论尚书洪范五行的经济涵义》、《周易的经济涵义初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渊源于周易》、《周易中自然力与生产力的控制与管理》、《最早管理思想见于周易》、《道家创始人老子的管理思想》、《孙子兵法与现代企业管理》、《我国烹饪的萌芽与殷代饮食器皿》，还写了先秦、隋唐经营管理条目载于《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书中。

袁 序

本书作者周止礼教授研究《易经》数十年，是北京周易研究会会长，美国国际易经学学会会员。他这本入门书别出心裁，有以下四个特点：自汉、晋、宋、明、清，到了现在易学研究囿于象数、义理两大派，将《易经》的多功能，广阔的应用范围局限化了。易学研究虽已浸透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易学发展仍有形无形的受两大派控制，开阔易学研究视野，反为所蔽。本书将根据易理建立起的中医学（医源于易）、军事学、气功、文学理论、管理学等汇集各方面成果于书中，推荐给读者。

易学思想宝库中所展示的中医学、气功、文学、军事理论、管理学等，虽体系容或未臻健全，却多精当之处，是步出了旧框框，开阔了易学新天地，如气功、养生。从《易经·既济卦》，推论发挥到养生气功。

本书将中医学、军事理论、文学理论、管理学等，根据易理所取的研究成果，以浅显文字写出，读完此书，再读《易经·上、下经》及《十翼》，自会减轻《易经》文字上艰深玄奥的阻力。

本书增强了我们发掘祖国传统文化的信心，不要重演二进位制创始人莱布尼兹自认三千年前二进位制之理，已载于《易经》。祖国先贤的伟大业绩，反让德国人告诉我们，今后这一智慧宝库，让我们努力开发它。

袁宝华

一九九〇年三月

张 序

《周易》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传说伏羲氏始作八卦，周文王作“上下篇”孔子作《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所以《汉书·艺文志》说：“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近代以来，受疑古思潮的影响，“人更三圣”之说，久已动摇。伏羲氏定为神话人物，六十四卦上下篇未必文王所作，《易经》十篇与孔子的关系如何，亦难考定。但是，即令如此，《周易》“经传”以其深沉的智慧与丰富的内容，在中国文化史、学术史上仍有卓异的价值。

《周易》上下经是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开端，《泰》《否》《剥》《复》等卦象已显示了深切的睿智。《彖》《象》《系辞》所略示的“变易”“会通”的观点，确实照耀今古。《系辞》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至今仍闪耀着明莹的光辉。《彖传》所谓“刚健笃辉光，日新其德”，《象传》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系辞》所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等，其精湛命题，照耀着中华民族前进的道路，至今日仍能给予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传说孔子授《易》于商瞿，由春秋末以至秦汉，《易》学传授不绝。至汉代而居于五经之首。三国时代，玄学兴起，《周易》列为三玄之一，亦受到尊崇。佛学输入以来，经历南北朝以至隋唐，佛学逐渐昌盛，儒门淡泊，韩愈力图复兴儒学，而未能成功。北宋理学兴起，才恢复儒学的权

威。理学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大都“出入于老释”然后“返之于六经而后得之”。所返求的“六经”实以《周易》为首要典籍。理学家正是在《周易》的启迪之下回答了“释老”的挑战的。近代西学东渐，今日我们的时代任务是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创造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在今天会通中西文化的文化探索中，《周易》经传的一些精粹思想仍能为我们提供会通、创新的契机。总之《周易》经传在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周易》上下经古称“卜筮之书”，历代藉《周易》宣扬巫术的亦不乏其人，至今日，藉《周易》传播迷信者亦所在多有，这在学者善于辨识之。

周止礼同志深研易学，对于《周易》经传与哲学、医学、天文、数学、文学、艺术，以及军事、经济等的关系作了广泛的探索，对于《周易》的管理思想特加详析，写成《易经与中国文化》一书，内容探赜发微，颇多新意。止礼同志征求我的意见，于是略述易学大旨以为之序。

一九九〇年七月

张岱年 于北京大学

自序

这是一本既具专门而又具有普及性质的书，它不专是学术性的书，其中《易经》与管理是我在国内外首创之作，全书期望尽可能达到简明、通俗、扼要，使读者能从本书认识《易经》是怎样的一部书。《易经》是冠在儒家六经之首的一部书，又是三玄——易、老子、庄子——中第一位，很久以来被认是深奥难懂，使人生畏的书。两千年来易学研究浸透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领域，在这点上，清朝修《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就说过：“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皆可援引以为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西方哲学家 G.Jung（江格）曾说：中国古典思想是世界上唯一的智慧宝典，此可仅举一事来说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尼尔斯·玻尔 Niels Bohr，他从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获得了他的互补性质的，这就是他为什么在从瑞典皇帝手中接过诺贝尔奖时，把《易经》的阴阳符号作为自己的标志。可见西方科学界对《易经》的重视程度如何了。

既然《易》研究已广泛浸透到各种学术范围，因此就将《易》在学术上所引发的果实，从深入浅出的角度来叙述，以达到使一般人对《易经》有深入的了解，也能扭转在一些人心中的民族虚无主义气氛。

我希望这本书能给人们以振奋的精神，加强民族自尊心，振兴中华，使传统文化的源泉——《易经》古为今用。

导 言

凡是要研究中国文化思想的，不能离开《易经》。《易经》是一部可贵的精神财富，为祖国文化产生了无比丰富的内容。假如没有这些卜筮的记录与整理，我们知识面多么狭窄。易学是传统文化中心，也是了解祖国文化首先步入的门径。

人类过去的智慧与心灵活动，常以口传作为信息，此外只有以符号及象征性表形方法保存下来，不过这种记录容量总是有限的，易之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这些符号，时间与神秘化又摧残了它，并且易学发展出现了断层，汉易至晋，象数衰亡，增加了我们对过去复杂记录的知识贫乏，由易理而产生的气功就是显明例子。

“易道广大”，它是学问与技术二者之合产生的，也与生活方式有密切关系。《易·系辞·下》：“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人们会建造简单房居，这是生活技术上的进步。“包牺氏……作结罟，以佃以渔……神农氏作耒耨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这是渔捞与原始农业的出现，是原始人们生产技术进步，导致了生活的变化。“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从以结绳来记事，到文字的创现也是技术的进步改变人们生活方式。

技术是学问支流，如无学问的研究，也就难于在技术有进步。今举《系辞·下》：“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卦）”是说（黄帝、尧、舜）剡空大木当船，削木作船桨，有了水上交通工具，可渡江河川泽，使天下人得到前所未有的便利。是从

《易经·涣卦》内取象从而得到启发而创造出来船和船桨。

《涣》卦是坎下巽上，坎是水，水在下，巽是木，木在上，木头在水上漂动着这个现象，启发原始社会人们，《易经·涣》卦是由坎在下、巽在上组成的，所以说大致取象于《涣》卦。又如“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大意是〔黄帝、尧、舜〕用牛和马驾车，把大批量的物品运到远处，给天下的人民以便利，从《随》卦的卦象受到启发的。《随》卦是震下兑上 在《说卦》中：“震……其于马也……为作足。……艮为山为径路”。这个卦象启发了人们，以牛马走代人步行于路途上，所以“服牛乘马，以利天下。”以上可以证明有学问然后有技术、有技术然后乃能提高生活水平，改进生活方式，所以只从生活方面谈，而不谈学问技术是不对的。

并且生活方式，不能概括所有文化内容。因为生活方式之含义只不过是衣、食、住、行等，物质享受水平方面，忽视或不重视精神文明的高层文化如道德、法制、哲学、美术、音乐，只认为是以物质享受来制定文化水平的高低。

追求享受会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带来更严重的问题，本来，十年浩劫以来，文盲人数不断增加，法盲比比皆是，公共道德社会风气每况愈下，这与上述错误认识是有关系的。

学问是有系统的知识。从《易经》来看，据序卦中各卦排列次序，由乾、坤、屯、蒙、需、讼、师，以至小畜、履、泰、否，都表现了文化发展与其系统性。知识是对一事一物所知所识。人有知的本能，又有接触外界的感官，根据人的本能与感官，分辨自然界与生物界，《易经·系辞》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再由八卦而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原始社会，代表人物是伏牺，他画八卦时利用符号，就是由阴爻与阳爻排列的，这样就超出了知与识，上升到融合、条理、组织，并提出具体的见解，又阐明万事万物之变化 这就是“思想”。

思想是领导学问及学术前进发展之动力，在中国文化思想传统中，《易经·乾卦》：“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给历代人们作出积极的贡献，鼓舞了历代人民在困难面前不屈向前迈进。中国文化不断前进的思想是导源于《易经》的。